

裸体的共产党员

前言

现代最荒诞的现象之一即是共产党奴役全人类的阴谋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部分原因是两种无知的结果 — 对维持自由所需的宪法规定的无知，第二，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与其策略的无知。

本研究旨在将关于共产主义的广泛事实归纳为一卷。它包含了超过一百本书籍和论文的提炼 — 很多作者是共产党员。其试图展现共产党员的本性元素，剥去宣传与伪装。因此，书名为，“裸体的共产党员”。

西方学生倾向于避开晦涩难懂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有种感觉像在真空中乱抓某种未知量。因此，许多年前试图澄清这些概念成为了作者的目标，以便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从而减少恐惧。人类最害怕的是对“对未知的恐惧”，因此这似乎很有利于向学生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图景 — 仅是“现代唯物主义的进行时”，以解除共产党革命者的武装。

对共产主义的全景研究很容易演变为一长串的尺寸，名字和陈词滥调，而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哲学得到真正了解。因此，这项研究试图将共产主义展现为地球上一股有生命有呼吸令人颤抖的力量。世界共产主义的政治发展，哲学，经济理论和大人物都以其历史背景呈现。

直到越来越多对共产主义信念破灭的官员逃离铁幕后，很多疑团关于马克思纪律下心态的正确理解才被移除。本研究因此呈现的马克思文明不会提及它宣传的大话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当每一天，千百万人类替代剩余人类领悟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真实含义。

对于那些没有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百年历史的人来说，本介绍起初似乎有些严酷。但这是因为被暴露的共产主义接缝本质上是严酷的。马克思就是这样设计的。某学生在一个隐蔽的书房里坐在舒适的扶椅上，可能很难抓住共产主义进行时的精神和实质。但对韩战老兵，铁幕难民，返回的莫斯科大使们 — 身体与心理感到过世界共产主义冲击的人 — 可能认为本研究不够充分并过于保守。

应当告诫读者，共产主义本质的复杂性阻碍某些内容被快速阅读。有时几卷书被摘要进几段话。开始之前如果有充分时间探索技术性的或哲学的章目，将对读者有所帮助。为了帮助读者识别文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每章的开头提供了一系列初步问题。在力求简短的同时，作者希望并没有晦涩。

W. 克里昂 斯克森

盐湖城，犹他州

1958年11月1日

序章

马克思人种的崛起

当一个人着手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所有其他人时，真是一件恐怖可怕的事情。这竟成为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全力以赴的野心及目标。他并不会让每个人都与他平等；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他希望构建的宏图是一个人类构成的庞然大物，由卡尔马克思当其大脑与构造者，而其他所有人则充当

他的耳目，手脚，喉舌。换句话说，马克思对世界进行了调查，并梦想着有朝一日，全世界人类都可能被迫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图景，其完全符合马克思梦想的完美社会。

为了达成他的目标，马克思需要两件事情：首先，所有反对派的彻底歼灭，所有现政府，所有经济体和所有社会的垮台。“然后”，他写道，“我将跨越废墟成为缔造者！”他的第二个需要则是一种新的人类。

他想像出一种训练有素的巴甫洛夫式人种，他们的脑子被上了发条/扳机，只要主人发出指令他们就立刻行动。他想要一种人，他们不再依赖自由意志，伦理，道德或良心作为指导。也许他也没有完全意识到，马克思着手创建了一种人类，条件反射般的像罪犯一样思考。

产出这样的种族曾是4000多年来权欲熏心之人的梦想。宁录(Nimrod)曾展开设计，柏拉图(Plato)打磨了它，圣西门(Saint Simon)升华了它 — 现在马克思物化了它。

如今这种罪犯式思考的人在地球上多到足以征服国家或大陆，改变法律与界限，诏令战争与和平。他应被称为是马克思人属 — 马克思人种。他表示的不能再清楚了他打算成为二十世纪的领袖。

马克思人属令其他人感到惧怕与困惑，因为一个罪犯式条件的头脑无法回应正常人的期待。

例如，如果一个好心人邀请了一个职业罪犯到他家里吃晚饭，贼眉鼠眼的客人更可能打量各色美食，贵重银器和闪亮的酒杯，而完全忽略了主人的热忱与试图传达的友情。事实上，罪犯很可能会觉得，这做东的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头脑愚笨。最终他会决定如此软弱之辈怎配得这么多宝物。然后他会度过整晚的时间，弄清楚自己如何才能在深夜潜返，顺走主人所有的财富。

任何熟悉过去百年共产党历史的人都能立刻认出类似的头脑运作。二战期间苏联公然滥用美国的友谊与慷慨是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人属令所有与其工作的人感到迷惘，因为他似乎不理性因此叵测。但实际上，马克思人种将其思维简化到了原始自然界中最低的价值共同点。他完全按照自私生存的丛林法则生活。就这些而言，他算计精准得像做数学题一样。不管太平还是乱世，他的反应始终是原始的，并因此高度可预测。

由于马克思人属认为自己完全是由尘土构成的，于是认为自己不扮演任何角色。他拒绝自己有灵魂的可能性，并否定自己永生的潜能。他认为天下没有造物主，人生没有存在的目的和理由，万物不过是自然界偶然事件力量的累积而成。

缺失道德的存在，他以直接简单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自保是他给出对其行为的唯一理由，“自私的动机”或“愚蠢”是他对别人行为仅有的解释。对马克思人属来讲，签订了五十三项条约，其后撕毁其中五十一项，并不是伪善而是策略。令所有人的思想服从到掩盖事实真相并不是欺骗，而是必要的政府工具。马克思人种已经说服自己，没有什么邪恶的事情不可以做权衡之计。先前人类试图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荣誉与道德定义的界限，全被他挣脱了。

历史在演示，由于他的精神状态，马克思人属可能是所有人类中最没有安全感的。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目的宇宙中的偶然现象，他有无限的欲望将所有事物置于自己完全的宰制下。他承认不完成这之前，他无法感到安全。他不仅必须征服全人类，他还分配给自己征服物质，征服宇宙，并征服所有宇宙现实力量的任务，如此才能给混乱的自然带来秩序。他必须这么做，他说，因为人是唯一存在的生物具有这偶然且很幸运的能力，进行有智慧的创造性思考。他认为既然马克思人属是最

先进种类的人，那么他必须承担至高无上的责任。他非常诚挚地宣布，提议马克思人属成为全地球终极总督兼上帝，之后是全宇宙。

在如此广泛的理论野心的冲击下，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这种意识形态幻想曲的情感浪潮中，并让自己沿着潮流前进，朝向他们曾期望的人造乐土的岸边。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冒着生命危险重返现实。每个回来的人都有同样的故事。发现马克思人属的举止就像丛林刚毕业的生物，就像他认为的一样。他对所有人都感到不安的怀疑，对任何问题的回应都似乎他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尽管他要求统治全人类的权利，却轻蔑地拒绝几千年来人类经验最基本的教训。返回的朝圣者见证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人属颠倒了历史的方向。他挑动了人类反人类。

当今人类处于这历史危机中。马克思人种降临地球的时间太不符合逻辑了。这个时代当技术进步终于能使全人类吃饱穿暖，有地方住时，马克思人种对这一和平成就却造成了军事威胁。在几乎所有其他民族都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国，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日子里，他的不安全感驱使他要求对人类事务进行完全控制。尽管人类能够超音速飞行，并有能力提供所有文化与民族之间频繁亲密地接触，但马克思人种坚持要建造铁幕，如此他才能在后面秘密的工作。

马克思人种毫不掩饰自己的终极目标。他要统治全世界。因为马克思人属还处于青春期，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一次贪婪地吞噬全人类。因此，他必须满足于一次一小块。正如我们之后将看到的，他采用了一个有序的“征服时间表”，对其紧追不舍。根据共产党员的预言，自由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多了。

此困境使受到惊吓的未被征服的人类，只剩下三个可能的未来行动方略：

- 1.他们可以温顺的投降。
- 2.他们可以试着共存。
- 3.他们可以计划把这叫嚣的恶霸拉下台。

就笔者而言，对于自由人类最终必须采取的行动路径，绝对毋庸置疑。事实上，这是生存法则所允许的唯一选择。感受过自由在脉搏中跳动过的人，肯定没有一个能支持投降作为解决方案。而且知道致命的共产主义“共存”计划的背后是什么的人，定不敢接受此建议为长期解决方案。

那留下了什么呢？

几年前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笔者发觉到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们早就知道有具体的方式，可以冷的制止共产主义。此外，如果自由人类及时行动，那么这无需战争就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写此书的原因。写作时被劝告，现代人将是愚蠢非常的，如果他们接受马克思人属现象成为地球上的永久装置。

有充分的历史原因，并且浅显易懂为什么每一个合法的影响力，都应该用与承担移除这块正常人类发展进程的路障。必须这么做是为了马克思人属以及其他人类的利益。他是一个人造实验的受害者，陷入了他自己无限循环的自我否定中。只要自由人占地球上的大多数，就有很大的机会打破这个循环/车轮。然而要这么做，自由人必须明白事理并成为动态的整体，至少要与马克思人属虚幻但坚定的目标一样强大。

此研究结尾列出了些许政策，如果即使运用，能够移除马克思人种扔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些政策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以及其终极目标后，自动浮现出来的解药。这些冰冷事实也来源于我们试图跟马克思人种打交道时的尝到的苦涩经历。

若是够多的人研究这个问题，以一个广阔的联合战线穿越全世界，完全有可能人族能够在二十世纪末尾庆祝实现这一巨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时代，所有人都享有自由！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了解两个人。第一位是共产主义的鼻祖卡尔·马克思，第二位是他的搭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我们将尝试以共产党员介绍他们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生活 — 并不是像很多教科书中急切的描述他们为斯文有远见的社会改革者，而是在他们最亲密的追随者眼中的握紧双拳渴望权利的革命家。尽管以简要的形式进行介绍，本章试着包含充足的细节，以便读者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家称其鼻祖为“天才”，却又坦率地承认他是一个“暴力的，爱争吵的，具有争议性的人，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马克思受过良好的教育吗？他的国籍是哪里？他大部分的革命著作是在哪里完成的？

马克思怎么从未有过任何职业，职务或可靠的谋生手段？

恩格斯与马克思怎么不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提出的六个主要目标是什么？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为“废除上帝”？为什么他认为他的《资本论》('Capital')一书会改变全世界？

为什么马克思两次通过建立组织，试图推进世界革命都失败了？

伦敦 1853

1853年，在一个寒冷有雾的日子，一位英国政府官员站在小雨中，在伦敦贫民窟中心的一间陋舍门前。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才被接待。当这位官员进入房内，一股浓密的烟雾扑面而来，呛得他咳嗽连连，眼泪刺得直流。透过薄雾，他看到了这位陋舍的主人，一个上身肥大，头发蓬乱，胡子浓密的男人。这个男人操着浓厚德国口音招呼着官员，递给他一个土烟斗，然后比划他向一把靠背折断的椅子。

如果这位官员不了解情况，他绝猜不到他面前坐着的这个大胡子是一位大学博士。也绝猜不到他的妻子，刚刚把孩子们赶进后屋的，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然而情况就是这样。这曾是卡尔马克思博士夫妇的住所。

当时卡尔马克思是一名政治逃犯 — 已被驱逐出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英国给了他和其他欧陆革命领袖居留地，为此马克思感激不尽。这给了他一个终身的基地，在此可以继续他的革命工作。

具体在这一天，这位官员的出现不必造成惊慌。只是英政府对所有居住在英国政治流亡者的例行查访。这位官员也无敌意。他发现马克思夫妇很奇怪但是有趣的人，他们可以幸福地坐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混乱的家庭环境中，愉快的畅谈世界问题。这位官员后来在他对马克思一家的正式报告中，写下了他对马克思困惑的观察：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糟糕的街区之一，因此也是最便宜的之一。他占用两个房间。能看到街的房间是客厅，卧室在后面。两个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或像样的家具，所有东西都是坏掉的破烂不堪的，上面布满了灰尘，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客厅中间有一张用油布盖住的老式桌子。上面放着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儿童玩具，他妻子缝纫篮里的杂物，杯口破了的茶杯，脏勺子叉子餐刀，煤油灯，墨水瓶，不倒翁，几个荷兰土烟斗，烟灰 — 全部堆在同一张桌上。。。但这所有的东西一点也不让马克思夫妇有半点难堪。你被最友善的方式接待，并被殷勤的递上烟斗，香烟和其他任何有的东西。最后聊天时的机智有趣，让你忘掉所有家庭的不足。”

从而介绍了贯穿十九世纪历史页面，最具戏剧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一个死后比生前影响力更大的人。传记作者们将费解于马克思充满谜团的一生。马克思曾一度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然而过了一阵，就连他的门徒也感到被迫称他为“一个暴力的，爱争吵的，具有争议性的人，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敌视全世界的人并始终保持警惕以免他不能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此些即是这矛盾的，人类动态狂涛巨浪般的力量，在卡尔马克思动荡的人格中展现出来。

马克思的早年生活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在德国特里尔市(Treves)初见天日。他丝毫无需为他的祖辈们赔礼道歉。他双亲祖上很多辈的男性，都是杰出的学者和犹太教牧师。然而，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决定与过往的信仰与职业决绝。他带一家人离开了当地的犹太教会，而成为了新教徒；获取职业律师的专业认定后，更与新教徒打成一片。当传统家庭的系泊被拔除时，卡尔·马克思年仅六岁。并且有些马克思的传记作家归咎他后期对宗教的反对，于他童年此次突然的信仰改变后沉淀下的矛盾。

在小学，年少的卡尔展现出自己聪明敏捷的学习能力。他也显露出一个将困扰他终生的特质 — 他交不到朋友。在马克思所有的写作中，我们鲜少发现他提及任何幸福童年的回忆。传记作家们说他太紧张，太焦虑与宰制局势，太在意个人成就，自我独断时太强势，所以留不住多少朋友。然而卡尔·马克思曾经情感丰富，并真切渴望关爱。当他十七岁开始大学生涯时，曾写给父母的信件中偶尔流露出深层的情感，女性般的感受。这是一个例子：

“希望笼罩在我们家庭上的乌云将逐渐散去；能允许我分担你们的痛苦，并让我的泪水与你们的交融，还可能与你们直接联络，表达这深厚无量的爱，我以前一直不能表达出来我的内心；也希望您，我永远敬爱的父亲，考虑我心中暴风骤雨般的感受，可以原谅我。因为我的心在您看来一定是经常误入歧途的，当我精神的苦难剥夺了其表达的能力。诚盼您早日康复，让我能双臂抱住您，并倾诉我的所有感受，我将永远是您挚爱的儿子，卡尔。”

如此的表达一定让年老的马克思感到困惑。马克思父亲一辈子从没有能够劝告或批评这个脾气暴躁的儿子，而不导致一次情感爆炸。卡尔·马克思的信件中经常提及他与父母暴力的争吵；卡尔父母的信件则抱怨他的自私自利，缺少对家人的考虑，长期索要钱和他对大部分家书不回信的失礼。

青年的马克思

1835年秋天，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学习法律。这是混乱瞎忙的一年。他加入了一个酒会，搞得自己债台高筑并差点因“深夜酗酒闹事”被大学开除，而令他父母蒙羞。他的学业大多差强人意，并威胁道自己将放弃法律去当个职业诗人。1836年夏天，他与人决斗，眼睛受伤。波恩大学最终决定，如果卡尔·马克思转到其他某大学会对其比较好。年长的马克思爽朗地同意了。卡尔被送往柏林。

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时，卡尔·马克思的知识力量更强健了，而且他一生的格局开始成形。尽管他遵从了他父亲的愿望去学习法律，这只是个三心二意的伪装来掩盖他对哲学探索的狂热。在此探索的过程中他父亲死了，马克思立刻跳出来宣布，他将寻求学术界的发展。他期望占据某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席位。马克思选择他的博士论文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两位古希腊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of Epicurus.”）

在这个研究里，他偏爱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因为它允许了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物质原理。他认为如果物质是本体动态的，那就不需要一个造物主了，一个宇宙的设计者或统治力量。马克思的反宗教情绪在他的论文里更展现出来，他选择论文的座右铭为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呼喊：“一句话——我恨所有的神！”在这段知识的孵育期，三件事情主导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他渴望发现一个自然哲学体系；他渴望完全否定所有形式的宗教；他渴望赢得冯·威斯法兰男爵(Baron von Westphalen)女儿的芳心。

当时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他陷入了一个左翼黑格尔学派，他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的追随者。当时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消耗在图谋清算基督教。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稣的一生》(“Life of Jesus”)一书中，震惊了全德国；他的论点是福音书籍并非真实历史文件，而只是神话；他相信是由早期基督徒的共同想象演化而来。马克思的一个亲近同事，鲍尔(Bruno Bauer)，关于相同题材在1840年创作标题为《对福音概要的历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Synoptic Gospels”)一书。他在此书中宣称，福音都是伪造的，耶稣从未存在过，他只是杜撰的人物，因此基督教是个骗局。

此时，鲍尔和马克思决定他们应大胆的出版一个无神论期刊(Journal of Atheism)，但杂志缺少财务赞助而死于胎中。

然而，反基督教运动得到了另一个巧舌如簧的主角名叫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他于1841年带着他《基督教的本质》(“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一书跳出来。他不仅嘲讽基督教，还提出论题，说人是全宇宙最高形式的智慧。这个异类的推定，瞬间令马克思着迷了。他将同样的想法写入了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已经直截了当地说有必要“将人类自我意识本体认定为最高的神明！”

政府对这场反基督运动的应对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马克思决定提呈他的论文于就读的柏林大学会有危险。他的朋友鲍尔建议他去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马克思遵从了这个建议，于是在此学府于1841年四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过了不久，一记重拳抹杀了他成为某德国大学哲学教授的热情志向。这是由于马克思与鲍尔一起创作了一个传单这件事，因其革命的味道被严厉调查。当德国官员找出其作者后，鲍尔迅速被波恩大学解雇，而马克思则被告知，他绝不会被允许在任何德国大学任教。

当时马克思心中的革命精神火焰高涨；他必须设法展开一场运动来重塑世界。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他觉得他必须有珍妮·冯·威斯法兰(Jenny von Westphalen)的陪伴，她是一个德国贵族的女儿，迷人又受欢迎，曾住在马克思的老家。他们俩通信往来七年。他的一封信讲明了如果嫁给他，她将成为一个革命家的妻子。他说：“珍妮！假如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灵魂焊合，那么我将轻蔑的将我的手套甩向全世界的面孔，然后我将跨越废墟成为缔造者！”

1843年六月，举办了婚礼。当时新郎没有工作，而珍妮很快发现这将是一个他们整个婚姻生活的永久特征。关于丈夫对一家之主的责任，卡尔·马克思从未获取过丝毫的理解。尽管这样，珍妮保持对马克思忠贞地奉献，如果是个气概更弱的女子，早就崩溃了。婚后他们的蜜月行程走了五个月，之后他们去了巴黎，马克思希望与人合办一个革命刊物，称为《法德年册》(“the Franco-German Year Books”)。创刊号发行后不久就倒闭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十五个月里，时间都花在“读书与写作”这类惬意的工作上。

这将是 he 一生的常态。后来岁月里，当他的家人在挨饿时，他可以在图书馆倾注于对他是有兴趣的，但完全无偿的高等数学研究。伏尔泰奚落道有种人，他们无能持家，只好撤退到阁楼，在那里他们可以经营全世界。马克思似乎符合这一形态。尽管他似乎身体懒惰，马克思其实能够进行惊人量的智慧工作，如果是涉及他感兴趣的课题。反之，他压根儿不动。由于这些个人特征，马克思从未入过一个行业，有过职务，一个固定职业或可靠的谋生手段。关于他这段生涯，一位友好的传记作家写道：

“普通工作让他感到无聊；传统职业令他失去幽默感。他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连衬衫都当了，却能以王者风范打量全世界。。。他一生都很穷困。他努力应付家庭和家人的经济需求，却是滑稽般的无能；他对金钱事物的无能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挣扎与灾难。他总是负债累累；不断地被债主逼债。。。他一半的家当总是在当铺里。他的开支怎么也做不平衡。他破产得非常混乱。恩格斯给他的几千又几千，在他手缝里化得像雪一样。”

这带我们到了卡尔马克思唯一的挚友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呈现对立。他身材高大，体型匀称，生气勃勃并且本性善良。他热爱田径运动，喜欢人群还天性乐观。1820年11月28日，他出生在德国巴门(Barmen)市，父亲是纺织品制造商，在德国巴门和英国曼彻斯特都有很多大工厂。恩格斯从小就在他父亲钢铁般的纪律下打磨，他学得蔑视纺织工厂和它们所代表的一切。随着他长大成人，就很自然地站到了“工业无产阶级”一边。

对一个资产阶级商人的儿子来说，青年恩格斯受教育的短缺令人吃惊；至少没有过任何博大精深的大学进修。但他在正式教育上的短缺，通过勤奋与天分做出补给。他花了不少时间在英国，并精通了英文和法文，娴熟到能够赚取两种语言左派刊物的稿费。

传记作家们强调过尽管热诚英俊的恩格斯与忧郁多疑的马克思有很多个人特质的不同，然而两个人追随了完全相同的精神发展路线。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与他的父亲也有创巨痛深的争吵；花时间阅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的一生》；加入了那个吸引了马克思的左翼黑格尔学派；信奉了不可知论并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对工业革命自由企业经济体失去信心并断定世界唯一的希望是共产主义。

恩格斯很早就仰慕马克思，但无缘一见。1844年八月，他专门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两人之间磁性般地相吸引，一拍即合。十天之后，两人便觉得一起合作是命中注定的。就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改造了恩格斯，从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党员变成彻底的革命党。他让恩格斯坚信，人类在欧文(Robert Owen)与圣西蒙(Saint Simon)的理想主义中是毫无希望的，现状召唤一次武力革命推翻现有社会。恩格斯完全同意，然后返回了德国。

六个月后，马克思连同其他革命家遭法国驱逐，然后搬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居住。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庭》(“The Holy Family”)一书，旨在他们身边召集那些共产党员，那些愿意与所谓的“和平改革”慈善事业，乌托邦主义和基督教教义完全断绝关系的人。革命的红旗已然高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自认为其至尊的护旗手。

马克思与恩格斯奇怪关系的迅速发展，只有意识到恩格斯认为与马克思这样的天才合作是其荣幸时，才能被理解。还有不少类似情况；他认为能承担支持马克思财务的责任是一种荣耀。马克思被法国逐出后不久，恩格斯把手头所有的现金都送给了他，还保证有更多：“请理所当然地收下我近期英文文学作品的稿费，能够为您效劳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我现在没钱也过得去，因为我老爷（父亲）将会给我开销。我们不能让那些狗腿子置您与财务窘困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组成了新的搭档，给了两人勇气要立刻发展一个国际共产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基于暴力革命的需要。他们计划利用德法工人作为他们新政治机器的脊柱，但这将证实为极令他们失望的。与法国工人呆了几个月后，恩格斯训斥了他们，因为他们“倾向于最荒谬的白日梦，想用和平计划开创普世幸福”。他跟马克思讲，法国的革命火种完全不存在。因此无法按计划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接管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1847年八月，他们成功取得了布鲁塞尔“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 Society)的控制权。这立刻让他们在欧洲改革组织中得到了威望，并给了他们第一次机会向英国延伸影响力。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想不到，英国而不是欧陆，将成为他们革命工作的总部。

《共产党宣言》

1847年十一月间从伦敦传来消息，“正义联邦”(Federation of the Just 后称“共产联盟” Communist League)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布鲁塞尔共产机构的代表，参加他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出席了大会，还几乎接管了它。几乎整夜不睡拟定他们的计划并且开会时运用狡猾的伎俩，成功地令大会采纳了他们所有的基本观点。之后两人受委托草拟一份原则声明或“世界宣言”。他们返回布鲁塞尔并立刻开始工作，马克思在文字中倾注了他对革命炽热的召唤。当完成后，他们已经向人类宣布，国际共产主义的新计划代表着：1.推翻资本主义，2.废除私有财产，3.消除以家庭为社会单元，4.废除一切阶级，5.推翻所有政府，和6.建立共产秩序，财产公有制，在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里。为了达成目标，《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了要采取的做法：

“简言之，各地共产党员都支持任何反对现有社会条件的革命运动。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枷锁，他们要赢得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

1848年的革命

革命赤色眩光的到来比马克思或恩格斯预料的早很多。1848年二月，当时《共产党宣言》上的墨水还没干呢，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联合了资产阶级对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的怨恨，随

后的暴力起义将皇帝赶出了国境。之后，一个临时政府立即成立；其中包括共产联盟的成员，他们迅速传唤马克思前来巴黎。当马克思到达法国首都时大权在握，激动得满面红光，得到了共产联盟总部的全权授权，在巴黎建立国际总部并在此策划其他国家的革命。

马克思获悉，法国起义令人陶醉的成功促使临时政府中激进分子要将“军团”(legion)派往周边国家。他们的目的是在每个周边国家都发动起义，并将革命聚成一股熊熊烈火。虽说这正是马克思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他突然意识到此刻如此的战役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使他们在派遣军团的国家中失去群众支持。尽管这样，该计划仍被采用了，第一支军团向德国进军。马克思紧随其后，并开始用他的母语出版一革命期刊，称为《莱茵时代报》("Rheinische Zeitung")。

革命领袖们很快发现了马克思是个宣传工作的累赘。这将变得痛苦般的明显，当他和其他共产联盟成员被派往莱茵河谷组织劳工时。马克思被邀请在“德国民主大会”(German Democratic League)上致辞时，却糟糕的搞砸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卡尔·舒兹(Carl Schurz)说：“我殷切盼望听到如此著名的人口中谈吐的哲理。我十分失望。马克思所讲的无疑是有分量的，条理清晰的。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态度如此傲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不会花半秒钟考虑任何与他相左的意见。他公开蔑视每个与他矛盾的人。。。被他冒犯举止伤害到的人更可能投票支持与他意愿背道而驰的一切。远没有赢得新党羽，他还赶跑了很多本来可能支持他的人。”

德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一直贫血，直到1849年4月16日，发展到快要耻辱垮台地步。马克思被当局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他匆匆借到了足够的资金并用红墨水打印了他报纸的停刊号，然后急忙奔往法国寻求庇护。

但法国也藏不了身。马克思身无分文筋疲力尽的抵达巴黎，却发现共产党在新共和国内的影响力已经消亡殆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落入了多数保皇党派的手中。

他火速逃离法国，因为没钱，丢下了家人让他们随后跟进。他决定前往伦敦终生流亡。

共产联盟的终结

尽管马克思不得不将家人塞进一个伦敦贫民窟的单间公寓，但他觉得家庭幸福感已经足够满意了，他立刻将注意力再次专注到复兴革命之火的任务上。尽管有这种奉献精神，但马克思领导的工夫弊大于利。他躁动地精神总似乎在他的联邦队伍中引起分裂和争吵，不久之后，他几乎将自己与前同事们隔绝了。在他的影响下，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被带走并被转移到德国科隆(Cologne)；在那滞留到1852年，当德国所有的共产党领导者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狱刑期。马克思竭尽全力去拯救他疏远的同志们。他收集了文件，招募了证人，并提供了多个他觉得可能有助的法律论点；尽管如此，当时被审判的所有党领导因积极革命活动被判决“有罪”。这敲响了共产联盟的丧钟。

马克思的家人

打这时起，马克思一家以极贫穷的条件住在伦敦。这段时间马克思的信件中表达了一种怪异的情感组合。一方面，他表达了心中对妻儿生计的担忧。他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件中坦承道他妻子“深夜的眼泪与哀叹”几乎无法忍受。然后，在这封信中他继续轻浮地解释自己如何全职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便找出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

1852年，他的小女儿弗兰茜卡(Francisca)去世。两年后，他年少的儿子埃德加(Edgar)过世了，然后再过两年一个女婴在出生时夭折。

马克思夫人在她一封信的几段话中，标志了这位女子的坚贞；她看着自己半饱的孩子在她身边濒死，而他们的父亲则日以继夜地呆在大英图书馆里。

“让我讲讲此生中的那一天吧，一如实情。。。由于在这里乳母非常昂贵，我下定决心，尽管乳房和后背都有糟糕的疼痛，还是自己哺乳宝宝。但可怜的小天使随着奶水还饮下了很多痛楚，他一直发抖，日夜都在剧痛中。自从他来到世间，一夜都没有睡整过，最多两三个小时。最近，有过几次剧烈的抽搐，孩子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当如此发作时，他吸吮大力得使乳头酸痛流血；血常常顺流到他小嘴里。有一天我正像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地主婆来了。。。由于我们不能立刻付清这笔钱（五英镑），两个掮客闯进屋，抢走我所有的东西 — 被褥，衣服，一切，甚至宝宝的摇篮和闺女的玩具，以至孩子们悲酸的啜泣。他们威胁道两小时后将拿走所有家当（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如果真发生了，我就只能和我的孩子们躺在地板上挨冻了。。。”

隔天，我们得搬家。天冷又下雨。我丈夫试着找地落脚，但只要他说有四个孩子就没人愿意收留我们。最终一个朋友帮了我们。我们付清了欠的，然后我赶忙卖了我所有的床和被褥，如此才能跟药店，面包房和送奶员结账。”

年复一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互通了足有几百封信件，几乎每一封都非此即彼地谈及金钱。恩格斯的信件里包含这个特定语句：“随函附上五英镑邮局汇票”，而马克思的书信则充满了躁怒的语段，例如：“我母亲向我担保她绝不会支付任何开给她的账单。”“十天之中，我们家一个魂都没有。”“你该同意，我在小资产阶级醋缸里面已经被浸透了。”

在这悲惨苟活的某一刻，似乎突然有了一束希望之光。在一段尤其绝望的时期，当时恩格斯给不了任何救济，马克思出差到荷兰，在那里一位富裕慷慨的叔伯资助了他一百六十英镑。这足以让马克思在经济上站起来，偿还他的债务并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但当他口袋有了钱，马克思决定去德国旅游一圈。他去特里尔看望了他的母亲，然后前往柏林，和老朋友们饮酒作乐，给自己拍照留念，并通常扮演一个休闲绅士的角色。两个月后他回到家中，马克思夫人欢迎了她的逍遥丈夫，寻思着现在账单可以付清了，可以买衣服家具了还可以租好房子了。她却骇然得知那一百六十英镑已所剩无几。

创建“第一国际”

1862年，伦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际展会，骄傲地展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工业成就。展会的主办方满心想营造一股国际友善意愿的氛围，因此邀请所有国家不仅提交展品，还请他们国家工人组建代表团来展会与其他国家代表交换想法与美意。

英国工党领导者们，自从1860年起就开始不断壮大力量，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建立一个国际工人机构。因此他们把握每一个机会与意大利，德国，法国，波兰和荷兰的工党领导者们建立牢固的友谊。时机适当，他们将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总部设在伦敦。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位名叫埃卡瑞斯(Eccarius)的裁缝，共产联盟的时代他曾是马克思的副官。一等新运动成了气候，马克思就被埃卡瑞斯邀请加入。

马克思立刻开始树立他自己 — 但没出格。这是他从“共产联盟”失败中学到的部分教训。这个新机构称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就是常说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只要马克思克制自己，就能够在多国工党领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通过幕后的小心操作，他几乎可以让他所有的想法被采纳，取代了“社会意识改革者”脆弱的和平方案。但这一切对马克思都似乎是忍气吞声并不自然的。他向恩格斯坦诚过，他不得不被迫做出妥协以保和睦：

“我的全部提议都被小组委员会采纳了。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承诺在章程前言中插入两个关于“职责”与“权利”的字眼；还有关于真理，道德与正义，但它们被处放的位置使它们造不成任何伤害。。。还要过些时候，重新觉醒的运动才能允许旧日言辞的坦率。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强硬，形式上温和。”

尽管这决心要“温和”，但不久之后，马克思的真实想法便如闷雷般浮出水面。他关心两件事情：第一，需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革命分子硬核，他们能够煽动所有国家主要工业的工人，下决心行动；第二，需要消除任何在新运动中可能威胁到马克思领导地位的人。马克思在考虑的是党内清洗。”

第一个感受到新运动力量的是德国工党领袖，冯·史威哲先生(Herr von Schweitzer)。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门徒们都似乎同意，当处理某位同志被挑出来党内清算时，他们俩是毫不留情的。他们针对史威哲指控的宣传大方向是声称他为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工作。虽然这纯属子虚乌有，没什么能够更毁灭史威哲的声誉了。即使在今天，些许历史学家仍以马克思的控告为依据，宣称史威哲是工党的叛徒。

另一个遭到清洗的党内支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第一个对革命活动感兴趣的俄国人。他从某俄国监狱逃出，并定居在日内瓦(Geneva)。巴枯宁变得非常热衷于倡导马克思的原则，以至于工人运动的某些部分开始倾向他做领导人。这是致命的。马克思立刻着手去消灭他。运用的技巧与针对史威哲是相同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控巴枯宁是一个俄国沙皇的间谍。这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然后他们又散布一个控告，后被证明是完全诬陷 — 巴枯宁贪污了25000法郎。最终，行使了安乐死，马克思成功使“第一国际”将巴枯宁从协会中逐出。此举之后马克思心中觉得他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可能严重威胁到他领导地位的人。马克思不知道的事实是，尽管受到如此欺凌，巴枯宁仍将忠于马克思的准则，甚至将马克思的书籍翻译为俄文，而因此播下了火种，最终将把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国家置于共产党独裁统治下。

然而，马克思焦虑地要清洗“第一国际”内所有他的劲敌，造成了如此激烈的猜疑，不信任和党内纠纷，导致了该机构被彻底摧毁。事实上，在巴枯宁被驱逐后，“第一国际”的终结就在眼前了。英国的工会开始抛弃国际革命的大义，而且欧陆的工人团体开始无视协会的指令。最终在1873年9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后一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而马克思发现最终同意出席的十三名代表几乎得从“地底下挖出来”。就所有实质意义而言，“第一国际”已死。

马克思写一本书来改变全世界

马克思意欲将“国际工人协会”打成一个宏大的世界运动，动机大多来源于他渴望将其难以定稿的理论付诸实现。几年来，他纵情在自己得意的两项事业中 — “第一国际”和他的“书”。两项事业耗尽了他的正常体力。这导致他的肝病宿疾复发，没过多久他患上了红斑疱疹，几乎要布满他全身。疾病纠缠了他的余生。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对遭受的痛苦与失落大吐苦水：

“整夜无法入睡后，我发现胸口又起了两个头等的脓肿，令我极度恶心。”他继续写道：“我正在像一匹役马般工作，鉴于我必须充分利用所有时间来工作。而且痛疮还在，虽说它们现在只造成局部疼

痛，并不干扰我的大脑。”在一次严重病发后他写道：“这次是非常严重 — 家人并不知情。如果再复发三四次，那我就要完了。我一直萎靡不振，还一直该死的虚弱，倒不是在头脑，而是身体和四肢。。。想坐起来没问题，只是躺着的时候，我还能够间断的钻研工作。”

马克思所指的“工作”是《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的研究准备。马克思坚信，除非工人群众拥有一套关于历史，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革命哲学理论，否则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他创作《资本论》旨在说明为什么暴力推翻现有秩序不仅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别处，我们将考究马克思的理论，但此刻充分证据指明，马克思视创作这本书为一件苦差；但不得不完成它，国际共产主义才能发芽并兴旺。

1865年间，当马克思仍在奋力为他的第一卷定稿出版，他对恩格斯说他想“赶快把它完工，这玩意已经成了我完美的噩梦。”他偶尔会病情好转，并终于写信给恩格斯：“关于那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的。十二月底已经写完了。”恩格斯向马克思担保，完成此书的痛苦与心悬对他也是一场伟大的考验，就像是对马克思的一样。他写道：“手稿送版的那一天，我将喝得烂醉如泥！”

直到1867年三月，所有修订才最终完成，然后马克思启程前往德国，以他的母语出版此书。没过多久，即开始发行。

但当《资本论》开始出现在书架上时，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文学凯旋。它的逻辑线条对工人群众来讲划分得太细，而对有知识的改革者们则毫无说服力。它将留给另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才以《资本论》为主要借口来攻击现有的事物秩序。

落幕的年份

到了1875年，马克思从他一生的斗争中几乎提不出任何满足感。“第一国际”在他身边土崩瓦解了，而为了论证他政策而写的书则在欧陆书店里积灰。马克思继续写了两卷书，但他心中的火焰快熄灭了。马克思过世后，这将留为恩格斯的任务将第二卷在1885年出版，第三卷在1894年。

马克思的暮年是枯燥孤单的。惨败之后，他转向了家人的怀抱。珍妮总会在那里给予温情与安慰。但马克思的孩子们则背负了成长的疮疤。当马克思干涉他女儿伊莲娜(Eleanor)的恋爱关系时，她与爱德华·艾弗林(Edward Aveling)私奔了，接着一段与他十分凄惨的存活后，自杀了。另一个女儿劳拉(Laura)嫁给了一个叛变的医生，之后与他一起结伴自杀了。

到了1878年，马克思几乎抛弃了他各个方面的工作。他磐石般的自信被砸得粉碎。工党领袖们无视他，改革者们嘲讽他。无论在本土或海外，他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份量。

当光阴的丧钟敲响给他除了恩格斯唯一的精神伴侣 — 马克思夫人，他的情绪濒于崩溃。这位温柔的贵族，饱受苦难的伴侣，于1881年12月2日死于癌症。十三个月后，马克思最宠爱的女儿珍妮(Jenny)也突然去世。之后恩格斯注意到，马克思老大哥，虽生犹死。在他女儿珍妮死后短短两个月后。在1883年3月14日下午2点45分，他孤单地坐在扶椅上死去。

三天之后，六七个人跟着卡尔·马克思的棺槨来到了伦敦海格特(Highgate cemetery)公墓。在那里，他唯一日久岁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宣读了悼词。是那种马克思会爱听的夸词。它授予给马克思生前从未有过的华丽赞美以表示毫不含糊的敬意。

结语

以此终结了卡尔·马克思轰轰烈烈动荡不安的生涯。不论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可悲的一生；充满了燃烧的野心，不断的挫折与连续溃败，无论从朋友或敌人的角度来看。可能马克思一生真正的悲剧，是其出于某些惊人的原因，他几乎本能地将自我毁灭的种子植入了他所倡导的任何方案中。

如果一个人研究他笔下无尽的作品 — 厚重复杂的书籍或大量狂热的搬弄是非的信件，很难不发现卡尔·马克思将他非常的自我本性精髓投射进共产主义中。他对政治权威的憎恨在其对全球革命的响亮呼喊中展现出来。由于他拒绝或无能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竞争，扭曲他对此经济体进行硫酸似的谴责并裁定预言其毁灭将势不可挡。他深度的不安全感促使他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一种诠释历史的手段，其宣称进步是不可逃脱的而且共产主义千年是不可避免的。他对日常生活中宗教，道德和竞争的个人态度导致他渴望一个时代当人类不再有宗教，道德或竞争。他想要生活在一个无阶级，无国家，无竞争的社会里，此处万物的生产皆丰富无比，而人们仅根据他们的能力生产，即可自动获取到一切物质需求的超富裕满足。

马克思和他精神子孙的另一个共有特点 — 共产主义 — 是其只能在远方观看才能被欣赏，即使是朋友。正因如此，传记作家们处理马克思时常似用分身术，有两个马克思。远观可以钦佩他的理论，但仔细近瞧马克思变成了不一样的形体。因此，巴枯宁可称马克思为“当今至上的经济与社会学天才”，而之后对马克思老大哥给出了如下评价：“马克思自大狂妄到疯狂的地步。。。

“马克思爱他自己远超于爱他朋友与门徒，没有友谊能够允许对他虚荣最微小的伤害。。。马克思永不会原谅任何对他的怠慢。你必须朝拜他，把他当偶像，如果他回敬你，你必须至少怕他他才能忍受你。他喜欢自己周围都是矮人，奴才和马屁精。尽管如此，他亲信里有些许杰出人物。然而总体而言，可以说马克思亲密圈子内几乎没有兄弟般的坦诚，而是一大堆阴谋诡计和权衡算计。多方自爱之间有一种默认的斗争与妥协；如果虚荣心作祟，就容不下任何兄弟情谊。人人都提高警惕，提心吊胆被牺牲，被消灭。马克思的圈子是一种相互崇拜社团。马克思是其长官颁发荣誉，但还总是那背信弃义与搬弄是非的，从不公开或坦诚，煽动对他怀疑的人进行迫害，或者只是没有表现出他所期待的敬仰的倒霉蛋。只要他命令进行迫害，卑鄙与臭名的手段就没有任何限制。

马克思经常对他的追随者的不宽容，犹如向他们头顶上浇沸腾的硫酸；可能被部分解释为他自己也不完全确定他炮制的理论是否真是那绝对正确的宇宙真理宝石。在他的鼎盛时期，马克思经常做出自信爆棚要地动山摇的声明，令他的反对者们瞠目结舌：

“历史的进程是在你们这一边的，”他对他的追随者喊道。“资本主义，是由历史演变的法则所造就，亦将被毁灭于这势不可挡的法则运作。资产阶级者，资本主义系统的商务经理们，和那个系统一起出现在了历史舞台，当那个系统下台时他们也该退场了。你们，无产阶级者，用你们的辛劳推进着资本主义，并用你们劳动的果实维系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但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有机产物，后者的精髓蕴含在前者的精髓内。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开始的到来是逻辑唯一的结论。你们无产阶级者，作为一个阶级，为扫除资本主义力量与趋势的一员，必定要终结资产阶级。你们只需要，作为一个阶级，履行革命犹如你们的使命在召唤你们去实现。你们只需要意志力！历史让这件事对你们来说轻而易举。你们不需要孵化任何新思想，制定新计划，发现新国度。你们不需要“教条般的展望全世界”。你们只需动手开始这等待你们的任务。你们行动的手段能在那无尽的，有目的的，持续的阶级斗争对抗中找到，其桂冠将是社会革命的胜利。

在马克思快要死时，没什么对他意味着他仍将被他所奋斗的未完成的事业所铭记 — 一场真正的革命。当西欧将暴力革命报销为仅一阶段的十九世纪社会改革，一只东欧的沉睡巨兽就要被马克思的武装革命野蛮的唤醒。这，当然是俄罗斯。

在研究俄罗斯革命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论，给世界共产主义门徒所留下的遗产。在这些理论中，能找到很多俄国革命事件的根源，同样解释其后的共产主义活动，否则这些可能很难或者根本无法理解。

第二章

共产主义的魅力

“何以这么伟大的一位科学家或任何受过如此广泛教育的人，被共产主义所蒙骗？”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次红色间谍的新曝光都让这个问题在大地上回响。很多人惊讶的发现，共产主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魅力，在于其包含了一个奇妙的“自然哲学”。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共产主义似乎确实解释了世间万物的起源与发展 — 生命，星球，星系，进化，甚至人类智慧。对那些没有研究过哲学的人来说，这些概念有时被证明是使人迷恋的并具有说服力的。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处理它们。

也许这些素材读起来会很费力。但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以这种简短集中的方式将容易消化得多，比起要花几个月时间试图在共产主义文学蔓延的技术性论文中挖掘。

每位读者都应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探求，直到发现以下问题的答案：

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两面性法则”(Law of Opposites)? 什么是“反向法则”(Law of Negation)? 解释“变化法则”(Law of Transformation)。

共产党员哲学家如何解释生命的起源？宇宙有设计者或某目的吗？

共产党员的概念，万物皆是小事件的累积(accumulated accidents)而成，这意味着什么？

共产主义有某神吗？费尔巴哈讲人的神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讲谁必须重塑全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合理化使用暴力？

共产党员“两面性法则”的基本谬误是什么？“反向法则”固有的谬误是什么？“变化法则”的弱点是什么？

共产主义的理由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力在地球上长存，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反对很多东西，而主要因为他们代表着某些东西。一句话，他们保证满足人类最大的两个需求：普世的和平与繁荣。

由于事实上共产主义承诺一千年给予所有世界上被分心的，不满的和不高兴的人确保了它有听众，不仅仅是弱势的工人们，还有很多贵族，很多富人，和很多政治与经济理论家。

当这些人开始聆听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如何实现普世的和平与繁荣时，他们马上分为泾渭分明的阵营，支持或反对共产党。一群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值得一试，尽管会给人类带来腥风血雨。（毕竟，如果它是通往永久和平的大门，再有一场战争算什么呢？）另一阵营则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所有体面的人类属性完全的否定。它将完整的覆灭人类数千年来奋斗的所有成就。

共产主义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在此章中，我们将试图简化共产党员的想法至其最基本的方程式。读者会立刻意识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处理的远比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经济要多得多。其实，他们研制出一个思想框架，旨在解释存在的万物。这套哲理是每个当代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骄傲与喜悦，因此值得详细审查。

共产党员的自然哲学

首先，共产党员的基本想法是世间万物皆可被一种东西所解释 — 物质。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物质是对原子，太阳系，植物，动物，人类，心灵意识，人类智慧与一切生命迹象的完全解释。共产党员哲学认定，如果科学可以了解物质的一切，那我们就能了解万物的一切。共产主义因此分配给科学如此艰巨的任务，使人类无所不知 — 了解所有真理 — 但将研究限制在一种现实体 — 物质。物质被结论性的接受为一切现实的起源与终结。

共产党员哲学接着阐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自然界中能量或运动的起源是什么？

是什么造成星系，太阳系，星球，动物与一切自然界不断地增长其数量？

什么是生命的起源，物种的起源和心灵与意识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三个物质法则，回答了所有问题：

两面性法则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入手于对存在万物的一观察 — 万物是对立面的组合或统一体。电的特征是其带正电荷与负电荷。原子是由质子和电子构成的统一体，但是相矛盾的力量（质子正一电荷，电子负一电荷）。每一个有机体都有吸引与排斥的性质。甚至人类通过内省而发现，他们是相对立特质的一体 — 自私与无私，勇敢与懦弱，合群与孤僻，谦逊与骄傲，阳刚与阴柔。共产党员的结论是存在的万物皆“包含两种，相互排斥的而且独有的，但却是同等必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部分或方面”。

以此共产党员的概念就是这个自然界中对立面的一体化，即使每一个个体都具有本体动能并提供了运动与变化的恒定推动力。这个想法是从黑格尔(1770-1831)那借来的，他讲过：“（自然界的）矛盾是一切运动与生命的根源”。

如此，介绍给我们对共产党员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观察。“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对共产党员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它代表了自然界的冲突思想。共产主义哲学的初学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辩证法的含义，如果每一次出现“辩证法”时替换这个词为“冲突”。

所以，现在期望读者可以理解，宇宙间的万物都是在运动状态，因为万物都是由对立力量组成的包裹，在里面争斗。这带我们到第二物质法则：

反向法则 — 在考虑了宇宙中运动与能量的起源后，共产党员笔手开始考虑自然界万物持续增加数量的倾向。他们决定每一个个体都趋于自我反向，来繁殖本体到更高数量。恩格斯引用了麦粒的案例，其在自然状态中，将发芽并在其自我死亡或反向后，产出一棵植物。这棵植物然后成长到成熟，然后本体又反向结出更多的麦粒。因此，所有自然界都在通过死亡来不断扩张。物质中的对立元素，其导致冲突并给予动能，也趋向于对物质本体进行反向；但出于这动态的死亡过程，能量被释放来扩张并产出更多的同类个体。

在考虑了宇宙中的数值增长后，共产党员哲学家们便开始考虑自然界中所有不同的事物。

变化法则 — 此法则陈述，某特定阶级的一个持续的数量发展，常常导致自然界的“飞跃”，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形态或个体。比如，考虑石蜡碳氢化合物的案例。

“化学证明了甲烷是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事实。现在，如果我们给甲烷增加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仅仅数量上的增加，因为这是构成甲烷的元素），我们得到一种全新的化学物质称为乙烷。如果我们给乙烷增加另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我们得到丙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化学品。数量上再加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产生了第四种化学品，丁烷。然后再定量添加一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产出第五种化学品，戊烷。”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立刻做出结论，这是自然界中“创造力”的线索。物质不仅是本体动态的并且倾向于自我增加数量的，而且通过数量累积也固有的能够进行“飞跃”，到新的形态，新等级的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感受到，他们不仅发现了一个“物种起源”的解释，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解释，这世间最大的悬疑：什么是生命？

生命 意识及心灵的起源

基于此原则共产党员哲学家们认定，生命现象是如此飞跃之一的产物。恩格斯声明，物质的复杂化学结构进化至蛋白物质的形成，而生命诞生于这些蛋白物质。事实上，他坚称，就像不能有物质而没有运动，也不能有蛋白质而没有生命。这是蛋白质固有的属性 — 自然界中一种更高形式的运动。

恩格斯还提出，当生命瞬间在蛋白物质中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必然会增加其复杂性。辩证唯物主义是进化的哲学。然而，共产党员不相信自然界的新形态是由于逐渐变化而来，而是数量上的倍增以积攒某“飞跃”的冲力，以此产生变化或新品种。

共产党员认为，伴随着这些飞跃之一，意识现象出现了。这个生物变得察觉到其被施加的某种力量。然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另一种能够运用这些新呈现印象的生命形态出现了 — 用关联性组合印象 — 并以此心灵诞生了，作为物质中一个有智慧的，察觉自我的和决定自我的品质。但是，物质是主要的，心灵是次要的。由于如果没有物质就没有心灵 — 因此，不可能有灵魂，没有永生，没有上帝。

随着变化法则的制定，共产党员自然哲学得以完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他们对人类的宇宙理解，做出了巨大的智慧贡献。通过这些法则，他们认定自己已显示：

一。物质是由对立面组成的一体，其产生冲突而使其本体动态并自我发动；因此物质运动的表现不需要外部力量来源。

二。通过其持续反向或死亡的模式，自然趋于自我繁殖并以有序的发展或增加来填充宇宙，无需任何指导的智慧；

三。通过变化法则，物质有能力产生新形态，而无需任何其本体外的创造或指导力量。

恩格斯吹嘘道，以发现此三法则“外于此世某造物主的最后痕迹被湮没了”。

以此简短的总结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相信，存在的万物皆由自然界中无尽的运动力量作用而来。万物皆是“小事件累积”的产物。没有设计。没有法律。没有上帝。只有物质与自然力量。

至于人类，共产党员哲学家教导，他们是一群动物毕业生 — 一个自然的意外就像所有其他生命形态。尽管这样，人类应有这意外的好运，能拥有存在的最高智慧。这么说是让他成为这个宇宙的真神。这正是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心中所想的，当他口中说道：“历史的转折点将是当人类意识到人类唯一的上帝就是人类自己的那一刻”。

这一点可以解释共产党领袖近乎极端狂热地，摧毁所有形式的宗教与对神的崇拜。列宁宣布：“我们必须打击宗教 — 这是唯物主义的入门课，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课。”当卡尔·马克思被问到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他讲：“将上帝的尊位废除并毁灭资本主义！”然而，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他们在弃绝了上帝，经文，道德，不朽，永恒审判，灵魂存在与个人生命尊严之后，辩证唯物主义者转向了崇拜他们自己。

他们认定，人类是大自然成就的完美精华，而因此为宇宙的中心。

而假如人类应是这现存的最高智慧，那么重塑这世界就显然成为他们的职责。马克思自然地相信，此职责是共产党员领袖们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真正科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如此事实，即重塑这世界将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任务，其将包括摧毁所有挡路的人。这是有必要的，他们讲道，旨令共产党员领袖一鼓作气地将社会与经济上人类瑕疵的罪恶扫除，然后逐步建立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其将使全人类科学地，安全地并幸福地生活在所有未来时代。

然而在采取如此大胆行动之前，共产主义的鼻祖们意识到，他们将必须为其追随者们开发一种全新的道德伦理的诠释态度。列宁将其总结为如下：“我们讲我们的道德，是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者们阶级斗争的利益”。换句话说，无论任何能够带来共产党员物质改善的概念就是道德好的，反之就是道德坏的。这个概念仅是想讲“可以为目的不择手段”。作弊，撒谎，违反誓言或甚至杀人都不是错的，如果是为了一个好的原由。这种无道德守则解释了共产党员的缺德行为，其通常对非共产党员是难以理解的。

共产党员自然哲学的简短批判

从经验中观察到，一个刚加入共产党的人经常获取到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优越感，高于他未入党的伙伴们。他感到终于，宇宙以一简单易懂的方式摆在了他面前。如果他之前从未钻研过哲学问题，他可能会被那令人着迷的可能性而淹没，那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人类终于解决了所有需要理解宇宙的基本问题。在此心态下，他常会放弃他批判性探究的态度。他将招请大量灌输，因为他被完全保证他已终于发现了最终极形式的真理。

然而有很多说辞，机敏的读者会立刻认出为共产党员自然哲学的谬论。以两面性法则为例。此法则宣称所有物质都是相对立体的组合，透过此些对立元素展现的冲突，导出能量。这应能解释运动的

起源。但是，两个相矛盾的元素如果起初它们本体没有能量，怎么能合为一体呢。我们发现自然界中相矛盾的力量，它们单独存在时也是有能量的。把它们合为一体仅是合并已存在的能量或运动。因此，就像哲学学者们所指出的，共产党员的两面性法则并不解释运动；它假设运动已存在为前提。

正如一作家讽刺地比喻道：“两个惰性元素不能产生冲突并造成运动，就像一千个死资本家和一百万个死共产党员不能造成阶级战争”。

应当记得，根据共产党员的第二物质法则是反向法则。此原则为某个体内，相对立的力量趋向其本体反向，而通过死亡的过程，这些运动力释放出更广大发展。因此，一个麦粒发芽并被反向产出一棵植物，之后，再被反向产出大量新种子。以此方式解释了自然界中的数值增加。

但正如麦法登博士(Dr. McFadden)在其《共产主义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中所指出的，反向法则什么都没解释。它仅描述自然界中的一个现象。的确，自然的计划是进行繁殖扩大数量，但一个父母的死亡或反向并不一定在任何方面与其繁殖能力相关。任何生物的成长与死亡会往前进，不管它繁殖与否，而有些生物则繁殖多次在任何反向发生之前。

兼之第一与第二物质法则使共产党员哲学家立于此立场：运动与生命不仅是本体动态的，自我创造并瞬间出现的，而且由一麦粒到麦株的发展和此麦株繁殖出更多麦粒，是“小事件累积”的结果。恩格斯痛恨被留在此立场的可能，并爽快地同意“自然界中有法则，秩序，因果与必要条件。”尽管如此，他不将接纳自然中有智慧设计的可能性，而讲道麦粒产生植物，植物产出更多麦粒，是因为“此物的本性要求它”。为什么此物要求它？无论如何用哲学术语掩盖这一点，读者会很容易察觉到，恩格斯在论证盲目的混乱的自然机械运动力量，能够整理它们来产出错综复杂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是经过预先设计来实现一个预定的目的。例如关于一麦粒，有什么要求它本体反向并繁殖出一株植物？而且辩证唯物主义者用什么论证法则，来解释一个发芽的麦粒总是产出某种特定的植物，而不是任何其他植物的事实？

学术权威指出，恩格斯发展出一种思维模式，其得出的结论甚至他也承认不能在自然界被证明，而因此他退缩在一些晦涩的概论中，其门徒觉得是模糊不可捉摸的。

第三法则 — 变化法则 — 也描述了自然界中的一种现象，但未能够解释该现象。它肯定了自然界中，我们发现了遥远相隔的物种们，具有独特的品质与特征。虽然当某些“飞跃”可以被某些非有机物质产出，仅仅用数量积累（如石蜡碳氢化合物），但它并不解释这些新性质是如何产生的。此外当这同样原理被用来解释生命，为蛋白质中瞬间诞生时；共产党员哲学家在对一切科学经验打脸。大自然普遍显示，那只有生命才能孕育生命的事实。无论在实验室或自然界，至今还没有可能人造或自然瞬间产出生命。

这些共产党员哲学内的基本弱点是曾使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美国共产主义间谍最终信服他被欺骗了的因素。尽管共产党员辩证法的繁重术语，他终于变得坚信，那盲目的混乱的自然界中的物质力量是永远不可能产出 — 不论时间允许 — 人类在他身边能找到的那些高度复杂的物体。

正如这个问题的学者们所常指出的：“自然界本身随意产生一个如眼睛一样复杂器官的概率，考虑其千万微小的部分完全按照视觉的需要组合在一起，数学上几乎不可运算。而眼睛只是人体许多复杂部分之一。大自然产出任何一个器官和腺体所需要的精准物质组合，几率都与眼睛一样小。而这还没完。因为在人体内，所有的这些器官与腺体都被整合成一个完美的工作单位。而人类只是自然中无数的物种之一，动物和植物，其每一个都具有同样的精妙组合在其最微小的部位里。

正是这类的思考，其最终唤醒了惠特克·钱伯斯的察觉，他身边的现实要远远复杂并深奥于共产党员所声称“物质运动”能诠释或刚刚满足的。因此，他开始从共产主义哲学撤退。

然而共产主义最大的悲剧在于，其鼻祖没有止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谓其“无害推测”的事实。他们决心以他们感觉发现的原则，来渗透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因此他们推行一种对历史，经济，政治，伦理，社会计划甚至科学的新方法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承认，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可以讲它：“废除永恒真理，废除一切宗教，和一切道德，按新基础再构建它们而取代之；它因此与所有过往历史经验相矛盾”。

因为地球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现正在遭受此恐怖的“行动计划”，共产党员鼻祖认为其应该被强制于全人类为他们的终极美好，我们将试图发现共产主义提出将如何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

第三章

共产党员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态度

现在我们来到人们更熟悉的共产主义篇章。至少，会有更多的人听说过共产党员的行动计划，相较于我们刚介绍的共产党员自然哲学。每位读者都应能够回答以下些许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问题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已发现了一条必然的定律，其使他们有可能预测未来人类发展路程？

什么是“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什么是“活动者理论”(Activist Theory)？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有“自由意志”(free will)这东西吗？人类能否选择他们未来生活的社会，或是他们身边物质力量的受害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将人类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产物？

共产党员的“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理论是什么？为什么将其视为一种诅咒？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解释“国家”(State)的起源？为什么他们认为其是“不自然的”？

他们如何解释宗教，道德与法理学的起源？

在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应该完成什么？

为什么共产党员们讲“社会主义”只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

他们如何建议发展一个由无阶级无国界的社会组成的文明？

共产党员对历史的诠释

如今没几个人能有机会与某职业共产党员坐下并听取他的意见了。如果此机缘出现，读者会立刻接受到一印象，即某共产党员对人类过去的记载怀有崇高敬意。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他们对过去的研究，引导了他们发现一条贯穿全部历史的“势不可挡的法则”(inexorable law)，似一条闪亮的红线。他们更进一步地认为，如果追溯此红线，就有可能准确地预测人类未来发展的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什么？首先，他们认定自保(self-preservation)是人的至高本能，而因此为整个人类行为的格局，一定曾受制于试图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个辩证过程 — 人对自然。这引导他们至一纪念碑似的结论：一切历史发展皆是“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的结果 — 人为了生存而劳苦。他们讲道人类所做的一切 — 无论是组织政府，制定法律，支持某特定道德守则或宗教活动 — 仅是由于他渴望保护任何目前用于确保自己生活必须品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此外，他们认为如果某革命力量改变了生产模式，那么统治阶级将立刻开始创建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旨在保护新的经济秩序。

“是否需要深度的本能直觉来理解人类的思想观念与概念，简言之，人的意识随着物质存在条件的每一个变化而发生变化。。。思想的历史难道不证明了，知识生产的改变迎合着物质生产的改变？”

要欣赏他们的观点，那就有必要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心智运作的机械性概念。他们曾讲，在大脑从外界获得印象后，大脑将自动驱使此人行动（这是他们的“活动者理论”）。如果不激励此大脑拥有者行动，那么他是不会获取知识的。例如，当人们意识到奴隶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务农，务工并享受多种类型的服务时，这个知识驱动统治阶级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保护奴隶主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是如出一辙的，其本能地创建了一个社会来保护他们的资本利益。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讲的：

“你们的所有思想不过是你们资产阶级生产与财产条件的成长所孳生，就像你们的法理学（法律系统）不过是你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所有人的法律，此意志之特征与方向皆由你们阶级现有的经济条件而决定。”

以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相信人类可以在多种形态的社会中做出任意选择，而仅是那个促进普遍生产模式的。人类唯物主义构造的非常本性要求他这么做。“人类有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形态的社会吗？无法做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称为“自由意志”这东西，不过或多或少是感觉到的那推进力其驱使某个人做出行动；采取行动时他并不自由于改变他非常本性所裁定的路程。”

“共产主义毫不理解自由为选择的可能性，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而仅是在选择方向后使用多大力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人类心智接受到现有经济环境的知识并“选择”调转方向，其对维持当下生产模式是有必要的。他们是自由的仅是意义为，他们被驱动来决定他们将花费大量精力建立将延续这些基本经济环境的庞大结构，如政府，道德，法律和宗教。社会一切活动的地基里埋藏着“经济决定论”。“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模式决定了生活中社会，政治和信仰方式的普遍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觉得他们发现了对一些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个哲学解释。其实他们相信，二人已指明“经济决定论”为人类进展的基本创造力。在做出此重要发现后，他们感觉那如果他们能够设法强迫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完美化的经济生产系统的统治，其将自动产生一个高度完美的社会，假以时日，其将自动产生一个更高级类型的人类。换句话说，他们将扭转犹太基督教(Judaic-Christian)的方法态度，其致力于改善人性，旨在改善社会。在此他们又重申

自己的信念，即人类不是社会的创造者而是其产物：“一切社会变动与政治革命的终极起因将被搜寻，不在人的大脑里，不在人对永恒真理与正义的洞察。。。而是在每一个特定纪元的经济里。”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经济结构的改变，其为唯一有效的方式来改善社会并提炼人类知识的架构。但如何一个新的改善过的生产与分配系统能够被引入到民众中？“经济决定论”无意识地遵循了什么样的历史程序，带领人类到目前的发展状态？

用阶级斗争来解释人类进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生产模式与分配方式自古至今产出过两个基本阶级的人民：那些拥有生产模式的而因此成为剥削者，而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而因此被迫出卖或交换体力而生存。这两组人群冲突的元素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为历史中的基本力量，其促使社会的进化，向着水平不断攀升的成就。

“所有迄今为止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人和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会主与熟练工，一句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他们始终相互对立，持续一个未间断的。。。航程，其每次皆告终于一次革命广泛重建的社会，或者在被挑战阶级的广泛废墟中。

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运用着“辩证法”原则。所有过往社会都曾是相对力量或阶级的组合 —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他们之间的冲突一直产生着，推进社会进入某些新发展的动力。此过渡，他们指出，常常伴随着革命与暴力。

但是人类事件的进程，必须要始终遵循社会中这两个相对立阶级冲突的无尽循环吗？必须总要有革命来产出新秩序，其将又被革命毁灭来产出其他的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幻想有一天，当人民是团结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和平取代战争。如此的希望，当然，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辩证法理论，其称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静止 — 万物都是相对力量的组合。尽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道，由于他们已经发现了历史的“势不可挡的法则”，具有阶级斗争为其自我改善的手段，他们将发动一场最终的，可怕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永久消除那个造成社会中所有过往冲突的东西。所有过去社会的哪一个特征，其导致了自私，嫉妒，阶级斗争和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能被追溯到根源 — 私有财产。如果他们运用阶级起义，发动一次最终的革命来颠覆私有财产，那将意味着阶级斗争将变得多余，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争抢的了！

共产党员关于私有财产的理论

为什么共产党员相信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

恩格斯写道在原始时代，他相信所有人都遵循对一切事物共同拥有权的原则，除了最个人的物件例如衣服和武器。然后他感觉，土地的耕垦与家畜的驯化导致某一些人生产出多于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因此他们开始交换这些盈余物为其他他们缺少的商品。他讲道这些被用于交换的商品，被自然地指定给拥有他们的人，而因此私有财产的概念出生了。

恩格斯然后假定，那些拥有土地或其他生产手段的人将明显收割此社区经济资源的大部分利润，而这将最终置他们于能够雇佣他人做工的地位。他们将能够宰定雇员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从而以剥削劳苦阶级来保证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和社会地位。因此，恩格斯讲道，出于私有财产，阶级对

抗开花了，跟着一营随从左右：贪婪，骄傲，自私，帝国主义和战争。他说私有财产也曾导致了创建国家的必要性。

共产党员对国家起源的理论

恩格斯认定当无财产的阶级被剥削到有反叛的危险时，统治阶级创造了一种权利机构来维持“法律与秩序”，即为，一个法律系统用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剥削阶级的优势。这个新秩序，他称，是“国家”(State)。

“那么国家仅是。。。社会进化到某阶段的一个产物。其（任何形式政府的创建）是承认此社会已经变得分裂到无可救药，使其自体纠缠在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而又无力驱逐。”

因此国家就是为推迟审判之日而设计的。政府是“权利的器械” — 社会不自然的附属物 — 其被创造的明确目的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的正当要求下，保护特权阶级及其拥有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道，那假如他们设法消除了私有财产，其也将扫除阶级斗争，而后“国家”将不再是必须的了，其将逐渐消亡。

共产党员对宗教的起源及其经济意义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另一大恶也源于私有财产 — 宗教的剥削。他们当然认识到，宗教的根源建立可能远早于私有财产制度。然而，他们感觉到由于宗教并非神圣的缘起，其必源自早期人类狂乱地努力解释，大自然的力量与人的灵魂感受，例如梦境。当私有财产出现为社会的基石时，他们认为宗教像一器械似的被把握，来平息被剥削阶级的叛乱。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其为有财产的阶级想要他们的工人学会谦卑，耐心与忍受痛苦；来忍耐在他们头上堆积的冤屈，带着希望“下一辈子”正义将被处。他讲道，宗教像鸦片一样被喂给受压迫的人。工人们被告知要“不判决/不评判”(judge not)，而是要对他们的主人们保持被动并顺从尽职。“宗教是被压迫者的标志，不仁世界的情感，因其为无精神状态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鸦片。”

这解释了共产党员计划中存在的轰轰烈烈的反宗教征讨：“文化革命影响广大群众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系统地坚定不移地打击宗教 — 人民的鸦片。”毫无疑问的事实，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苏联(USSR)，其方案充斥了武装无神论的精神。“我们镇压了反动的神职人员吗？没错，是有做到。不幸的是，它还没有被完全清算。”

共产党员对道德的起源及其经济意义的理论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觉到他们已经确立，那私有财产的邪恶被责备为是阶级对抗的起源，国家的创建和宗教的剥削。他们现在附加了一个针对道德的起源及其经济意义的类似解释。恩格斯和马克思否认犹太基督教准则中所建立道德标准的“对与错”可能有任何永恒的基础。列宁总结了他们的思想当他说：“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否认伦理道德？是在对资产阶级所传教的意义，其从上帝的戒律中推导出的这些道德。当然，我们说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完全清楚明了，那些神职人员，地主们和资产阶级都宣称以上帝之名谈吐，旨在保护他们自己作为剥削者的利益。我们否认一切来自超人

类或非阶级概念的道德。我们称其为一骗局，诈取，为了地主与资本家们的利益而蒙蔽工人与农民的心智。”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那“不可偷盗”与“不可垂涎”例证为，是统治阶级强制于被剥削阶级要对财产尊重，而他们情不自禁地垂涎他们主人的富贵与财产。正如恩格斯所讲：“不可偷盗。这法则而因此成为一条永恒的道德法则吗？无法做到。”他们称如此的教导为“阶级”道德 — 一个准则旨在保护有财产阶级。

但在拒绝犹太基督教道德准则时，恩格斯试图包装共产主义仅是上升到更高水平的道德，当人类行为将完全被社会的需要所驱动：“我们讲我们的道德是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但尽管此尝试来微妙地遮掩共产党员道德思想的真正意义，恩格斯不能够克制自己偶尔揭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因此拒绝每一次试图在我们头上强制的任何道德教条。。。”

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发动要取代犹太基督教道德，为完全没有道德。这正是后期共产党员从他们领袖的教导中推导出来的，在一现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语中表明：“对他（共产党员）可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论此计策是“合法的”或“道德的”，亦或不是的，他并不考虑，只要它们是有效的。他晓得当下的法律和道德准则都是由他的死敌所制定的。。。于是他尽他可能得无视之，而符合他目的时则追随之。他提议要发展，不管资本家的概念如“合法性”，“公平性”，“权利”等，一个比他资本家敌人拥有的更大权力。。。”

以而如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完成了他们深入研究历史的最初目的。他们感觉他们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社会中多种制度的起源，凭展示所有的这些制度皆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他们还觉得他们已经追溯到造成全人类间争吵打斗，不平等与冤屈的源头 — 私有财产。唯有一个任务留给这建筑大师们 — 运用此知识至一项“行动计划”，其将永久解决全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疾病。

共产党员的行动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现代文明后，他们结论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迅速接近，那一场革命不可避免的地步。这是他们理论的方法：封建主义被推翻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最初其主要由个体户组成，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或作坊。每个人做他自己的工作并收获他应得的经济利益。然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将个人作坊取代为工厂。产品不再来自个人作坊而是从工厂，在那很多个人的共同努力产出商品。恩格斯讲道，制造业因此成为了集体生产而不是个人生产。而因此个人继续私自拥有工厂是错误的，因为工厂已成为一种社会机制。他争论道，没有私有个体户应获得需要很多人制造的物品的利润。

“但是，”评论家们问道，“工人们不在他们的工资里分享了工厂的利润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认为工资是对付出劳动的充足补偿，除非工人获取全部商品销售的收益。由于商品是由工人的双手制造的，他们认为工人应接受商品的所有价值。他们认为工厂的管理与运营者，本质上不过是“文书人员”，而且在那不久的将来工人阶级应崛起并控制工厂或生产手段，并自己运营它们。

“但资本家的投资不令他应得一些利润吗？没有他愿意风险相当的财富，那会有任何工厂吗？”

马恩对此回答道，那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本什么都不创造。马恩认为某些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财富，是因为他们拿走了工人劳动的果实，以利息，租金或利润的形式。他们称其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其在过去被从劳动人民中榨取，而应由当代工人们从资本家那里没收。

马恩现在竟敢预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最终趋势。他们讲道这就像私人作坊被工厂超越，那么小工厂将被大的联合所接管。他们讲道资本的垄断(monopoly)将持续下去，直到其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聚集，而被剥削的工人数量将按其比例增长。而当几个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被剥削的阶级将越来越贫穷。他们预测道所谓中产阶级成员，他们拥有小商铺或经营，将被经济存在所淘汰；因为他们不能够与猛兽般的商业联合相竞争。他们还预测道，政府将是银行和厂家将使用的权利器械，来保护他们的不义之财并镇压被剥削群众的反抗。

换句话讲，社会的所有阶层被迫进入两个相对立阵营的阶级对抗 — 资本家资产拥有者为剥削阶级，和受苦的无资产工人被剥削阶级。

他们更进一步预测，两阶级之间革命性的爆炸将被资本工业不可避免的科技改善进步所点燃。快速的发明与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一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遗留他们家人挨饿或难以维持生计。用不了多久将会有足够的仇恨，怨气和阶级对抗来驱使工人们构建武装团队使用暴力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才能让工人们掌控生产手段和所有私人财产，并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运营。

正是在这一点，那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Socialist)分道扬镳了。社会主义者从最初就一直坚持，是可以通过和平立法实现中央控制所有土地的。马克思贬斥其为白日梦。他坚持革命。尽管这样，他很快看到推进任何集中更大经济力量在中央政府的立法都是对其有优势的。但他仅视如此微不足道的“社会主义者的胜利”是对即将到来革命的心理软化。”

马克思特别强调，那此革命必须完全无情才能够成功。绝不能是一“改革”(reform)，因为改革总是以“一群剥削者替换另一群”而告终，并因此，改革者们感觉“不需要毁灭旧的国家机器；相较于无产阶级革命扫除每一群剥削者的权利，并树立劳苦被剥削者领袖的权利。。。因此，它不能避免毁灭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替代。

马克思进一步地合理化其使用暴力来建立新社会，因为他感觉如果道德原则被遵循，那革命将是流产的。他指向1871年法国社会主义者革命的失败：“两个失误夺走了其辉煌胜利的果实。无产阶级者半路停下了：并没有继续“征收征收者”的行动，其被对国土内建立至高正义的梦想带飘了。。。第二个失误是无产阶级毫无必要的宽宏大量：并没有消灭其敌人，而是努力在他们身边施加道德影响。”

马克思试图软化他灌输暴力的冲击，讲道他将完全满意如果资本国家能够被和平手段转化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他指出这将是可能的，不过需要资本家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与权利，豪不抵抗地递交给工人代表。他逻辑地得出结论，由于这是高度不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假设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马恩还坚信此革命必须具有国际规模。他们明晓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准备好革命，但所有马克思主义写手们都强调过“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那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社会主义完全与最终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专政(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他们现在相信了一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马恩提出的下问题是：他们应该按正常事件路程等待其到来，还是他们应该采取措施促进革命，并加速社会进化至共产主义？马恩认定其已成为他们明显的责任，来监督革命的猛烈推进。为什么要延长痛苦？旧社会死定了。鉴于马恩发现的原则，可能人类能够挽救十几代人的剥削与冤屈，仅仅是压缩这整个阶段的社会进化，为一代人的暴力重整。

他们感觉这可以在三个步骤内做到：第一，清除旧制度。“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简化，缩短，集中旧社会死亡的痛苦以及新世界出生的血腥临盆 — 革命恐怖。”第二，工人阶级代表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形容了在此专政期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一。完全镇压旧的资本家阶级。

二。创建一支强大的“防御”军队，其将被用于“巩固与其他地区无产阶级者们的关系，并为在所有国家革命的发展与胜利”。

三。巩固群众团结，支持专政。

四。消除私有财产来建立普世社会主义，并预备全人类终极采用全面共产主义。

第三，最后一步是从社会主义向全面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国家拥有土地和一切生产手段。马恩相信过一段时间，当阶级意识消失了，而且没有其他阻力需要被克服时，国家将逐渐消亡，然后财产将自动地“共有的”属于全人类。之后列宁解释到，无产阶级专政将如何开创这最终阶段的道路。他讲道此专政将是“一个阶级为了系统性使用暴力针对另一阶级的机构，由人口的一部分针对另一部分。。。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时，我们坚信其将更进一步发展为共产主义，并且与此同时，一切某人为了征服某人，或某社会部分征服另一部分的力量将消失，因为人们将逐渐习惯观察着群居存在的原始条件，不用武力或使其服从。

甚至在社会主义后期，列宁预见了一个世界没有法律，律师，法官，统治者，选举代表或甚至警察。所有这些被遗忘和无用的附属物将被扫荡下深渊，其为腐朽资本主义旧秩序的特征。列宁讲道社会群众自发的同质性将使一切旧秩序的机制多余。他感觉到那这新社会将甚至改变人类天性，直到对群居社会的反抗将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并将可能伴随着如此快速与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很实在的人，不是感性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很少会允许任何人对他们不敬），而且很快，遵守集体社会生活每天简单基础规则的必要性，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更高阶段（全面共产主义）的大门将被打开。”

全面共产主义下的无阶级无国家社会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狂热地希望，那这新社会将产出人类天性的改变，其是有必要的，在全面共产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之前。个人们必须忘记那曾几何时收入可以被获取，仅靠财产的拥有或从事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工资将被废除。他们必须遗忘，有些人曾经获得收入很高而其他人获取了少的。他们必须遗忘任何由工作效率或服务差异而起的薪资等级划分。他们必须遗忘一切关于技术，训练，头脑或身体能力的差异。他们必须接受此主张即，如果一个人在他所适合的最佳工作中尽其所能，那么无论工作效率与产能的差异如何，他就和其他人一样优秀并应得与其相同的收入。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承诺，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的能力生产，而且每个人将根据他所需要的接受”/“各尽其才，各取所需”。他必须放弃他旧的营利动机，并具有集体意识，以使他一如既往的工作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在同时满足于接受作为他工作的回报，根据他消耗需要定量的收入。

马恩假定了，在如此系统之下，生产的输出将是如此丰富无比的，以致他们可以省去市场，金钱和价格了。商品将被在多个中心地点大量储存，而且任何工作的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应得自助。马恩感觉到那将不会有任何特别动机在某一时刻去拿多于所需要的，因为由于商品的超级富足，工人可以随意补充他的欲望。服务将被类似分发在便利的地点，个人可以根据他们感觉的需求访问此些服务商。

在这些愉快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作者解释，国家的政府工具将是多余的了：

“唯有共产主义才能使国家绝对多余，因为没有人要被镇压 — ‘没有人’是在一阶级的意义上，意义在一个系统性地斗争人口的某特定部分。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相信社会可以在一崇高完美的等级运作），而且我们一点也不否认某些部分个人行动过激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也没必要制止如此的过激行为。但在最初，为此无需特殊机器特殊器械来制止：这将由武装人员自己来完成，/像任何一群文明人一样简单容易，甚至在现代社会，一对战斗人员的部分或不允许一位女士被激怒。/? 而且其次，我们明白过激行为的基础社会起因。。。是对大众的剥削，他们的欲望和资产。随着这个头等起因的移除，过激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开始“消亡”(wither away)。我们不知道多么快并以何种顺序，但我们知道那其将消亡。随着它们的消亡，国家亦将消亡。”

很有意思那共产党员的理论对待无产阶级，似乎其为人类的一个独特分支。无产阶级被假定为一个特殊的血统，其将几乎自动成熟为愉快的有效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其能够被压迫政府下解放。政府被假定为不过是资本家压迫阶级的工具，并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被毁灭了，那任何形式政府的需要也会被消灭。共产党员领袖们一直都感到自信，那当无产阶级夺权后，其将不会想压迫任何人，而因此政府的需要将是不存在的。

另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想要无产阶级成为“武装人民”。此前景一点也没有吓到列宁。他有着无比坚定的自信，那无产阶级成员绝不会像资本家曾似的滥用权力。此外，列宁还假定无产阶级有直觉能力一眼就能认出对错。他们不仅会用他们的武器通过自发的“群众行动”，来平定任何社区内的非集体行为，而且列宁还相信他们将真诚勇敢地镇压任何他们的自私，非集体的倾向。他们将养成生活在公共集体秩序下的“习惯”，并将变得“习于遵守这社会存在的原始条件，不用武力或征服。”

列宁接着说，那随着政府机器的消失，并伴随着共产党员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格局建立在全世界，终于“变得可能讨论自由了！”

第四章

共产党员对世界问题方法态度的简要批判

历史与经济的现代学者们，可以自己毫不费力地发现共产党员理论在哪里脱离了最基本的现实方面。

马克思门徒将共产主义理论视为，人类迄今为止对历史做出的最透彻的分析，但很多学者将整个共产党员框架视为或多或少马恩生活时代的产物。两人的著作明显反映了一研究，其试图调和他们一代人的五大影响力，他们试着以一种单一思维模式将它们整合。在马恩头脑中，这些影响力遗留的痕迹是：

第一，他们时代的剧烈经济动荡。这被认为是令马恩对经济在历史中的地位过于敏感。

第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广受欢迎。马恩采用了他的“辩证法”理论，并稍加修改，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阶级斗争和未来无产阶级社会的必然胜利。

第三，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的宗教世俗主义。这引导他们去试图以一单独因素解释存在的万物 — 物质。他们否认宇宙中的智慧设计，上帝的存在，宗教的神圣和犹太基督教教义的道德戒律。

第四，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经济理想。马恩决定他们想要一个集体社会，而且他们感觉其必须是一个被控制的社会；他们因此抛弃了乌托邦的手足情谊原则，并宣布共产主义只能在一强大的专政下发起。

第五，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精神。马恩所保证的两样东西吸引了无政府主义者 — 使用暴力革命推翻已存在政权，并最终创建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

正是因为这五个重要的影响力，共产主义学者将发现其为一个广大的联合体，经过设计的；其将似乎针对所有人的所有事。

共产主义为工业革命的一副产品

马恩出生于工业革命中。在此革命之前，每五个公民中四个是农夫，但到马恩要上大学时，农夫到工业中心的大移民似乎像洪水一样。所导致的人口集中创造了满是贫民窟的城市，其后助长了疾病，暴力和恶行。这曾是个连锁反应，滋生于令人惊叹的新机械时代。工业革命的先驱们视机器为排山倒海的无生命怪物，其将最终解放人类于“勉强糊口”的奴隶经济，但负面评论家们只在其中看到了他们创造的问题 — 人口的流离失所，对个人，家庭与社区的失调，最后还有对服务于产业中男女老少的不人道待遇。

因此马恩像很多人一样，对他们生活的时代感觉到了暴力的反应。因为那曾是一经济动荡的时期，也许可以理解，他们曾应得出结论那，经济力量构成了残忍无情的铁手，其指引着全人类历史的路程。正是在此我们开始对共产党员理论的批判。

共产党员对历史的诠释

谬论一 —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谬论是其试图过度简化历史。马恩试图改变历史，从一个流动的溪河，由上百万人类活动的支流所汇集，为一个固定的，不偏移的，预定的发展路程，其可在过去被导航并预测未来，基于一单独简单的标准 — 经济。显然，经济在人类历史上起着强大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还有气候，地形，能否接触到海洋与河流，机械发明，科学发现，民族与种族亲和力，亲属关系，宗教，探险的欲望，忠诚感，爱国主义和许多其他因素。

许多现代共产党员都承认，那历史是受全部这些不同的影响而折叠，但他们坚持那马恩曾打算将它们都纳入其“经济决定论”中；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生活。然而，马恩著作未能反映任何如此的诠释。即使他们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仍将陷入困境，因为如果“经济决定论”是将包括生命中的一切影响，那么共产党员诠释历史的公式将是：“一切决定一切。”作为诠释历史的依据，这是荒谬的。

还有一群现代共产党员曾试图解脱马恩于“经济决定论”的狭隘局限性，他们提出经济环境并不绝对是由人类历史路程所决定，而仅是有条件令人们追随社会发展的某特定趋势。但这当然，在接近真相的同时，假定了自由意志变化元素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其被马恩断然否定。实际上，“经济决定论”其绝对的，固定的和不偏移的意义，正是马恩做出预测的非常基石，其推定社会必定遵循一条不可避免的发展路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然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正是他们想表明当他们谈到资本主义：“其衰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同等地不可避免。”

此外，当任何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论证，那人类发展路程并不是固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他就毁灭了共产革命的全部正当理由 — 那暴力动乱被马克思讲成是“简化，缩短，集中旧社会死亡痛苦的一种方法”。那将毫无理由使用致命暴力来集中简化旧社会的死亡，除非旧社会的死亡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此为马克思论证的核心。如果他承认旧社会的死亡仅是几种可能性之一而且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他革命的理由就会动摇。他的理由一样会被爆掉，如果展示出当下社会一丁点都没有要死亡，而且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壮，并似乎每一代人都对人类福祉做出着更多贡献。

因此共产党员基于“经济决定论”对历史的诠释，即使后来在其守护者手中也只是脆弱的芦苇叶。马克思门徒们已经意识到了其弱点，并试图打补丁修补之，但这些补丁只在那已干枯脆弱的共产党员逻辑中造成更多分裂。

谬论二 — 马恩不仅过度简化历史，而且他们依赖了第二个谬论来辩解第一谬论。他们说人类心智没有道德自由意志，意义在其没有在历史进程的指导下做出选择。马恩认为，物质环境驱使人类心智往某方向运动，而人类没有自由意志来抵抗之。

这听起来像是十九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者(Mechanistic Materialists)所教导的，他们宣称大脑有点像一个被动的蜡板，其从外部世界接收印象，并自动反应之；但马恩不想被认定属此学派。他们因此讲道，那些平庸的唯物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大脑并不是被动的像一个蜡板，而是一个活动的体现，其不仅从外部世界接收印象，而且还有能力通过分析与综合过程来消化这些印象。接下来要出丑了。

他们宣布那，在大脑消化了其外部世界的印象之后，其将根据物质环境总是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全自个。按他们自己微妙的方式，他们仅仅在讲，人是其物质环境的受害者。通过稍微不同的思路他们得出了，与被他们否定的器械唯物主义者的相同结论。

从上一章可以回想到那，马恩认定我们称的“自由意志”，不过或多或少是对驱使个人行动物质力量的意识感知。此“自然必要性”(natural necessity)的意识感知，使人们认为他们在选择某行动方案，而事实上，他们只是看着自己遵循物质环境的宰制。

再次可以看出，马恩过度简化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不能仅就对物质环境的“必要”反应而被解释。人们常常抗拒物质环境来满足许多其他动机，例如渴望自我表达，宗教信念的感人力量，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个人荣耀的满足或实现个人抱负。

此谬论 — 拒绝承认人的道德媒介和做出选择的能力，对马克思主义是致命的。正是在此初始错误之上，众多其他谬论被建立。当共产主义说人类心智是物质环境的绝对受害者，而且那人类历史仅是人类对物质状况不可避免的反应时，它必须以实例证明此些主张。当马恩试图用此来解释社会结构时，注意此谬论如何复合加剧它自己。

共产党员对社会的解释

谬论三 — 首先，马恩讲道，社会的形态是由经济状态自动决定的，其驱动着任何特定时代的统治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有自由自己选择这种或那种形态的社会吗？无法做到。假设在人类生产力的某特定发展状态，你将发现某特定形态的贸易与消费。假设在生产，贸易与消费的某特定发展阶段，那你将发现一相应的社会结构，一相应的家庭，秩序或阶级组织，一句话，一个相应的文明社会。预设某特定文明社会，那你将发现特定的政治状态，其为文明社会的唯一正式象征。”

似乎不可思议的是那，马恩能让这痴心妄想如此完全地掩盖他们自己，那当某种生产形式存在时，某种社会类型也必须存在。在远古时代生产模式几千年未变，而在同期，社会则几乎在持续变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都已指出，那如果历史证明了任何事情，那就是生产模式和社会形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国家的起源

谬论四 — 马恩认为国家（任何形式的主权政府）是社会的多余附属物，其为统治阶级所创建，来武力维护其利益并镇压被压迫阶级的起义。马恩不认为任何时代的任何政府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或只是大部分人的福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现代国家的行政分支，不过是一个委员会，来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指出，不管怎么伸展想象力，政府决不能被称为社会的附属物，因为其是群居生活的非常核心。这是事实，因为社会不能存在，除非其被某种程度的权威所统治，而在社会中存在的权威构成了“政府”。人本质上是群居和政治的生物，而因此创建社会来指导社区成员走向他们的共同福祉，仅是人类非常天性的固有体现。因此马恩大力提倡的无国家社会（没有政府的文明）将是一群无组织的暴民。将根本没有社会。

谬论五 — 马恩也陷入了困境，当国家的形成被解释为某特定形态经济环境的一不可避免的产物。如果这是成立的，那么同样的生产模式将始终造成同样必要形态的政府。让我们看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这两个民族基本的生产模式都是奴隶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些政府的形态曾经应该大约保持一致，只要该生产模式（奴隶制）仍在运作。

但与马克思主义所预料的恰恰相反，我们发现这两个政府都经历了许多变化，尽管生产模式没有改变。在雅典，曾有一连串世袭君主，接下来则是贵族式的民主共和，然后是三十暴君的独裁专制，并最终再次建立了民主制。在罗马，曾最初有一个选举出的皇室，其次是贵族式的民主共和，然后

来了凯撒统治下的君主专制。这些都是历史中的典型事件，其中政府形态发生了变化，而生产模式则维持相同。

现在我们以另一种方法演示此共产党员理论的谬误。如果国家的形态是被“经济决定论”所固定，那么国家的形态应该变化当生产模式发生变化时。但这很少发生。以美国历史为例。自美国政府成立以来，其政府形态基本保持一致。其南方奴隶经济体与北方工业经济体的政府不同吗？废除奴隶制后，南方的政府改变了吗？生产模式改变了，但政府形态没有。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创建他们想要的任何形态的政府，而不必参考盛行的生产模式。还有很多历史案例明确地反驳了此重要的共产党员概念。

谬论六 — 关联于国家的建立，共产党员还坚持那某法律准则是被制定来保护剥削阶级的；此外，如果生产模式变化了，那法律准则也将必须被重新制定，以扶植此特定的新生产模式。逻辑上讲，这将意味着每次生产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时，法律系统也将必须发生革命性改变。相同法律准则绝不能为运用在不同生产模式的国家。

历史再一次把共产主义扔得头脑混乱，当此理论被应用于特定情况时。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在此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常常随之而来的只是各种法律准则的细微改动。整个欧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而言，受统治的法律准则都建立在与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相同的基本原则上。在英国，普通法(Common Law)是在封建经济时期制定的。封建制度的推翻只强化了普通法，然后其在工业革命之后被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并没有推翻州或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这些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相当明显的历史事实，即社会的生产方法与其选择制定的法律准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依赖。

什么是宗教？

谬论七 — 共产主义更进一步指控那，宗教并非有神圣起源，而仅是统治阶级的一人造工具来镇压被剥削阶级。马恩形容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其经过设计来麻痹他们变得谦卑服从，并接受统治阶级期望永存的普遍生产模式。任何历史学者都会同意那，在历史上曾有很多次某些无耻的个人或甚至方向错误的宗教机构都滥用过宗教的权利，就像所有其他社会制度都曾在不同时期被职权滥用过。

但并不是那宗教滥用被马恩谴责，而竟是宗教的非常存在。他们认定其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压迫者手中的一个工具或武器。他们从自己的观点角度指出了宗教的三重功能：首先，其教导对财产权的尊重。第二，其教导穷人对统治阶级的财产与特权有义务责任；和第三，其在被剥削穷人中教诲一种默许精神，以摧毁他们的革命精神。

在任何犹太基督教教义的学者眼中，这些指控的谬误都是显而易见的。圣经教导对财产的尊重，同样适用于富人和穷人；其告诫富人给工人们应得的工资，并与有需要的人分享他们的财富。‘旧约’一次又一次地斥责自私的富人，因为“穷人的财物都在你们家里。你将我的人民打成碎片是什么意思，还碾磨穷人的面孔？主说道。”以赛亚书3:14-15.

“新约”对自私富人的谴责正如所指出的：“瞎！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并嚎叫，因为你们的苦难将降临。。。看哪！雇的工人收割了你们的田地，你们却造假亏欠他们的工钱；然而那些收割者的冤哭声已进入万军之主的耳朵了。”詹姆士书5:1,4.

“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国更容易。”马太福音19:24

至于共产党员的指控那宗教使人变得被动，我们只需要观察那，正是那宗教信仰的动态力量阻止了一个虔诚宗教人士接受共产党员的压迫和指令。一位奉行犹太基督教教义的人，不会受指令去撒谎或偷盗。他不会让无辜的人流血。他不会参加共产党员穷凶极恶的种族灭绝行径 — 系统地灭绝整个民族或阶级。

众多共产党员著作明显证实那他们害怕宗教，并不是其使有信仰人士对统治阶级被动，而是其阻止他们对共产党员纪律变得被动。坚定的精神信念就像一堵抵抗墙，挑战着共产主义的教导与行径。

此外，共产党员在犹太基督教教义动态的意识中看到了一股为和平的力量，其切断了共产主义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命脉。正如俄罗斯前教育政委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所宣布的：“我们恨基督徒和基督教。即使他们中最好的也必须被视为我们最坏的敌人。他们宣扬爱你的邻居和慈悲心，这违反了我们的原则。基督教的爱是发展革命的绊脚石。打倒爱我们的邻居！我们想要的是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征服宇宙。”

共产党员对道德的理论

谬论八 — 共产党员写手同样坚持那，犹太基督教的道德准则是“阶级”道德。以此他们意思是，“十诫”和基督教伦理是被制定的，来保护私有财产和有财产阶级。为了显示共产党员写手为捍卫这一观点所做的努力，我们将讲几个他们最喜欢的“十诫”诠释。他们认为“当孝敬父母”，是由早期希伯来人制定，来对他们的孩子强调他们是父母私有财产的事实。“不可杀人”被归咎于统治阶级的信念，那他们的身体是私有财产，而因此他们应该与其他财产权利一起被保护。“不可奸淫”和“不可贪图你邻居的妻子”被讲为曾被制定来落实此观念，即丈夫是一家之主，而妻子则是纯粹属于他的私有财产。

此推论的最后一句话，导致了当共产党员在俄罗斯夺权后的一些灾难性后果。他们急于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并防止她们成为私有财产，他们贬低所有女性到那最低和最原始的水平。一些共产党员领导提倡完全自由主义和滥交，来取代婚姻和家庭。萨拉洛夫苏维埃(Soviet of Saralof)颁布的法令节选，将说明这一点：

“自1919年三月1日起，拥有17至32岁女人的权利被废除。。。然而，此法令不应用于有五个孩子的女人。。。根据当前法令的内涵，任何女人都不能再被视为私有财产，而且所有女人将成为国家财产。。。国有化女人的分配与养护，遵从于相关机构的决定，是属于萨拉洛夫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特权。。。所有因此被置于国家部署下的女人，必须在颁布此法令三天内，亲自到达指定地址并提供一切必要信息。。。 ”

“任何想使用国有化女人的男人，必须持有由某公会行政或苏维埃工农兵签署的证书，表明他属于工人阶级。。。每个工人被要求上缴他工资的2%进入一基金。。。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男性公民可以享受同样权利，但他们必须支付相当250法郎的总额，其将被转给公共基金。。。根据当前法令含义将被宣布为国有财产的任何女人，将每月从公共基金获得相当575法郎的薪水。。。 ”

“任何孕妇在孩子出生前四个月和后三个月内将被免除职务。。。出生后一个月，孩子们将被安置在托管他们照料与教育的机构。国家基金将出资完成他们的指导与教育，他们将一直呆在那里，直到他们十七岁。。。所有拒绝承认此当前法令的人，和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将被宣判为人民敌人，反无政府主义者，并将承担其后果。”

另一份文件说明了在共产党员道德版本下女性接受到的那种“解放”，其包含在某苏联官员传达的一个决定，他说：“天下就没有女人被男人侵犯这回事；谁说这侵犯是错的就是否认十月共产革命。维护一个受侵害的女人，就是揭露他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和一个私有财产党派。”

关于共产党员指控犹太基督教道德代表了一“阶级”道德，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那事实，其不仅可以相当简单地说明如此的指控是不真实的，而且还可以相当简单地说明今天地球上最完美例子的“阶级”道德就是共产主义。在俄罗斯一亿八千万人口中，只有约三百万是共产党员。如此小的执政少数派，残酷地迫使其他人民接受其决定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

共产党员道德遵循一简单公式。任何促进共产党员事业的就是好的；任何阻碍它的就是坏的。经详察，此哲学成了机会主义和权衡之计的准则，或毫无道德的准则。任何不服从党裁定的什么是对共产主义好的和什么是不好的人，根据苏联宪法第131条和第133条，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此，“阶级”道德的完美例子，其被马克思主义者归咎于犹太基督教准则，反而在共产党员行动计划本身正中间被找到。

共产党员对阶级斗争的理论

谬论九 — 下一个谬论是马恩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其被他们认定为“阶级斗争”。

正如读者能够回想起，他们说过那，当人们意识到奴隶制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产模式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奴隶主权利的社会。他们更进一步认为，那如果此事务状况从未受到过挑战，那么奴隶制的生产模式将会成为一固定常态，而且社会也将类似被一直固定。但马恩正如其他历史学生们发现的一样，那经济秩序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度，然后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这是什么导致的？他们决定其为阶级斗争。他们决定，那奴隶们推翻他们的主人并建立了新的生产模式基于封建制度。然后发展了一个社会来保护此生产模式，直到农奴们推翻了他们的地主，并建立了一个特征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他们说，现代社会是来保护资本主义的。

批评家们宣布那，马恩显然忽略了一些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例如，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古代文明的衰败与推翻，与奴隶起义对抗他们的主人毫无关系：

“那时的奴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服从的，卑躬屈膝的和无助的生物，他们偶尔的抱怨和反抗都被恐怖残忍地镇压了。这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想象的那种阶级斗争，而且并没有带其过渡到封建制度。恩格斯本人讲，在罗马帝国末期，奴隶稀少且昂贵；罗马大农场(the latifundia)，其基于奴隶劳动，都不再盈利了；殖民者和佃户的小规模农耕相对还有利可图；简而言之，“奴隶制消亡了是因为其不再赚钱了”。然后来了蛮族的入侵，罗马的沦陷，以及封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高级文明被低级文明征服的结果，而并非所指控的某阶级斗争的驱动力。”

马恩关于社会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也存在类似的历史问题。

谬论十 — 共产主义不仅失败于其基于阶级斗争来试图解释过去的进步，还失败于它对未来的预测，那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对抗会增加。一百年也没发展出马恩说不可避免的两个暴力对抗阶级。

共产党员煽动者们竭尽全力对工人心中那人造的阶级意识在煽风点火，但那基本的劳工与资本间的争斗从未要颠覆资本主义，而是让工人们更公平地分享资本主义成果。例如，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劳工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共产党员试图在此改革趋势中夺取领导权，但工人们赚得更多他们就更独立 — 不仅与他们雇主的关系中维护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还排除了共产党员煽动者们在工

会的领导权。工人们没有回应共产党员推翻资本主义的呼吁，而且共产党员写手们略带苦涩地承认之。

与此同时，政府与工业领袖们都普遍发展了如此的理念，即劳工的强大购买力对保持工业车轮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劳工因此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扮演其为资本主义关键部分的角色。此趋势使共产主义彻底瓦解，因为此发展使劳工成为资产阶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其阶级意识敌人。

谬论十一 — 另一个已失败的共产党员前提是其假设，那在资本主义下所有财富将逐渐被垄断，直到一小部分人将拥有一切，而那被剥削无财产的阶级将成为人类的绝大多数。然而，在资本主义下无财产的无产阶级没有增加，反而实际上一直在减少。马克思创作他的巨著《资本论》时，他生活在最赤贫的状态。他视无产阶级为那些和他生活状态类似的人 — 绝对没有任何财产或资本利益的人。

如今，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土地，没有存款，没有社保，没有退休金，没有人寿保险，没有公司证券和国家债券的人才能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因为所有这些都代表了拥有生产性财富或金钱，超出了当下消耗需求的资金。如此无财产的无产阶级确实存在于美国，就像它曾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但重要的是在美国无产阶级是如此小的少数派，马克思几乎都不想承认他们。在美国资本主义下，财富，比任何世俗历史上的大国都要更广泛分布于其人民之间。这使马克思心中的无财产阶级被减少到人口边缘地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发现那人口大多数都是毫无财产的无产阶级的国土，正是共产主义的祖国，那里无产阶级专政被强制执行超过三十五年了！

谬论十二 — 马克思对工资的理论也随着时间流逝而瓦解。他假定那，技术发展将使机器越来越高效率，而因此令许许多多的人失业，而他们将竞争工作岗位，直到工资越来越微薄可怜。实际上，科技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工作，相较于其毁掉的工作，除了在经济衰退(depression)的间隔中，资本主义长期趋势一直都是越来越接近那“全民就业”的经济梦想。

谬论十三 — 由于马克思认为工资将变得越来越少，他自认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来获取舒适生活将是拥有财产。这正是他为什么讲道，拥有财产这一件事，就分清了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此结论又是一重大错误。如今有些个人可能很容易出卖劳工服务一年获取\$10,000，而有些人则生活在每年靠拥有财产的收入\$2,500。在这种情况下，称第一群人为无产阶级而且第二群人是资产阶级，将肯定是滑稽糊涂的。在资本主义下，拥有财产肯定不是唯一的途径来获取舒适的经济独立。

谬论十四 — 马恩还失败于试图预测在资本主义下中产阶级将会怎么样。他们讲道，中产阶级将被迫遵循那惨淡过程，沉沦到无财产阶级，以致最终将只有两个暴力对抗的阶级 — 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所发生的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做出过研究，其显示中产阶级（由既不极端富裕也不格外贫困的人组成）一直在迅速增长。中产阶级成员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人数，财富和人口比例都增加了。

谬论十五 — 共产主义的另一个谬论，是其阶级斗争导致“必要进步”的理论。此理论中，马恩试图应用他们哲学的辩证法，其称出于两个相对力量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新进化性进步将被造就。这未能解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不进步现象 — 例如印度，秦娜(China)，埃及，阿拉伯和东亚人口。

它也未能解释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之一，即文明的倒退。人类经历的整个格局表明，那国家们上升到某一权力巅峰，而然后就会穿过道德与智慧的衰败，从而丧失其文化地位与经济优势。这在历史上远远易于表明，相较于那理论称阶级斗争带领人类穿越一系列不断上升的阶段称之为“必要进步”。

谬论十六 — 最后，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过去失败了，还令马恩失败于试图预测他们一生中将要发生什么。他们说道，共产主义将首先来到那些最高度资本化的国土，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变得更尖锐更清晰。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将首先来到德国。几年后，马克思转移他的预言到英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主义（至少是无产阶级专政）将首先来到俄罗斯 — 欧洲国土中经济事务最不发达的一个民族。此外，共产主义是在俄罗斯通过政变，而不是通过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的。它是通过列宁的阴谋诡计而到来，他被德国“最高统帅部”鼓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里进入俄罗斯，并利用一小撮硬核革命者在临时政府内夺权，其仅在不久前迫使沙皇退位并在当时代表了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他人，准备建立民主宪政。

因此，共产主义并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来到俄罗斯的，而是像任何其他的独裁统治 — 由少数派的军事力量。这带我们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

无产阶级专政

谬论十七 — 此提议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垄断，旨在为人类利益做很多事，但经验已证明它们是假梦想。例如，无产阶级专政被设计为在人民中散布财富的享受，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并将一切生产手段置入政府手中。他们为什么想这么做？他们说那是为了防止所有财产财富落入私有资本家手中。

但当共产党员试图在俄罗斯这么做时，发生了什么？它摧毁了所剩无几的财富散布，并将经济体颠簸回向封建制度 — 这经济系统下，少数特权者任意决定分配生活必需品，并在同时裁定着其公民所有重要阶段生活的方式。

马恩的愚蠢在于未能区分私有财产权利与私有财产滥用之间的差别。他们曾将要废除权利来扫除滥用。人类的问题不曾是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而是如何提供一个财产权的公平分配，使很多人都能够享用它们。因此，共产党员理论并不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那简单事实是，将所有财产置于独裁统治的雇佣者监督下，将引发财产垄断的趋势，而不是让拥财之乐分布得更广。

谬论十八 — 无产阶级专政还被设计为补偿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不是赚取工资。但通过废除工资，采用工分，共产党员领导们仅是抛弃了普遍的交易媒介。在俄罗斯共产党员革命之后，人们发现此想法迫使该民族诉诸于原始的以物易物制度。这整个想法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在几个月后不得不被放弃。共产党员们领教了，那废除工资本身并不能解决工资均等的问题。

谬论十九 — 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用意，在于其准许创建一支庞大的“防御”军队，其将帮助“解放”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直到最终此专政将覆盖整个地球。

这隐晦地试图掩盖共产党领导们对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仍在被运用着。他们的军队总被形容为存在于“防御”，而且他们侵略的受害者是被“解放了”。近代的世界历史对共产党员解放的作用，已提供了一悲剧的评注。

谬论二十 — 无产阶级专政更进一步地被期待给共产党员领导们时间，来向大众演示他们计划的有效性，以保证统一支持“全面共产主义”，其将在不久后到来。在俄罗斯的共产党员独裁统治没曾有过如此的说服力。事实上，针对资本阶级的被批准使用的暴力，曾不得不以相同火力，撒向无产阶级

或工人阶级，以至于今天，大众们被简化到一种麻木恐惧的默许状态，而不是那一“团结支持”为共产主义事业。

全面共产主义下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

谬论二十一 — 共产党员对未来梦想一个伟大的新的“单一世界”是基于此信念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暴力与胁迫的政权，将允许建立一社会，其将产出一个人类新秩序，他们将养成习惯于遵守着那列宁所称的“每天共同集体生活的简单基本规则”。

此希望的谬误在于共产主义对人类行为的变态诠释。它假设，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那如果你改变一个人的外部事物，那这将自动迫使此人内部发生变化。外部环境与人内部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环境只给人条件，其并不改变人的非常天性。例如，就像人们将总是会笑，吃饭，繁衍，成群结伙并探索未知，所以类似的他们将总会享受拥有事物的喜悦（仅分享物品即可带来喜悦）；他们将一直拥有个人表达与自我决定的愿望，改善他们环境的雄心与优异于他人的动机。这些品质是每一代人与生俱来的，并不能被立法赶走或被忽略。

所以，如果那种群体生活违反了人的非常天性，那么无论多少暴力与胁迫都不会发展出永久的习惯来遵守那“每天共同集体生活的简单基本规则”。无论一个人多么被压迫，他的非常天性将使他怀有向往自由的炽热本能来表达这些欲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学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欲望不能被忽略，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其将不会被消灭，即使在武装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下。当此专政独裁显露出“消亡”迹象的那一刻，他们将必然崛起，维护自己的权益。

六十个世纪的历史已表明那，社会将成功只有当其调和了人的天然本能与倾向。其实，这些人类天然的品质在将共产主义试图废除的正是那，在正常情况下的非常东西，人们在其中能找到满足感，力量与幸福的源泉，其引导此个人与整个社会的进步。

谬论二十二 — 马恩曾如此急于诋毁资本主义，以至于他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个特定主体上，并从未来得及揭示“全面共产主义”的完整格局，其曾要取代资本主义；尽管这样，我们确有足够的信息来揭露它天生的弱点们。其中之一是此公理，即“每人将根据他的能力生产，每人将根据他所需要的接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如果是和一个残障人士打交道，这可能听起来不错，因为社会将愿意补偿一个明显残障人士他力所不及的。但将其应用于整个社会时会发生什么呢？最近一位老师问他的学生们，对这个共产党员口号的看法，然后他们都似乎认为这挺好的。然后这老师说道，他将给学生们一个小演示，如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学校将会发生什么事。说他：

“这门课的及格分数是75。因此，如果你们当中某人得了95，我将拿走20分，然后给一个只得了55的学生。如果某学生得了90，我将拿走15分，然后给一个只得了60的学生。如此每个人都能通过。”

立刻，班上聪明努力的学生们大声抗议，而懒散或不好学的则认为这想法不错。最后老师解释道：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你们谁都不会喜欢这个系统的。这是将发生什么。首先，高生产力的学生 — 他们在学校 and 生活中都是少数 — 将很快失去生产的所有激励。为什么努力考得高分，如果其中一部分将被“权威当局”夺走并给别人。第二，生产力较低的学生们 — 学校和别处的大多数 — 将暂时摆脱学习或生产的必要性。这将持续下去，直到高产者也消沉了或已被压低到低产者的水平了，而因

此对同伴们毫无贡献了。在那时，为了能让任何人存活，“权威当局”将别无选择，只能开启一个强制劳动并对低产者进行惩罚的系统。他们，当然将会痛苦地抱怨，却并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就共产主义而言，此“权威当局”的需要将仅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所有工人们去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但无产阶级专政即使用武力，也无法使人们按能力生产。正如那学校老师所举的例子，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已故意摧毁了，工作最普通的激励。让我们列出其中四个：

一。因增加了产量，所以增加报酬。

二。因努力工作来研发改善产品，所以增加报酬。

三。因努力工作来改善服务，所以增加报酬。

四。工人有权力，使用超出消费需求之外的积累的过往报酬（利润），来购买并开发资产，以改善他和他家人的光景。

共产党员领导们似乎误解了人生的普遍教训那，人的最大敌人是惰性，而打击惰性的行动主发条不是武力逼迫，而是自我改善的机会。马恩坚持如此的态度是自私的和“非集体的”，而那明显事实是，某工人很难努力工作来填饱“社会”的肚子，当他劳动的果实不首先照顾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共产党员们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赶走这“非集体”态度，但三十五年的俄罗斯独裁已经生动地展示了，那除非人们能够按他们的能力得到补偿，否则他们是不会按他们的能力工作的。即使共产党员领导们都知道，武力已失败了。在此独裁统治的鞭策下，工人们生产的仅仅够勉强度日。共产党员领导们因此说，那独裁统治必须被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要工人们不各尽所能，就肯定不能谈“全面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个人都将各取所需。

谬论二十三 — 在研究马恩理论时，读者很快会察觉到那，他们没有考虑到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事实。例如，他们假定那，在一个无国家社会里的群众统治（其总论为暴民统治），较于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有组织政府，将更具有辨析与鉴察力。将此设为“全面共产主义”下的期待，是在向全部过往人类经验打脸。

谬论二十四 — 此理论还假定那，在无产阶级专政实施的压制下，人们将失去或完全抹平他们获取的本能。马恩明确表示，他们期待这专政将使人们进入不拥有财产或不想拥有的“习惯”。

但当此无国家社会开幕后整个新一代人登场，而他们没有给了他们父辈们习惯于遵守那“每天共同集体生活的简单基本规则”的残酷镇压记忆，会发生什么？如果有很多人拒绝从事分配的工作，或不完成指定的工作份额，以至于他们被判犯有不“各尽所能”罪？或者如果他们向此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索取的，超过了他们被认定的份额？

如果他们组织起来，秘密地装备武器并出乎意料地崛起，以夺取这无阶级无国家社会拒绝给他们的财富，将会发生什么？那不将是有必要立即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此抵抗？可能要取缔获取的本能比马恩想的要难很多。事实上，带着我们已经拥有的关于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知识，共产主义有一丁点儿可能超越无产阶级专政吗？

谬论二十五 — 最终，全面共产主义承诺那，即使没有普通的工作激励，那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将生产出更多的物品，胜过当今任何现存系统。在此理论下，共产党员对生产的设想，是其将神奇地到达一绝对饱和的状态，然后所有人类需求都将被满足。物资将被大量储存，并根据每人需求被分配。服务也将类似地在中央货仓被提供，而且提供量将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消费者间的竞争元素都将被消除。故此，共产主义承诺消除市场，金钱和价格。

那如果绝对饱和的目标没有达到，会发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不又要被召集来平息不满吗？此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是汽车。要生产多少汽车才能给“想要的”（其将必然成为“需要的”同义词，如果将没有国家政权）二十亿人口，到达绝对饱和？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必然条件令每个家庭满足于一或两辆车。如果这个经济必然条件被移除了会发生什么？在全面共产主义下，一个好工人有资格获得他想要的所有车。除非他得到一切他想要的，那自私的怪兽将抬起它丑陋的头颅。共产党员的著作一次又一次地承诺，将有足够的生产来消除导致阶级斗争的自私因素。

还有出新车型的话怎么办？社会将自动报废所有的车，当每次开发出一新车型吗？在全面共产主义下，谁将想要辆旧车？这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上，这将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并且关联于各类生产都将会出现此问题。有人将不得不决定谁必须继续用他们的旧车一两年，要不然每个家庭都将几乎肯定的要求一辆新车，可能甚至要求好几辆。

显然，这种制度下的问题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任何消除金钱，市场和价格的希望都褪色到被遗忘。如此的系统相较于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还将需要很多倍的政府机构，还有那生产的物品和服务到如此多量，以至于使国家“消亡”的前景，既违背了逻辑理由，也违背了经验。

共产主义对问题解决是一消极的态度方法

在总结这共产主义基本谬误的讨论时，我们也许应该对其中最显著的谬论做出概括评论。这是共产党员的教条那，问题可以被解决，通过消除发出此问题的机构。即使马恩可能一直都没意识到那，这正是他们当时在做的，但读者将注意到此态度方法如何，完全地主导了他们承担解决的每个问题。

以政府问题为例。马恩将努力实现消灭政府的那一天，来解决这些问题。道德问题将通过抛弃道德来解决。宗教长出的问题将被解决，通过废除宗教。婚姻，房屋和家庭的问题将被消除，通过废除婚姻，房屋和家庭。

源于财产权的问题将被解决，通过不允许任何人拥有任何财产权。均等工资的问题将被解决，通过废除工资。关系于金钱，市场和价格的问题将被解决，通过废除金钱，市场和价格。生产与分配竞争的问题将被解决，通过强行禁止竞争。

最终，他们将解决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通过使用革命来摧毁这个社会。似乎共产党员希望的幽灵，只能在地球的大肠内崛起，通过现有一切的灰烬。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只为一个目的 — 摧毁。只有在此大毁灭后，共产党员领导们才敢于希望那，他们也许向他们的门徒们提供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可能。

正是这暗淡与模糊的对未来的承诺，如今共产主义正献给全世界。直到如此一天的到来，共产党员领导们要求全人类要忍受这暴力革命的大火，对抵抗团体的镇压和清理，财产的没收，他们自己描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基于武力，并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暂停一切公民自由 — 压制新闻自由，言论与结社自由，奴隶劳工营地的存在，秘密警察对所有公民的不间断观察，长期服兵役，集体农场的贫困，与偏离者/坏分子有关联将面临被清算的风险，最后还有对此经济秩序的容忍，其只保证给子孙后代勉强温饱的生计。

自从共产党员领导们第一次在一国家夺权后，已经来去四十多个年头了，来向那好奇的世界展示多么美妙的奇迹可能被锻造。从那一个国家，他们已经扩展了他们的钳爪，直到人类的三分之一如今

都屈服在他们的铁腕独裁下。那些已逃脱了他们暴政的人见证了那，马克思人种制造的一只政治怪兽，其包含了自历史的黎明起人心发明的，几乎每种形式的人格侮辱和折磨的文物收集。

当假装从所谓的资本主义压迫中解放人类时，马克思人种已然抗拒了二十世纪文明的温暖白光，以人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引入了奴隶制。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要抚育“普通人的权利”，却屠杀了他的同胞们，从富农(Kulak)到贵族，数目令理性感知迷惑。并在形容他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好的缩影时 — 最科学的生物，全宇宙内的最高智慧 — 马克思人属利用了他的狡猾来复合罪恶，史前时代最具掠夺性的部落都做不到。

正是由此原因，有识之士们将共产主义形容为扭转/退化并否定历史。它挑唆了人针对他自己。马克思主义消极的态度方法并没有解决现代生活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而仅是复活了那原始的问题，其已经被过去世代争斗的人道，成功地解决了。

为了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将查考导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被共产党员控制国家的诞生前状况。

第五章

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崛起

本章内描述的事件，是所有消息灵通马克思主义者心中的熟悉事实。共产党员们经常通过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诠释，来建立他们的论点，因而读者应发现此历史背景很有用。

本章还包括了主要共产党员领导人的传记 — 尼古拉·列宁(Nikolai Lenin)，莱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

阅读下列问题将表明本章旨在提供的一些答案。

1868年谁在俄罗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为什么视此人为他的“敌人”？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被刺杀后，关于俄罗斯共产党员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说了什么？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列宁？为什么他哥哥被绞刑处死？

谁组织了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们称他们的敌人是什么？这是准确的称号吗，还是关乎到战略？

托洛茨基的背景如何？他是怎么取到这个名字的？他如何逃离西伯利亚的？他为什么在1903年反对列宁？

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由少数激进分子领导的，还是全体人民的普遍起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反对承诺人民代表政府的“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

斯大林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他在神学院进修为牧师，为何被开除了？斯大林在1907年间的犯罪活动，揭示了他怎样的性格？作为工会组织者，宣传家和革命领袖，斯大林此期间的活动有多广泛？他和列宁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导致俄罗斯在一战中濒于又一次的全民起义？此危机中，沙皇的态度怎样？

马克思主义来到俄罗斯

1885年，美国公民怀特(Andrew D. White)完成了他在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参赞的职责，回国后他描述俄罗斯局势如下：“那整个政府系统是这世上最穷凶极恶的野蛮残暴。一个礼仪之邦如此退化，人民如此被碾压，官僚系统如此无耻，真是举世无双。”

当怀特做出此声明时，俄罗斯人口略超过七千万。其中四千六百万是农奴(serfs)，几乎是被囚禁状态。

回想到当马恩看到英国工人的状况时曾义愤填膺，但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俄罗斯的农民。俄罗斯农奴们不仅要挨饿，被剥削并赤贫化，而且他们还曾承受着封建政治铁腕制度的压制。到处都遍布着秘密警察，被逮捕并被判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威胁，还有那沙皇无处不在的军队施加他们头上的残忍恶行。俄罗斯农奴似乎没有任何不容侵犯的豁免权，无论是他本人，他的家当，他的孩子，有时他的妻子也一样。这一切都在沙皇的腐败官僚机构中掌权官员琐碎冲动地掌控下。

在1861到1866年之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通过批准数项解放法案/敕令，曾诚恳地试图废除农奴制(serfdom)。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农民们的贫困生活仍然是不安全的，苛刻并严峻的。爆发革命的条件正在酝酿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1868年来到俄罗斯，当巴枯宁(Bakunin)的《资本论》译本逃避了沙皇的审查，并在自由派和激进分子之间传阅，犹如一块精选肥美的精神肉排。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最初《共产党宣言》里的鲜红火焰被点燃了：“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枷锁。。。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

俄国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开始成形，而且到了1880年，马克思主义可被形容为肯定扎根了。第一次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1881年，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炸弹冲击下丧命，炸弹是被吉林维茨基(Ignatius Grinevitsky)扔进皇家马车里的，他是一个称为“人民的意志”(The People's Will)革命组织的成员。

沙皇的成功谋杀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感觉，那无限制革命的时刻可能很接近了。远在伦敦，年迈的马克思开始收到他俄罗斯门徒的询问。他们想知道，尽管俄国经济从未超越资本主义的门槛，在俄国是否可能发动革命？马克思勤谨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俄国有“有史以来为任何国家提供的最罕见并且最合适的机会，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换句话说，马克思建议有可能在俄罗斯提早革命。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理论转换。他还承认了他一早期预言的错误；即，革命将首先来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在他朋友中他宣称：“这是命运的讽刺那俄罗斯人，为他们我奋斗了二十五年，而且不仅在德文（出版物），还有法文和英文，都一直是我的主顾。”

却曾十分讽刺，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仍保持对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忠心耿耿，尽管马克思在他们身上堆积的口头和社论谩骂。巴枯宁案例就再真实不过了，第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推动马恩的理论如此之狂热，以至于他们俩都担心他可能会接管“第一国际”。他俩因此，标记他要被政治清算。

然而，即使到最后，巴枯宁仍重申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在谈到马克思对自己的“愤怒仇恨”之后，他总结道：“这给了我对公共生活的强烈厌恶感。我已经受够了，为斗争奉献了我全部青春后，我很疲倦。。。让其他更年轻的人接手这工作吧。就我自己而言，我不再感到足够坚强了。。。我因此，退出此竞技场，并只请求我亲爱的同时代人一件事 — 遗忘。”

1876年，巴枯宁放下了人生的重担，但受他馈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人民革命的“更年轻的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人群中。

尼古拉·列宁出生于1870年，而在1879年，约瑟夫·斯大林和莱昂·托洛茨基都来到了地球上。其他人将到来，但这三位将成为扛把/继承/扛起巴枯宁传统的主要领导人，并在当时为马克思做着他自己从未能做的事；这三位将在一场革命中使一伟大民族痉挛抽搐，并将在世界上第一个共产独裁诞生时，充当接生婆。

caption/尼古拉·列宁，第一个共产党员独裁者：“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未忘却那，暴力将是资本主义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不可避免的附属物。”/

列宁的早年生活

马克思绝对猜不到那，第一个共产党员独裁者会是一个像列宁这样的人，他于1870年四月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Volga)边的辛比尔斯克市(Simbirsk)。他的父亲是有贵族世袭头衔的国务委员，而他母亲是德国人，路德教派(Lutheran)的信徒。列宁有着红头发，高颧骨，还有他来自阿斯特拉罕市(Astrakhan)鞑靼族(Tartar)祖先的斜视眼。

列宁的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而“尼古拉·列宁”(Nikolai Lenin)是他的革命化名，自此开始扬名。他父亲被称为“开放/自由派”(liberal)，即使他是国务委员，列宁小时候接受过他的严格训练。他父亲是个有人道主义理念的人，他努力工作到死，在十七年间建立了450所小学。他去世时列宁15岁，而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悲剧砸到了他们家 — 他哥哥被绞死了。

这位兄长名叫亚历山大，死时快21岁。许久前，他丢失了他的宗教信仰，并渐渐深度着迷于唯物主义哲学。他也开始感觉到那，需要直接果断的行动，来实现俄罗斯的社会改革。

当在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 后改名列宁格勒 Leningrad)念大学时，亚历山大与几个同伙决定制造一个炸弹，其可被用于杀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该炸弹建在一个假的医学词典中，并由炸药和土的宁(strychnine 剧毒物)处理的弹丸组成。警察在暗杀阴谋就要被执行前发现，然后整组人被迅速逮捕。接着很快审判和定罪，然后在1887年五月，圣彼得堡的报纸公布，列宁的兄长已被送上绞刑架了。

当此骚乱消退后，刚满17岁的列宁，回到了悬梁刺股般的研读马克思和其他革命作家。就像他哥一样，列宁两三年前就已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并渐渐与马克思愤世嫉俗的生命诠释和解。此外，他兄长的过世加速了他尽快成为一名积极革命家的决心。

为了给他自己某种职业地位，列宁进行了深入的法律研究。通过他母亲的求情，他被允许在圣彼得堡大学参加期末考试，并在124名学生中考得第一名。列宁随后尝试执业，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几乎丢掉了他所有的案件，因而放弃了法律并再也没回头。

1891到1892年间，俄罗斯爆发了饥荒和霍乱(cholera)疫情。列宁当时居住的地区，那里著名的作家和慈善家托尔斯泰(Tolstoy)，通过组织数百个汤棚并给贫困农民分发谷物种子和马匹，来维持人民的勇气。但列宁才不管这些。他不肯帮助建立汤棚，也不加入某救济委员会。之后他被指控为欢迎此饥荒，作为凸显人民苦难和激发他们革命行动意愿的手段。毫无疑问在这些年中，马克思主义纲领坚定了列宁的思想，成为了一个毫不妥协的革命家。

此后不久，列宁在圣彼得堡定居。此时他23岁，并急于开始积极的革命工作。因而他加入了“解放工人阶级战斗联盟”(Fighting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然而在1895年，列宁得知自己患有胃结核病。这使他必须前往瑞士并在一特殊疗养院进行治疗。在西欧期间，他与流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取得了联系。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呆了很长时间，并感到受宠若惊那，流亡的俄国激进分子老大会和一个新人分享他暴力革命和推翻沙皇的计划。普列汉诺夫也同等地对列宁感到钦佩。他感觉到了列宁赫然仇恨的炙热，对一切沙皇政权所染指的；而因此决定列宁应返回俄罗斯，召集马克思主义者，并组织一个全国共产党员政党，效仿德国高度成功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列宁还被请求开始出版一个革命期刊。

这使命被列宁接受为英雄般的任务，其是命运给他预先安排的。回到俄罗斯后，他组织了罢工，训练了新兵，制定了政治策略并撰写了煽动性文章。但在这场有希望的运动中，一个警察卧底出卖了该组织，列宁发现自己被判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列宁痛苦地接受了他革命生涯的中断。

抵达西伯利亚后不久，有一名叫纳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马克思主义女子加入列宁，二人结识于1894年。在列宁的要求下，她被允许前来，条件是她和列宁结婚，合法化他们的关系。这违反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废除家庭”原则，但他们同意了，为了能在一起。列宁现在有了一个和他一样为革命献身的伴侣。他们没有孩子，而且他们亲密伙伴们表示那，他们有意计划不要孩子，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人生的使命，将不允许被如此妨碍。

在西伯利亚，列宁把时间花在了学习研究上，用隐秘墨水书写了大量信件，来巩固俄罗斯新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并完成了他《俄罗斯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Russia”)一书。

当列宁在1900年获释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谨慎的，算计的，羽翼丰满且诡计多端的革命家。他立刻前往德国慕尼黑，在那里他开始出版一称为《星火》(“The Spark”)的报纸，其可被偷运入俄罗斯。从而列宁和他妻子开始了十七年几乎不间断地在西欧流亡。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偷偷探访俄国。他们生活简朴并轻装简行。那似乎像是他们在等待着历史的呼声，来分派他们自己的革命角色。

布尔什维克的起源

到了1903年，列宁和他的妻子在伦敦成立了总部。他们曾感觉到他们是在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马克思已经去世十七年了，两人经常前往马克思坟头的公墓“朝圣”。

同年七月，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大会。四十三位代表来自俄罗斯，还有来自多个在西欧流亡的俄罗斯团体。作为大会主席，列宁起初的态度是温和且公正的，但随着讨论持续下去，他惊讶地发现，大会在往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是武装革命。列宁立刻将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召集在他身边。他在大会上将此议题剖开，即党籍是否应被限制于硬核革命家中（如列宁所主张）还是加宽到包括任何对此运动表示同情的人。

在此争端中，列宁暂时在他身边召集了大会的多数派，而后利用此作为基础，称任何支持他的人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来自俄语词 意思是“多数派”)，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则被称为“孟什维克”(Mensheviks 来自俄语词 意思是“少数派”)。很快就能看到含义为“多数派”政党头衔的宣传价值。这是又一个例证，说明了列宁的绝对意志来利用每一个形势，作为推动他全面政治战略的一工具。

然而在此特殊的大会上，列宁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团体联合起来针对他，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大多数问题上/事务中只代表少数派观点。尽管这样，列宁继续称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而任何反对他的“孟什维克”。

托洛茨基的背景

当时反对列宁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的，23岁狂热分子，名叫莱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未来的某一天，列宁和托洛茨基将并肩协力，但在1903年的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俩站在对立阵营。让我们先把故事暂停一下，简要思量托洛茨基的早年生活。

在许多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背景是相似的。二人都来自殷实的家庭，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曾变得幻灭并投身于革命活动，而且都曾在西伯利亚服过刑。

莱昂·托洛茨基出生时名为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他父亲是个富农(Kulak)。起初，托洛茨基的父亲是一个沙皇反犹太运动的逃犯，并从城市生活逃离，定居在黑海附近的农业地区，那里有更多的宗教宽容。然而随着家庭成员的兴旺，他们渐渐不再去当地犹太教会，也不再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最终，他父亲跳出来公开支持无神论。

当托洛茨基离开家上学时，与他随行的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对唯物主义的认同。这些态度很快开始有成果。快完成他的学业时，托洛茨基不仅呈现了一个坚定唯物主义者们的愤世嫉俗，而且他还表现出强烈迹象将成为一个政治激进分子。尽管托洛茨基的父亲非常不认同此倾向，然而没什么能劝阻他。每当托洛茨基放假回家时，二人之间定会爆发争吵的场面，且几年后，托洛茨基完全被家人疏离了。

在这些情况下，当马克思主义呈现给托洛茨基时，其很容易的在他心中找到位置。他的转化被进一步地促成，是由于教他马克思主义的是一位年轻迷人女士的事实，她年长托洛茨基六岁，二人后来结婚。她名叫亚历珊德拉·洛芙娜(Alexandra Lvovna)。

托洛茨基只有19岁，当他和亚历珊德拉决定出力组织“南俄罗斯工会”。分派给托洛茨基的任务之一是打印非法报纸。不出所料，这很快导致他被逮捕。托洛茨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被单独囚禁，并在一连串多个监狱间的辗转后；来到了西伯利亚，最终亚历珊德拉在那与他会和。他俩都被判处在一寒冷，荒芜且人烟稀少的地区服刑四年。在此流亡期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在1902年，托洛茨基藏身于一农民的一车稻草中越狱了。他到达西伯利亚铁路，然后使用一个假身份证冒充“托洛茨基”过关 — 他最近死掉狱卒的名字！自此他就用这个名字了。在几位马克思主义同志的帮助下，他前往伦敦并及时到达，来参加我们已提及的社会民主党大会。过些时候，他的妻儿也来与他团聚。

列宁和托洛茨基首次见面时一拍即合。列宁形容托洛茨基为一具有“罕见能力”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则建议列宁担任大会主席来投桃报李/回敬。然而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看够了列宁，以令他对列宁

头脑似冰冷的蓝钢刀刃，表示忧虑。当一些最老的和最受尊敬的党员反对列宁意见时，他们被列宁迅速切割；他鲁莽的冷漠令托洛茨基震惊。（托洛茨基1903年对他伙伴同志感觉的温柔关心与他在1917-1922年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亲自监督了对数百名被他怀疑为偏离既定党政策的同志的残忍清算。）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在1903年对列宁的暂时反对，并没有伤害他的革命生涯。在随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发展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和演讲家，而且远比列宁更早在西欧成为知名人物。他被描述为一英俊，自大，反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对高雅服装的讲究，有时会冒犯到他的马克思主义同事们。他的弯钩鼻和胡髭为他赢得了“小鹰”的外号。

现在，让我们回到俄国革命运动的快速事件进程。

1905年的俄国革命

到了1903年，俄罗斯的政治局势濒于爆炸，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还没意识到，但他即将成为最后一位沙皇。作为统治者，他被历史证明为令人惊叹的软弱。当他年轻时，他一直都很和善且友好，俄国自由派曾希望那当他登基后，他将采用他国家迫切需要的改革，旨在使俄国加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对此让他们失望了。尼古拉二世永续了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强制了他被刺杀祖父的严格内务政策。事实上，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扩张野心，尼古拉二世在1903年将俄国陷入了一场和日本的，毫无疑问的战争。他几乎立刻发现，俄国军队遭受了屈辱的战败。

这场日俄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一点，且在接近其羞耻结局时，俄国人民的经济与政治压力令帝国坍塌。政府官员被暗杀，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呼吁了一次大罢工，其最终闲置了超过250万工人。沙皇利用了一切可用的打击方式来镇压起义，但大规模逮捕，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处决，都未能遏制这一潮流。全部人口都武装了起来；银行家，农民，教授和文盲们都并肩示威游行。

沙皇的笨拙调动带来了革命，一个典型例子是冬宫大屠杀(Winter Palace Massacre)。该事件发生在1905年一月22日，星期天，名为神父乔治·加蓬(Father George Gapon)的牧师率领几千名手无寸铁的工人，游行到冬宫门前提出和平请愿，以改善劳动条件。当游行接近时，可以看到他们举着尼古拉二世的巨大肖像，还在乐意得唱着“天佑沙皇”。曾是个奇怪的场面。工人们的明显贫穷和沙皇冬宫的宏伟壮丽形成鲜明对比。冬宫是座庞大而奢华的建筑，其装潢华丽的公寓可容纳6500多名客人。

但是沙皇没有出来欢迎他们。取而代之的是，游行发现发现宫殿完全被大批部队包围。起初工人们对此状况很警觉，但当时没有驱散的指令，他们感到放心了。然后突然，他们听到了军令断音的嘶叫声。沙皇的部队立即直接向人群开火。消逝的抛物线将前排倒下，而其余的游行惊恐地在试图逃离中，相互踩踏。部队持续开火，直到人群被完全驱散。大约500人被当场杀害，还有3000多人受伤。这成为了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

此暴行的消息如海啸般横扫俄罗斯大草原和平原。人民已经因对日俄战争负担的怨恨在怒发冲冠，然后这新的愤慨足以引发一场普遍的暴动/造反。一开始，少数人尝试使用暴力，但总体来说，主要的反击方式，是瘫痪沙皇的战时经济 — 人民停止了工作。短短几个月内，整个俄罗斯的经济机器陷入了停滞。工厂关闭了，商店空着，报纸停刊，干货和燃料没人搬运，并且新丰收的谷子被留在装卸场里腐烂。那是他在位的第一次，尼古拉二世感到了深度恐惧。他放弃了日俄战争，并同意聆听人民的要求。

这些包括四件事：

- 一。保护个人。允许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并有权利组建工会。
- 二。所有阶级的人民都有权投票选出“杜马”(Duma 人民议会)。
- 三。没有人民议会同意，任何沙皇颁布的法律将自动废除。
- 四。人民议会有权审核，任何沙皇诏书的合法性。

这些要求被定在一份称为《十月宣言》("The October Manifesto")的文件里。该宣言清楚地表明那，人民群众无意摧毁沙皇，而仅想建立一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限皇权。如此妥协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想让这革命持续下去，直到沙皇被迫无条件投降且退位。但不如此，他们无法建立共产专政。

当起义开始后，托洛茨基已匆忙赶回俄罗斯，他站在正庆祝着沙皇接受了宣言的人潮前，撕毁了宣言的副本，并声称此宣言是对革命的背叛。他立即与其他马派（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政治机制，以对复兴的革命活动煽风点火。这主要是通过组织大量的苏维埃(soviet 各工会的议会)来完成的。列宁在1905年十一月姗姗来迟，并同意与托洛茨基一起进行“二次革命”。然而六十天后，马派运动崩溃了。托洛茨基被抓捕，而列宁在夜色中逃往安全区域。

就这样十四个月针对沙皇的绝望反抗结束了；前十二个月属于全部人民，后两个月属于马派。总计，遍布帝国的部队奉命出勤超过2500次。在人民与部队之间的战斗中，一万四千人被杀，大约一千被处决，两万人负伤，且七万人曾被逮捕。

托洛茨基在革命最后阶段的领导，为他赚取了沙皇法院的严厉判决。他因革命暴力被定罪，并无限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托洛茨基压根没到西伯利亚。他在寒冬中英勇地越狱了，并在四百三十英里鹿拉的雪橇旅程后，骑马穿越了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然后逃往芬兰，在那里他与列宁和数位其他马派会合了。

正是当托洛茨基在芬兰期间，他仔细编制了他“永恒革命”(Perpetual Revolution)的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共产党员对一切现有政府的持续攻击，直到他们都被推翻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为止。这令托洛茨基与列宁几乎完美聚焦。或许都没完全意识到，他把自己讲得成为了一个羽翼丰满的布尔什维克。

在此特定时期，布尔什维克运动处于其最低潮。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没能实现他们的承诺要迫使沙皇退位，和他们的持续革命，在“十月宣言”令沙皇怨愤之后，以至于他几乎否认了该宣言。他允许人民选举出杜马（人民议会），但他设法剥脱了其所有的真实权利。人民知道他们被骗了，但不发酵另一场革命就无法强制执行该宣言，至少在目前这似乎不太可能。个别团体确实继续了针对沙皇和他大臣的煽动，但其中大多数，就像布尔什维克领导们，被迫逃亡西欧保命。

为了重振布尔什维克党日益减弱的影响力，列宁开始召开一系列会议。在其中一场私会中，一位新的革命人物出现在镜头前。那就是约瑟夫·斯大林(Joeseph Stalin)。斯大林作为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某布尔什维克小团体的无名代表前来。列宁立刻认定他是一个农民阶级的真正革命党成员——粗暴的，不屈不挠的，有残酷行径两次被捕的人。列宁为这样的人物留好了位置，且因此将斯大林收入他的麾下。

这带我们到了第三号重要人物，他在俄罗斯革命运动中举足轻重。

caption/约瑟夫·斯大林，一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一个受害者，深思熟虑地准备一个计划，进行一个对死敌的复仇，然后去睡觉。。。世上没什么事比这更甜蜜了。”/

约瑟夫·斯大林的背景

约瑟夫·斯大林原名为朱加什维利(Djugashvili)。他出生于1879年十二月21日，在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哥里(Gori)小镇。当初庇护他的那简陋木屋，如今已被建成为一座国家纪念馆，由大理石华盖覆之。

斯大林的父亲是个鞋匠，酗酒成瘾，其最终要了他的命。斯大林只有十一岁当他父亲过世时。此后，斯大林的母亲替人洗衣服，做清洁，缝纫衣服和做饭，来赚足够的钱让斯大林上完学。由于他母亲想让他成为牧师，在附近第比利斯市(Tiflis)的一所神学院，他被录取。

当他了解了周边环境，斯大林发现这神学院里密密麻麻的都是秘密社团。其中很多都在培植费尔巴哈和鲍尔的无神论著作，还有马恩的革命著作。没过多久，斯大林坚信自己更偏爱革命而不是宗教，且因此他在神学院学生中存在的秘密组织里变得积极活跃。接近三年内，他一直持续这些活动，但他最终在1899年五月被暴露/接发，并被神学院因“缺乏宗教使命”而开除。

当他进入外面的世界后，斯大林全职为专业的马派革命家。他组织了罢工，举办了非法的五一节庆，并最后逃往巴统(Batumi 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市，在那里他成为了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劳工煽动者。最后他被逮捕，并入狱至1903年，他被判刑流放三年到西伯利亚。

当他听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时，他还在西伯利亚。斯大林几乎本能地感觉到他自己将成为一个硬核布尔什维克，且在来年成功逃离西伯利亚后，他回到第比利斯市并成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在他家乡格鲁吉亚省(Georgia)引领了一场最终流产的革命，然后立刻前往芬兰，去参加布尔什维克大会并接触到列宁。

自此之后，斯大林一直担任他深深景仰的列宁的副官。用不了多久，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狂热就开始泼辣地展现其本体。

斯大林从事犯罪活动

在1907年夏天，斯大林与列宁在柏林秘密碰头。之后，他返回第比利斯市并组织了一场抢劫。那可不是什么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而是一重大土匪行动，其完全无视斯大林自己家乡男女老幼的生命。

一个车队在从邮局到第比利斯市的国家银行分部运送现钞，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扔到车队前。炸弹炸死了拉车的马匹，杀死了几个路人，并造成五十多个成人和儿童受伤。随后歇斯底里的混乱中，投掷炸弹的人从马车上夺走了装有34.1万卢布（约17万美元）的钱袋，并迅速逃离。

此罪行反映的如此完全无视人命，以至于俄罗斯内外当局都试图追寻每条有可能揭露抢匪身份的线索。最后，这笔钱被发现在斯大林的一亲密同事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Maxim Litvinov 斯大林之后在1933年派此人前往美国，寻求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承认)手中。李维诺夫和一同伙在巴黎被法国当局逮捕，当时他们正在试图将卢布兑换成法郎，之后要转给列宁。犯罪的细节终于被当局查清，而且元凶的姓名被揭露。尽管如此，斯大林成功地逍遥法外了好几年，并持续他的革命活动。

斯大林为工会组织者，作家和布尔什维克领袖

1907-1913是斯大林的脏活累活年代。没人能指控他仅为一个“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他们有时如此形容列宁。斯大林学会了关于宣传，高压政治，群众交流，罢工技巧和煽动劳工的每一个把戏/诡计。一些他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巴库市(Baku)高度活跃的工业区。在那里他被分派去组织成千上万的油井和炼油厂工人。为此他建立了一个三重系统之，合法的，半合法的，和完全非法的组织。他在这庞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头上强加的领导力如此完全，以至于他能够组织一个强大的工业苏维埃(soviet 工人议会)，其由上至下都是被自己忠实的布尔什维克同事所主宰。

斯大林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效的演讲家，由于他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在1907到1913年间，他成为了一个谄媚的革命作家。有一段时间，他在第比利斯市给称为《时代》('Dif' Time)的社会主义报纸当编辑，其中他对孟什维克尖酸刻薄的攻击，即使在布尔什维克中也引发了惊愕。在1910年，他去了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并为社会民主党的《星报》("Zvezda" Star)，并之后《真理报》('Pravda' Truth) 撰稿。正是在这些期刊中那，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首次以他的笔名被人知晓，“钢铁人”(Man of Steel)，或斯大林。

在1912年，当列宁完全从社会民主党脱离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时，斯大林受到了特殊的认可/推崇。在该新机构中，斯大林被列宁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年，斯大林的事业被打断了，当他被逮捕并被送往西伯利亚。对斯大林来说，这是老调重弹了。自1903年起，他曾被逮捕八次，流放七次，并逃跑了六次。但这最近的一次逮捕将没有逃跑了。他将被送到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区之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斯大林没有特别想逃离的愿望。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将在西伯利亚放松并享受他的“假期”，因为逃跑有可能导致他被征召入伍。他和兵役不想有一点瓜葛。

俄罗斯在一战中的角色

回想起1914那年，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在伸展他们军队的肌肉。曾是不可避免的那，在外交事务中最微小的失算/误判，都有可能释放毁灭人类的翻滚岩浆。炸药桶的火花曾是那奥匈帝国的储君，被一个塞尔维亚秘密社团的成员刺杀。这发生在1914年六月28日。

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一直都在寻找接管塞尔维亚(Serbia)的借口，并因此她的部队开始进军。这激怒了沙皇，因为塞尔维亚是在他自己的征程日期表上的，因此他向奥匈帝国宣战。德国来保护奥匈帝国并向俄国宣战。当时法国是俄国的盟友，所以德国以此为借口向法国宣战。这使英国作为法国的盟友卷入了战争。如此，战争机器开始了运转。

从俄罗斯沙皇的角度来看，一战的到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意外。多年来他通过建造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一直忙于准备之。尽管如此，俄罗斯人民并未对战争做好心理准备。

近十年来，人民和沙皇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他没能实现他在1905年“十月宣言”中承诺的宪政。当然，当人民在一战爆发受到攻击的威胁时，他们本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防御，然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把这事当是个好兆头那，人民会在整场冲突中忠诚地支持他。

但仅几月内，就开始看出来战争的劳损了。到1915年，已经怨声载道了，然后到1916年，沙皇的战争机器在嘶嘶抽搐中濒于崩溃。三年里，俄罗斯动员了超过1300万战斗人员，其中约200万人战死，约400万人负伤，还有250万人被俘。24个月来，前线的消息曾是一致的糟糕。俄军被赶出了加利西亚(Galicia)，俄属波兰，以及立陶宛，塞尔维亚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一部分。

当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参战后，其切断了俄国的外贸到一丁点儿，并从而孤立了俄国，使她得不到盟友的武器弹药。送往前线的后备军是经常如此的装备不足，以至于其中一些人不得不在路上从死去的士兵那里捡起步枪。缺少弹药常常迫使指挥官，限制步兵每天每支枪配额不超过四发子弹。

在此关口，英国大使警告沙皇那，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整个东部前线有可能崩溃。俄军的逃兵已到达了丑闻性的比例，而且工人和农民们都在威胁要造反。食物短缺在加剧，因为政府在用毫无价值的纸钱收购粮食。在城市中，生活成本涨了三倍，而工资仅略有上升。

但沙皇却看不出任何需要警惕的理由。他化解了1905年的反叛；他想此时还能如法炮制。为展现他对局势的全面信心，他宣布那他将去前线，以他的出现鼓舞士气。

但他似乎忘记的是那事实，人民的状况与促成1905年革命的几乎完全一致。用沙皇的出现来鼓舞士气，已经太迟了。沙皇的统治已经注定灭亡了。只是他还不知道。尼古拉二世将在短短数月内失去他的王位，并在之后不久，他的性命。

第六章

俄罗斯如何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大国

在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以及随后的二十年，可恰当被称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约”。共产党员将其呈现为他们的历史证明那，马克思的理论能被成功地执行。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强有力证据，也在这同一段精彩历史中被揭露。本章将所有相关事实汇总在一起，以供读者自行判断。

阅读下列问题可能帮助认定一些，讨论此时期历史时经常出现的一些议题：

迫使沙皇退位的是谁？共产党员领导们当时在哪里？1917年三月的俄国革命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什么方面完全雷同？列宁如何返回俄国？为什么德国军官想帮助他？

当在1917年十一月25日举行全国选举时，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民投票反对列宁的政权？

列宁将俄国抽离出一战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与德国人签订的条约被称为“俄国的大灾难”？

当列宁将马克思理论应用于俄罗斯经济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列宁下令处决沙皇和他的家人？

在什么情况下曾迫使列宁抛弃很多马克思最中意的理论？

为什么列宁在临终前写下遗嘱那，他曾希望绝不允许斯大林夺权？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1932年十二月，俄国共产党试图罢黜斯大林？什么拯救了斯大林？

为什么斯大林处决了几乎所有共产党高层？到1938年，斯大林说他准备好了要做什么？

1917年三月的俄国革命

那是在1917年三月8日，当俄国革命的高涨情绪终于水漫金山，如洪水般的政治愤慨湍流向沙皇和他的政权。相较而言几乎没什么暴力。反抗的感觉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当信号一给出，二十五万游行示威者就出现在首都的街头。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示威者接管/占领了首都之后，革命自动地席卷了整个帝国。

这场革命对全世界都意义重大。记得1917年春天曾是一战的高度关键阶段。美国才刚刚参战，而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几乎筋疲力尽了。因为整个西线(Western Front)仅勉强能作战抵抗德国和她中央国(Central Powers 别译同盟国)的猛攻，几百万俄国人的战争机器在东线崩溃，可能意味着对协约国(Allies)明白无疑的灾难。

该俄国革命对德国也具有重要意义。凯撒(Kaiser 德国皇帝称呼)知道那，如果俄国从战争中撤离，东部的大批德军都能被转移到西部。这将给他超级优越的军力，能够击碎一切阻力。

但俄国革命后的人民从未打算让东线崩溃。他们对沙皇的反抗是要拯救俄罗斯，而不是毁灭她。当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了一项全面计划来创建一个民主的，宪法制的政府，并敦促猛烈地继续战争。这恢复了西方协约国的希望。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立刻承认了此新政权，而且各地自由人的爱心都飞向那自由新星，其似乎是从俄罗斯喜庆人民中升起。

至于沙皇，他很难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革命刚开始时，尼古拉二世断然拒绝承认他的政府已解体。当游行示威第一次出现，他就解散了杜马（人民议会），并命令部队驱散人群。然而在一周内，他自己的大臣都在敦促他退位，因为他的根基毫无希望了。

要直到他的将军们也敦促退位时，他才最终投降。然后，他和他的家人在彼得格勒(Petrograd 后改名圣彼得堡)郊外的皇宫被软禁。尽管人民在他统治下受尽苦难，但临时政府并没有打算杀死沙皇，而是在当战争条件允许时，尽快将他和他的家人送往英国。

处理好沙皇，临时政府然后开展了双重任务，即启动广泛的内务改革，并在同时，重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前线，部队展现出新的战斗精神做出了回应，且在一个月內，国内的内务改革取得了卓越进展。在他们历史中的第一次，俄罗斯人民有了一个自由民主政权统治他们的前景。加入人民起义的李沃夫亲王/大公(Prince Lvov)自信满满地宣称：“我们应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处于俄罗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

俄罗斯的民主计划遭破坏

关于沙皇退位和在俄罗斯建立的人民临时政府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那简单的历史事实，即布尔什维克或共产党员几乎与其毫无关系！这场革命启动于类似1905年针对沙皇起义的那些人。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最好的人民 — 自由派的贵族，知识分子，商人，和百万计的农民与工人。但根本看不见布

尔什维克领导们。列宁流亡在瑞士，托洛茨基流亡在纽约而斯大林则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对他们未来宣传很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永远不能称其对1917年三月推翻了沙皇的革命有任何功劳。

那是临时政府的宽宏大量，其准许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们的返国。所有政治犯从西伯利亚被释放，并且所有海外政治流亡者都被邀请回家。当英国人听说列宁正被允许返国，他们警告盟友俄罗斯那，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列宁能够返回俄罗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德国特工的协助。德国人合作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人已对俄罗斯人民卷土重来的前景变得警觉，而且他们正在寻找一些机会来在俄国临时政府间制造迷乱与分裂。在瑞士与列宁的简短交谈使他们坚信，他是最佳人选。他们因而将列宁和他妻子还有数位俄国流亡者，穿越德国运送到瑞典。从那里列宁可轻易前往俄罗斯首都。

当列宁抵达彼得格勒时，他被当成同情该革命的同事，受到人群的欢迎。一个军队护卫帮他登上了一装甲车车顶，在那里广阔的人群满心期待着列宁对他们的成功表示嘉许。但当列宁唇枪舌剑般的言语喷口而出时，那远不是赞美的。他煽动性的声明，文字上几乎等同于一新的战争宣言！

他痛斥临时政府为建立共和国所做的努力。他要求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专政，并号召斗争来接管土地房产，以及立刻使俄国人民服从于全面社会主义的经济纪律。他谴责了持续战争的所有进一步行动，并说应与德国立即和平谈判。（他后被指控试图令俄罗斯退出战争，以报答德国人/偿还对德国人的义务obligation。）

仅几周时间，俄罗斯全境就都听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们的宣传，当他们回应了列宁在彼得格勒演讲中定下的方案。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斯大林，在新的共产党员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在督促反革命。从纽约返国的托洛茨基，利用了他卓越的口才来煽动工会和军队推翻临时政府。“和平，土地和面包”，曾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当时光景下，这个宣传必然有一定魅力。

临时政府曾试图警告民众不要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诱人承诺，但该政府正开始失去声望，因为群众在要求改革的速度上超过了新政权能提供给他们的。此倾向抹杀了政府领导们的警告声。实际上，在1917年七月期间，农民，工人和军队中的爆发又在开始消退，而列宁则论断进攻的时机已成熟。他假定那，由于俄军在前线忙着拼命抵抗德军，那么攻下守卫家乡的老头和年轻人将不会太难。然而，于此他失算了。当列宁带着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发动进攻时，临时政府不仅镇压了起义，而且还迫使列宁逃去芬兰保命。

自此之后，列宁更加谨慎行事。他允许他的下属组织全新的革命力量，而他从国外指导工作。其中下属之一是托洛茨基，如今已公开承认他是布尔什维克，并且在迅速上升到第二号位置。他被分配的任务是要在工会，陆军，海军和农民之间，组织武装暴动分子的“红卫兵”(Red Guards)。

到十月上旬，列宁感觉到那可以安全返回俄罗斯了，并在十一月7日，他做出了命运性的决定，即发动对临时政府的全面革命。革命始于列宁命令托洛茨基让红卫兵向冬宫开火，并试图夺取所有政府据点。在猛烈攻击下，这些行政中心很快投降了，而且几乎所有临时政府的官员都被俘虏了。这就是共产党员写手们称“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开始。

使用武力和暴力令布尔什维克在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夺取了政权，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很多星期，正规军无法来援助临时政府，结果在当时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下，人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抵抗。到十二月中旬，布尔什维克正在平息最后残余的顽固抵抗，尽管早这之前很久，大众都懂了那他们梦想的民主已死。

俄罗斯在投票中拒绝共产主义

在临时政府遭推翻之前，其已将十一月25日定为全国选举的日期，旨在创建人民议会或国会。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曾大声喧哗地要求此选举，而因此列宁并不敢推迟之，尽管当时列宁仍在巩固自己的权利。该选举如期举行。

就列宁梦想的群众支持而言，选举结果是灾难性的。超过75%的人口投票反对他。明显这意味着那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将会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所以当这些代表在1918年一月18日召集时，列宁已经决定好要做什么了。

他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将他们所有的立法职能，都移交给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大会”(Congress of the Soviets)，然后投票解散他们自己。这当然，是如此的非法和荒谬，那他们根本不理睬。列宁因而动用了这“不得已的手段”——武力。第二天一清早，武装警卫进入了会议厅，且命令代表们休会。当代表们看着竖立的步枪时，他们知道别无选择了。不情愿地，他们离开了。

此非法行径敲响了俄罗斯民主的丧钟。尽管如此，列宁明白此残忍对策给了他敌人高效的宣传来令他失信。这个问题被解决了，那将来的所有红色力量政变，将给出一种错觉那是通过正常民主程序而实现的。然而当下，伤害已经造成。共产党员已推翻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接近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组织。现在，人民将领教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二了。

列宁使俄罗斯脱离战争

列宁最初的野心之一，是要解除“东部战线”并使俄罗斯脱离战争。除了履行任何他可能对德国人做出的承诺，列宁还有他自己高度重要的原因来采取此行动。他曾认为那，战争的劳损将有可能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一系列共产党员革命。所以，他想要俄罗斯在此冲突中脱身，以准备好她作为“共产主义母国/祖国”的角色。这将给他机会来巩固自己在俄罗斯的权利，并然后监督在厌倦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以便在很短时间内将全世界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

然而，要让俄国抽身于一战并非易事。几个月来，俄军面对着更优越的军力一直在撤退。结果，当列宁终于与中央国(Central Powers)达成停火协议，并提出谈判来达成和平协议时，他们将他视为某被征服国家的战败领袖。德国对俄国提出的要求极为蛮横过分。列宁犹豫了。为了让他就范，德国人进军占领了更多俄国地盘，并很快就威胁到了彼得格勒的非常辖区。列宁匆忙将他的政府转移到莫斯科，并接着做了一件对共产党员革命深感耻辱的事；他向俄罗斯的老资本主义盟友——法国，英国和美国——恳求帮助。

他被更进一步地羞辱，当这些国家完全无视他。列宁已毁灭了协约国防守的平衡，当他将俄军从冲突中撤出。此时这些国家正在忙着准备自己的防守，抵抗那德国春天计划的全面进攻，以至于他们既无意愿也无方法来帮助列宁摆脱他自己造成的困境。

他就像一个陷入了困境的政治赌徒，列宁此时权衡了自己存活的机会，并决定迫使他自己的政党来支持他接受中央国的猥琐要求。甚至“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委员会，钢铁纪律般的成员都退缩于列宁的提议，但尽管如此，他最终以七比四的投票迫使其通过。

结果便是，俄国和中央国间在1918年三月3日签署了一协议，其已成为声名狼藉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

内中列宁接受了条款，其从俄罗斯帝国夺走了6200万人口，126.7万平方英里(一英里约1.61公里)的耕地，26%的铁路，33%的工厂，75%的煤矿和75%的铁矿。除此之外，列宁还承诺那俄罗斯将支付给中央国15亿美元的赔款！

令850万俄罗斯人民伤亡的战争，便如此地收场了。

首次尝试共产化俄罗斯

随着俄罗斯退出战争，列宁此刻感觉到有足够的信心使整个俄罗斯经济服从于共产主义理论。他从私有业主手里没收了所有产业，并将其置于政府运营下。他夺取了所有属于贵族，沙皇和教堂的土地。他还夺取了所有牲畜以及普通农具。然后，他废除了工资，并以“各种实物”的直接支付替代之。这使俄罗斯负担了缓慢且原始的以物易物系统。他命令所有国内物资将在人民中根据他们的阶级实行配给制。例如，每个工人或士兵被配额35磅(一磅约450克)的面包，而非工人，例如经理，只有12磅。列宁还令所有劳工服从于调动。有技术技能的人可能被迫接受任何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零售商品的销售被政府接管了。

至于对农民们，列宁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但要求他们在农耕时不准雇佣任何人且不准出售任何农作物。一切都将交给政府。此外，土地不能够被出售，租凭或抵押。

1918年三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但自开头起，俄罗斯人民对新秩序就不太满意。在工人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激励的情况下，农场和工厂的生产减少到一丁点儿。工厂很快降到了战争开始之前持续产量的13%，而且农民的产量减了一半。黑市开始蓬勃兴旺。工人们经常从工厂里偷东西，来换取农民们背着政府偷偷藏下来的物资。不久之后，农民们藏匿的收成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

可能预料到的是，这俄罗斯经济的解体，给人民头上带来了所有的愤怒与不满，针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们。已知的每种恐怖手段都被利用来迫使人民去生产。这导致了反击报复。

在1918年夏天，激烈内战爆发了，当“白卫兵”(White Guards)誓言他们将推翻红的并解放俄国人民。西方协约国，尽管他们也很吃力，对此运动表示同情，并发送了补给，装备，甚至他们能多余的任何部队，来帮助俄罗斯人民脱离布尔什维克的魔爪。

列宁明白这是个最高级别的危机。他因此决定在三个不同方向同时反击。为抵抗有组织的军队团体，他授权托洛茨基强行动员一支红军，其最终总数达500万人。为抵抗人民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且拒绝工作，他组织了秘密警察或契卡(Cheka)。该机构可调查逮捕，裁定判决并处决可疑人员。当局指出，在内战期间，上万人在它的行刑队前倒下。最后，列宁向沙皇出拳。为了防止一个新的君主政党被创建的任何可能性，他将沙皇，皇后，他们的子女和他们所有的仆从，在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枪杀，并将他们的遗体完全销毁。此大规模暗杀发生于1918年七月16日。

六周后，白军的热血复仇差点要了列宁的命。布尔什维克高层在一危险地带被堵了，然后一连串的步骤火力暗杀了契卡头目，并使列宁受重伤。为了报仇，契卡迅速处决了500名犯人。

当一战在1918年十一月11日告终时，其对俄罗斯的局势几乎没有影响。内战更激烈的持续着，而且布尔什维克加倍努力要共产化俄罗斯。列宁继续在帝国的每个角落建立苏维埃(soviet)或工人议会，

然后这些苏维埃又送代表团到首都的“最高苏维埃”。通过这布尔什维克主宰的工会帝国的渠道，列宁执行了他的政策。在苏维埃身后站着红军的执行力，和契卡秘密警察的恐怖。

尽管所有的这些胁迫方法，然而列宁最终发现他在打一场败仗。一段时间以来列宁得到了勇气，由于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全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for all people)的政策下，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开始撤离他们的部队和物资；但与白军的激战仍在持续。

列宁的断点在1921-22年到来，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经济低效，被一场灾难性的饥荒复合。俄罗斯的面包篮 — 伏尔加河畔(Volga)，庄稼完全没有收成。巴塞基斯(Nikolaus Basaev)写道：“任何曾在灾区的人，任何见过那些挨饿的被残暴对待的人民，永不会忘记那场面。人吃人是常见的。绝望的人们在蠕动，枯瘦的，像棕色木乃伊。。。当那群野蛮人扑向毫无防备的村庄时，他们惬意地屠杀每一个活人。”

成群的孤儿在野外游荡，像饿狼一样穿越城市和乡村。据估计，在1922年间，超过3300万俄国人在挨饿，其中500万死了。美国人民对这种几乎难以理解的苦难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他们为“胡佛委员会”(Hoover Commission)筹款，在1922年间供粮给超过1000万俄国人。

共产党员梦想的终结

然而，即使在这场灾难之前，列宁已强迫自己承认那，他曾分派给他的国家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和平，而是一场可怕的内战，其中2800万俄罗斯人丧生。列宁强加给人民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承诺的带来产量增加，而是减少了产量，以至于即使在正常时代，它都不能给其一半人民带来足够的衣服和饮食。

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并鉴于此些事实那，列宁承认了挫败并下令撤退。早在1921年，他就宣布了那将会有有一个“新经济方案”(New Economic Program)。

这羞辱的政策逆转被共产党员采用，以免被废王位。列宁重新引入了给工人支付工资，其立刻产生了货币流通，取代了旧的以物易物系统。替代了政府的交易中心，他允许民间开始买卖，以至于一年之内，四分之三的零售分销重归私人手中。他甚至鼓励农民租凭额外的土地，并雇佣其他农民，真是玷污了神圣的马克思记忆。他还试图鼓励个人主动性，通过保证农民们他们可以在开放市场上销售他们大部分的谷子，而不是像以前被政府代理夺走。

仅几个月内，老共产经济体的赤贫和饥荒开始消失。供需法则开始生效，因此个人主动性开始了给人们提供所需要的。在城市里，相对繁荣的气息迅速回到了苍凉的街道和空荡的商店。

斯大林的崛起到掌权

列宁几乎没有活得足够长来看到“新经济方案”的生效。他在1922年第一次中风，并于1924年一月20日去世。当列宁看到自己大限将至，他对斯大林成为他继承人的可能性变得警觉。很多年来，列宁曾一直利用斯大林来履行需要最残忍手法的任务，但此时他变得担心害怕，假如斯大林利用同样的方法接管共产党，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1923年十二月25日，说不了话且半瘫地躺在病榻上，列宁向政治局(Politburo 共产党最高统治议会，而因此，全俄罗斯最高权力单位)成员写了以下戏剧性的呼吁：

“斯大林太粗暴了，而此缺点，在我们共产党员关系中是完全可支持的，而在总书记公职上则变得无法支持。因此，我向同志们提议去找寻一途径，将斯大林从那个位置上移除，并指定给另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与斯大林不同的人。。。亦即，更有耐心，更忠诚，更和气，而且更关心同志，少一点任性，等。此情况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但我认为从防止分裂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绝非琐事，或者这是如此的琐事其后可能获取决定性的意义。”

时间证明了列宁知道他说的是什麼。斯大林对生命的整体态度，能在他掌握权利后做出的一陈述中被抓住：“选择一个受害者，深思熟虑地准备一个计划，进行一个对死敌的复仇，然后去睡觉。。。世上没什么事比这更甜蜜了。”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罗斯政府中清洗，并逃到墨西哥以躲避暗杀。尽管托洛茨基生活在高度警惕下，一个杀手最终找到了他，在1940年八月，用一根登山杖砸碎了他的头颅。/

到1927年，斯大林已实现了所有列宁担心他可能的 — 对俄罗斯帝国的彻底控制。他已不仅移除了托洛茨基的席位，而且还赶走了竞技场每一个强大反对派的来源。他在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如此全面的胜利，以至于他此时感觉到足够强大来试着满足他最大的野心之一。他决心再次尝试进行俄罗斯的共产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其目的是抹杀在“新经济方案”下商人和农民曾繁荣发展的独立性。又一次，来了大规模的财产没收，而且又一次，秘密警察开始处决大规模抵抗的俄国人。斯大林铁了心肠那，俄罗斯经济应被立刻强迫进入理论社会主义的框架，并向世界展示那，它较于资本主义工业国能够生产更多并分配更多，诸如美国 and 英国。然而仅数周内，该五年计划已扫除了“新经济方案”下俄国已熟悉的繁荣暖光和相对的物质丰富。配给制又变得有必要了，而且不得不又开始做那被痛恨的，由桦树皮做的革命“饥荒面包”。

该五年计划的基调是集体工业和集体农业。斯大林晓得他将从富农(Kulaks 库拉克)那里遭遇抵抗，而他因此下令对库拉克作为一个阶级，进行全面种族灭绝式的清算。一些库拉克们毁灭了他们的财产，烧了他们的家，宰了他们的牲口并逃向高加索山区，但他们大多数都被抓或死在路上了。官方报告显示，叛乱村庄是如何被大炮夷为平地的，而且在顿河(Don)地区某处，五万名男女老少被毁灭，仅剩的2000人被驱逐到中亚，而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则被集体农耕接管。

斯大林还在这“五年计划”中包括了加速共产党员针对宗教的斗争。到1930年，“无神论武装联盟”(Union of Militant Atheists)已有了250万活跃会员。各大小教堂都被转化为俗务建筑。圣诞节被禁止，而且买卖圣诞树是刑事犯罪。星期天作为礼拜的日子被消除了，而且工人们被要求轮流倒班，以便工厂能够日以继夜一周七天的持续工作。

斯大林还曾试图奉行恩格斯的建议来拆散家庭。所有马恩的理论，都在约瑟夫·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下，活了。

到1930年，斯大林开始意识到那，他可能把长期受苦人民的忍耐度，压迫得太过头了。因而，他以对大众苦难深切悲楚的表情走向前。他将所有麻烦都归咎于政府官员，在他们的狂热下，曾一直超标并在人民头上强加不合理的要求，尤其对农民们。他曾写下这些，就好像他刚刚听说这笼罩在人

间的可怕苦难。但是，洗刷了自己的罪恶记录后，斯大林然后坚定地开始了恐惧策略，使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骇人。

1932-33年的共产党员危机

到1932年，局势已陷入危机。俄罗斯人民已苦于饥荒，大规模处决，库拉克阶级的残忍清算，对所有私人企业的抑制，西伯利亚的流放和在强迫劳动营地的长期监禁。这些反人类罪的等级，可相较于纳粹随后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所犯的暴行。(Dachau, Buchenwald, and Belsen. 皆为纳粹集中营)

在近代的一本斯大林传记中，巴塞基斯(Nikolaus Basseches)指出那，在1932年间，共产党领导们知道他们将不得不废黜斯大林，或将面对革命。甚至军队都快要造反了。政治局在十二月举办了秘密会议，而且斯大林做出了数个提议来进一步地压制人民，但这一次，即使那些欠他们政治存在于斯大林的人，都断然投票否决他。据报道称斯大林对这展现的反对力量感到如此惊讶，以至于他对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承认那，也许他应该接受溃败并辞职。然而莫洛托夫据说曾鼓励他再坚持久一点，看看情况会不会好转。

美国对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承认在关键时刻到来

莫洛托夫曾是对的。未来环境确实给斯大林的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发生的第一件事，是在1933年一月希特勒上台掌权。希特勒强烈的反共政策，导致很多俄国人认为那，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将可能开战，因而他们开始忘记对斯大林的怨恨，由于对希特勒的忧虑。帮助了斯大林的第二个因素，即世界资本主义的大领导 — 美国 — 对他共产政权的承认。此后因素曾是一独特的发展。

十六年来，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俄罗斯，而在那期间的美国国务卿们十分准确地解释了原因。例如，在1923年国务卿休斯(Charles E. Hughes)宣告道：“人们向俄国人民的诚恳友善，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正是出于这个非常原因，一种强烈愿望就是那不应该做任何事(例如给予承认)，来给俄罗斯被采纳的暴政措施戳上批准印章，或开展任何行动其可能减缓俄罗斯人民逐渐重新树立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多年来诸如此类的声明，通知到了斯大林，那如果美国将承认俄罗斯，其将需要很多共产党员政策和策略的改变。因此，在1933年早期，当斯大林把他的老战友，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送到华盛顿为美国的承认去谈判交涉，他知道条款将必须是怎样的。李维诺夫在书面声明中承诺，那自此之后，苏联将不再试图干涉美国内部事件；他写道苏联将不会允许其官员使用宣传或煽动推翻美国政府，且兼之，他保证那苏联将不会在俄罗斯允许任何用意在煽动推翻美国政府的团体组织。

此刻，看起来好像共产党员将要否认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了。基于俄国政府某官员的这些庄严承诺，在1933年末，外交承认由美国发放给了苏联。就是这样的条件下，引导了美国改变其对共产俄国的政策，从“共同抵抗”(co-resistance)到“共同生存”(co-existence)了。

但仅十个月内，美国官员们就知道了他们国家被骗了。美国第一任驻俄大使布列特(William C Bullitt)，从莫斯科报告称“世界革命”在每个苏维埃官员口中。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为了“共产国

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 推动世界革命的机构)在俄国举办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尽管这违反了李维诺夫诺言的字句与精神。

美国对李维诺夫猛烈抗议，但他仅耸了耸肩膀，并说道苏联绝对没有“对共产国际任何形式的义务”。很明显，俄国国内的情况已发生变化。斯大林再一次对自己的独裁统治感到放心。受到美国承认的威望已达到其目的，而苏联做出的承诺此时已是废纸。

当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美国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被谴责声讨，而且计划是公开倡导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其实，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内看到，在李维诺夫承诺不干涉美国内政的非常时刻，苏维埃情报官员们正忙着在华盛顿各个政府办事处建立缜密的间谍网。

有些政界权威人士认为，当美国发现共产党员领导们明目张胆地违反他们诺言的那一刻，就应该与苏维埃中断外交关系。但这并没有发生。当时的外交战略家主张那，我们对待布尔什维克，就像对待气焰嚣张的大孩子，并忽略他们的小罪过。他们进一步地合理化那，通过维系一名大使在那里，我们至少在俄国将有一个监听站。正是基于这样的推荐那，美国的共存政策又下了一程。我们的外交官决定接受对破碎承诺的麻木宽容，和对共产党员滥用卑怯顺从的羞辱。这大大的增长了斯大林在俄国的政治资本。

斯大林重掌权利

当斯大林看到俄国公众不满情绪的外在迹象正消失时，他感觉到可以再次披上更大胆的外衣了。但在共产党领导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的仇恨在持续溃烂。他们之间暗中承认那，斯大林必须“为了党的利益”被移除。因而，俄罗斯的最高革命家们偷偷摸摸地，结合了他们关于如何最好干掉斯大林的想法。最后，他们决定了最好的计划是，首先摧毁他身边最近亲的人，并之后发动政变。首次打击是针对基洛夫(Sergei Kirov) — 钢铁人的最爱，他已被政治局正式指定为斯大林的继任者。

1934年十二月1日，基洛夫以黑帮形式被枪杀。据称，从未有过什么事比这场谋杀对斯大林的影响更深。他完全清楚他的敌人在做什么，而他因此做出了恶毒有效的反击。名单被公布，其包括了从俄国每个地区选择的共超过1000人，全部被迅速枪决。

然后斯大林指令秘密警察，去扎入党内的每一个曲折裂缝，挖掘并刺探，直到他们找出谁是基洛夫谋杀的幕后主使。这并不困难。甚至很多微不足道的党员都知晓那，参与了此阴谋的一些俄国大人物。为了救他们自己的皮囊，他们很快坦白了。斯大林下令逮捕每一个嫌疑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同事，朋友和甚至只有书信往来的人。

成千上万人在行刑队的秘密处决前倒下，而更显赫的官员则在斯大林著名的清洗审判中，向全世界展览。在这些审判中，斯大林的前革命同志们曾试图为他们的家人赢得怜悯，以最自我贬低的语言承认所有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他们却一无所获。

那些同亲友们被公开声讨的名单，被巴塞基斯描述为涉及了“不仅有党的前领导人。。。且还有足足十二个现任政府成员，还有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参谋长，几乎所有陆军指挥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军官；警察部长和最高警官；外交事务的副人民委员，几乎所有在国外代表苏联的大使大臣，几乎在莫斯科外交部的所有官员；并还有地位崇高的法官们，和联邦共和国的政府成员。”

即使当时在美国的共产间谍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都怀疑在俄罗斯正上演一场可怕的反人类罪。他后来写道：“大清洗其最字面的含义就是屠杀。。。这大屠杀，可能是历史上最大

的精心策划并执行的。。。那些被杀害的，曾被估计有几十万到数百万男女。这个过程耗时约三年，1935-1938。

斯大林创建一个新阶级

该过程最末尾时，到来了行刑者的行刑。自太古时代以来，它就一直是政治土匪和盗贼们的最爱把戏，用一个钦点的死忠追随者小队来执行谋杀，然后再谋杀谋杀者们以掩盖最初的罪行。斯大林遵循了同样的步骤。他选择了一个称为“叶兽夫”(Yeshov)的病态人格，来建立秘密警察机制实施清洗，并然后将某些法官纳入此阴谋。警察和法官们都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悲惨任务，基于假设那他们沐浴在斯大林关怀与信任的照耀下。

只当他们发现自己被甩入肮脏的地牢，或面对行刑队时，他们才意识到那所谓的斯大林的关怀与信任不过是他们自己想象的一碎片。数以百计的秘密警察单位长官，强迫劳动营的头目，和执行清洗的审理法官们，在苏联的每一个地区，都发现自己享有他们受害者的命运。

即使心智失常的“叶兽夫”，曾不仅对斯大林的敌人施加了残忍与暴力，且还这么对他们的妻儿，此时也面临灭绝。他被卷入最后一张恐怖的拖网，并在遗忘中消失，还有那些曾效忠他的。

当斯大林一摆脱政治灾难的边缘，他立即决心要巩固自己的权利，通过创新了一个共产党员宠惯系统。在此之前，共产党领导只承认两个阶级 — 工人和农民。斯大林此时决定给一个新阶级认可 — 共产党员官僚或官僚阶级。他赐予给了他们特殊恩典，允许他们在“封闭”的分销中心购物。这些中心里，曾有着大量从未分配给工人物品。而且斯大林还做出安排，使他的党派钦点人员获得额外恩典 — 住房，奢侈品，特别度假，和给他们孩子的特别教育机会。这就是斯大林的途径，建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其党员绝对效忠于他。

在1936年他提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新宪法中，他也同样地保护了他们。它规定了对“职业财产”(occupational property)的保护。因此，官僚阶级不能被剥夺工资，消费品，房屋及存款。它甚至规定那该“职业财产”可被遗赠。相当殷实的财产能够，因而被官僚阶级积累，并传给某指定的受益人。这些遗产(其被共产党员超过一个世纪宣传强烈抨击)的礼物还可以给非亲属，而且以任何数量毫无限制。

来更进一步地说明斯大林态度的整体转变，他采用了一系列“改革”，其本质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些包括了对存款支付利息，发行附有奖金的债卷，且合法化工资的更大幅差异。一个劳工，例如，可能每个月只收入100卢布，而某官僚阶级成员此时可能收入高达每月6000卢布！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关于俄罗斯发展的一简单事实。昨天“不能有的”已占据了皇土。他们的政策也同样的简单：永久掌权并享受他们征服的战利品。

到1938年，斯大林对他的地位信心爆棚。他宣布此政权在俄罗斯境内没有敌人了，而且也将不再需要恐怖主义和压迫了。然而他明确指出，那将必须有共产党员海外方案不偏移的继续执行，而且那针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怖主义行径，应被接受为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此时在树立她自己为一世界大国。斯大林在明显表露着决心要进入他独裁统治的下一个阶段 — 扩张世界共产主义。

第七章

共产主义在美国

至此我们已追溯俄罗斯共产主义历史到1938年。有必要来理解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才能赏识1938年之后发生的事。

多年来，马派(Marxists)武力征服美国，曾一直是共产党员领导们计划的一重要部分：“首先我们将占领东欧；然后是亚洲的群体。之后我们将包围美国，这将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堡垒。我们将无需攻打；其将像一颗熟透的果实落入我们手中。”这明显反映了马派想通过“内部颠覆”(internal subversion)来推翻美国的意图。

我们有时很难意识到，那共产党员领导们常对他们在美国的计划进展，有多么的热情积极。回答以下问题将表明为什么：

拥护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是否忽视了“朝圣先辈”(Pilgrim Fathers)的严厉警告？为什么“朝圣先辈”被描述为，曾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践过共产主义？结果如何？

俄国革命后多久，开始在美国开展共产主义？第一波共产党员暴力有多广泛？

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关于在美国共产党员革命，宣誓下的证词是什么？

为什么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能够提供关于在美国共产主义如此多的细节？在1932年六月，钱伯斯被要求付出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代价 — 那是什么？钱伯斯的年幼女儿如何影响他摒弃共产主义的？

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的背景是什么？她怎么就成为了一个，某不曾相识的党员妻子？

被俄罗斯雇佣为间谍的共产党员，是如何成功洗脱罪名的？

执行苏维埃领导命令，承担监禁与耻辱的风险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高层政府雇员名单，在被俄罗斯共产党员领导们审查后，你期待领导的反应是什么？

创建美国的先辈们尝试共产主义

美国历史中被遗忘的教训之一，即此事实，那在他们尝试资本主义自由企业之前，创建美国的先父们曾尝试过共产主义。

在1620年间，当“朝圣先辈”(Pilgrim Fathers 乘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教会的清教徒们)登陆在普利茅斯(Plymouth 在美国麻省，以最后英国出发同名港口命名)时，他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共产式的属地(colony 别译殖民地)。在很多方面，这个集体社会曾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被建立。首先，他们与世隔绝，因而有急迫的动力使计划成功，才能够生存。第二，他们曾有特选的一群善男信女，他们都乐于合作，相互之间像兄弟般友爱。朝圣者们怀着最高的期望发动了他们的共产式社区。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总督对发生了什么，给我们留下了精彩诉说。总督报告称：

“这个社区。。。被发现在孳息大量的迷乱与不满，并且阻碍了很多本来可能对他们有利且舒适的雇佣就业。大部分身强体壮能干活劳动的年轻人，确实抱怨对他们应无偿为其他人的老婆孩子工作。强壮的人。。。所分到的食物和衣服并不多于，体弱的做不了其他人工作四分之一的人；这被认为是不正义的。。。至于命令别人老婆为别的男人做工，例如洗衣做饭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制，很多丈夫也很难容忍之。”（注意，即使在基督教兄弟会中，不建立独裁专政，共产主义就不能被实践。）

但属地者们还将会继续忍受共产主义，如果它曾是有生产力的。令布拉福德总督担心的，是那事实，即这种集体安排下的生产总量如此之低，以至于属地者们在面临挨饿。因此，他讲道：

“终于，在详细地辩论后。。。总督做出让步，那他们应让每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播撒种子，并在那方面信任他们自己。。并从之根据每个家庭里几口人，分派给每他们一块地。”

当每个家庭拿到土地和种子后，他们不得不撒种，耕耘并收割之，要不然就要承受其后果。总督希望人们继续生活在一起，像朋友们的社会，但集体生产，将被私人的自由企业生产所替代。一年之后，总督能够讲：

“这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功；因为这令每一双手都非常勤劳，以至于所种植的玉米远超于如果不这么做的可能。如今妇女们都情愿下地，并带着她们的小孩一起播种，这在之前会被指控为软弱无力；任何勒令强迫的会被当成是大暴君与压迫。”

“朝圣先辈”曾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大秘密，即某人强迫自己走下的路，远比任何他允许被别人强迫走下的路，要远多得多。当布拉福德总督回想起他们对生活在共产化社会做出的努力时，他写下此结论：

“在这共同起因与条件下所经历的，在迥乎不同的年代被尝试过，并且在那虔诚与清醒的人们之中，就好像展现了柏拉图与其他古人傲慢空想的虚荣 — 后期被某些人赞好 — 那剥夺财产，并将其带入某共同财富/共荣，将令他们幸福且昌旺；好像他们比上帝还聪明。”

其变得显而易见那，布拉福德总督总结道共产主义不仅是效率低下的，而且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混乱上帝法则的。在一些听说过共产主义可提供最理想的方法来实践基督教基本原则的读者心中，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已考虑了此问题的历史背景。

有意思的是那，在“朝圣先辈”尝试共产主义之后，他们摒弃它，转而采用自由企业型资本主义，其经过数世纪，已经变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高度发达。在最初阶段，这个系统被描述为无情自私的制度，但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那在一个缓慢痛苦的进化过程后，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工具，其至今为止，比任何现代人尝试过的系统，生产出了更多的财富并在这片土地上人民之间分配的更平均。更进一步地改善并适应资本主义，以应对高度工业化社会需求的进化过程，仍在继续中。

马克思主义来到美国

当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在俄国发生时，它一直特别关心着某特定团体的美国人。这就是美国社会党的左翼阵营。多年来，社会党人一直在试图促使“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接管所有主要工业并使国家社会化，但这和平立法改革的尝试失败了。然后在1917年十一月，突然之间，这些人听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已利用革命暴力夺权，并因此一夜之间社会化了他们的国家。

这被社会党左翼麻利儿的接受为美国的配方。他们立即决定组建共产党，并使用暴力革命活动来在最早可能的日子，苏维埃化美国。在这铤而走险中，一位名为约翰·里德(John Reed)的记者给予了他们极大鼓励 — 他最近才从俄罗斯回来，带着对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闪亮的热情/炽热的激情。

这群人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在1919年三月，应邀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来帮助组建“第三国际”(复制于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来促进世界革命)。当他们返回家乡后就开始了他们的征战/战役。约翰·里德使用《纽约共产党员》的专栏，来煽动工人造反。共产党员的队伍充满了老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简称“世界产联”的工会)成员，他们都站在新运动一边，并建议党员学会使用曾在一战期间运用过的，破坏与暴力的技巧手法。

当俄罗斯共产党派遣了苏维埃政府官方代表，来帮助组织一个羽翼丰满的布尔什维克方案时，该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地鼓励。他的名字叫马滕斯(C.A. Martens)。他带了相当可观量的资金，来花费在美国的工会与军队内部建立人脉。共产党员光拯救了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还不够；马滕斯同志确保了所有听他讲话的人都知道，那他从莫斯科来的任务就是要解放在资本主义美国被碾压的工人们。随着运动的进展，美国代表被派往俄罗斯，以获准成立“美国共产劳动党”作为俄罗斯赞助的“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组织)的一个分部。后来，“劳动”这个词被拿掉。

新共产党的长官们签署了《二十一项入党条件》(“Twenty-one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其在多年后很让他们丢人，在1952年当该党被命令注册为被苏联控制的机构。

以下是《二十一项入党条件》中的典型承诺。

“(美国)共产党必须进行一个明确干脆的宣传方案，以阻挠战争军需品被运送给苏联的敌人。”

“(美国共产党的)方案计划必须被“共产国际”定期的代表大会认可。”

“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对一切附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包括美国共产党)都具有约束力。”

“传播共产思想的职责，包括该特殊义务，即在军队中进行强力的系统性宣传。如果这煽动被特别法令禁止，它应被非法进行。”

“每个希望附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系统地并执着地在工会内发展共产党员煽动。”

正是像这些的基本承诺，其令“美国颠覆活动控制理事会”(US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在经过长时间听证后，做出如下声明：

“我们从整个记录中发现，那证据充分确立被访者的领导们(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以及其成员，认为他们效忠美国次要于对苏联的忠诚与义务。”

第一波共产党员暴力轰击美国

从1919年四月28日起，一连串36个炸弹被发现在寄给如下人士的邮包里，总检察官(司法部长)，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Justice Holmes)，摩根大通(JP Morgan 金融财团)，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当时美国首富)，和类似的显赫人物。其中的一颗炸弹落网到了参议员哈德威克(Senator Hardwick)家中，他曾一直试图关闭布尔什维克到美国的移民。一位佣人打开了包裹，炸弹爆炸，炸掉了她的双手。

在1920年九月16日，很大的一枚炸弹被马车拉到了纽约市华尔街(Wall Street)和百老街(Broad Street)的拐角 — 美国资本主义的漩涡眼。马车被停到一栋朴实的石灰岩三层楼建筑前，里面是摩根大通公司。

突然，马车上爆出了一声巨吼，并随着蓝白的火焰冲天。炸弹威力巨大，直接造成三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它摧毁了摩根办公室的内部，震碎了方圆数个街区的窗户，并把一块铁疙瘩炸穿了公平大厦(Equitable Building 曼哈顿一高层建筑)34层楼的窗户。

这些谋杀与暴力行径在美国各地激起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愤慨。个别情况，被激怒的公民以暴制暴。总检察官下令逮捕多人，并最后在“布福德”(SS Buford)号轮船上，驱逐了一整船的布尔什维克外来者和共产党员领导们，途径芬兰到俄罗斯。臭名昭著的艾玛·高德曼(Emma Goldman)乘在船上，她二十五年前的无政府主义演讲，曾诱导了里昂·乔戈什(Leon Czolgosz)去刺杀麦金莱总统(President McKinley)。她一点也不晓得那，仅二十四个月后，她不仅将否定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而到了1940年她的遗愿是能死在美国。

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发动共产党员工会驱动

对当今的美国公众，没几个共产党员领导更有名于威廉·福斯特。他是党在美国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党指定要接管美国工会的人。大部分活动的经费来自莫斯科，当“赤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 - 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曾从苏维埃政府接受了100万美元，以帮助在其他国家的工会里散布共产主义。

停战后不久，福斯特的驱动到达了劳工前线，当时工人们由于战时条件已经处于激动状态。福斯特毫不费力地在几个重要产业点燃罢工，而且甚至某个与他毫无关系的罢工，常常功劳也记给他。结果，很多人开始把他们支持劳工的同情认定为共产主义，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煤矿工人们据信是受到福斯特的影响，当他们踊跃地投票赞成国有化煤矿产业，而且类似的标签也似乎附加在钢铁罢工上，因为福斯特被明显证明是该罢工的煽动者与推动者。很多人都知道那，煤矿与钢铁工人们都有很多罢工的正当理由，而对他们，那福斯特和他的共产党员同伙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蠕动进这工人运动的事实，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福斯特从未真正隐藏过他根本的野心要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并使美国劳工们(以及每一位其他美国人)都从属于复制俄罗斯型的共产党员独裁统治。事实上，福斯特先生预见他自己为那将降临的独裁者。他曾两次是共产党员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还写了一本书名为《走向苏维埃美国》("Toward Soviet America")，就讲了共产党员将如何夺权。

当一个国会委员会将他置于誓词之下，并提问他关于共产主义时，他曾畅谈且坦率：

主席：“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员是否提倡世界革命？”

福斯特先生：“是的。”

主席：“他们(共产党员)在这个国家提倡革命吗？”

福斯特先生：“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员提倡废除这个国家，和每个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系统。。。 ”

主席：“那，这国的共产党员反对我们的共和制政府吗？”

福斯特先生：“资本主义民主制 — 非常肯定。”

主席：“你主张的是改变我们的共和制政府，并取代为苏维埃式的政府？”

福斯特先生：“我已经讲过那很多次了。”

主席：“那，如果我理解你没错，这个国家的工人视苏联为他们的国家；是对的吗？”

福斯特先生：“更进步的工人是的。”

主席：“他们视苏联旗帜为他们的旗帜吗？”

福斯特先生：“这个国家的工人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都只有一面旗帜，那就是红旗。”

主席：“。。。如果他们不得不在红旗和美国国旗之间做出选择，我从你那里得知那，你将选择那红旗，对吗？”

福斯特先生：“我已讲出我的答案。”

主席：“我不想强迫你回答，如果让你尴尬，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这一点都不让我尴尬。我讲得很清楚那，红旗是革命阶级的旗帜，而我们是革命阶级的一部分。”

从1921到1924年，共产党员为了避免逮捕而转入地下行动，但当战时紧急法被废除时，共产党员领导们又逐渐浮出水面，并继续他们要推翻美国政府革命的征战。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家的普遍心理并不是特别的有安全意识。那是一个流行的(fad 全意是流行一阵就很快消失)，轻浮的和普遍战后疯狂的时代。国家场景整体都太繁荣与沉醉，去担心几个想统治世界的盲从狂热分子。某非此即彼的原因，“共产党员”这个词开始有种遥远风味，而且人们笑谈前几年的扔炸弹，罢工，逮捕和驱逐是“红色大惊恐”(the great Red scare)的日子。

然而，未来共产党员征服的一片肥沃土地正在最不怕它的人们中被开发。美国在一种夹生的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中变得老道。过去的基座被丑闻的嚎吼与柜子里骷髅(暗喻秘密)的嘎嘎声压塌。大胆揭幕的时代已到来。在当时，很少人意识到这国家正漂流向的经济与精神坍塌，将导致知识造反，那将允许共产主义间谍推动他们渗入美国社会的每一个梯队 — 包括一些美国政府的最高职位。这带我们到了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故事。因为钱伯斯是在这期间被改造成共产党员，并爬到了最高级别的机密，成为了俄罗斯间谍活动的一领导，他的解密给了在1925-1938年，共产主义在美国成长的鸟瞰全景图。

惠特克·钱伯斯所见的美国共产主义增长

简短回顾钱伯斯向共产主义的转化过程，也许会揭示一种进化演变模式，其在一九二〇年代与三〇年代早期，被相当数量的年轻美国知识分子所追随/遵循/效仿。

钱伯斯在离纽约郊区不远的长岛(Long Island)长大。在钱伯斯家里，有一个冷漠没有人情味的父亲(某报纸插画师)，一个过度溺爱因而专横霸道的母亲(曾是一名女演员)，一个发疯的祖母和一个弟弟，钱伯斯对他感觉不到特别的兄弟情谊。

钱伯斯和他弟弟都在忙碌的战后时期走向成熟，并且像他们时代的很多人，二人都成为了道德与精神的伤兵。钱伯斯的弟弟从大学回来变得愤世嫉俗且幻灭。他变成了一个酒鬼，并最后自杀了。全家都似乎已退化到一种生活模式，恰是马恩曾宣称的毫无目的的烂泥/杂烩。钱伯斯描述他自己的经历如下：

“当我在一战后不久进入大学时，我的人生与政治观点属保守派，而且我还在经历着一场宗教体验。当我离校时，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再是保守派，而且没有了宗教。我已在一个校园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神论者短剧。。。同年，我去了欧洲，并看到了德国战败的狂躁剧痛。我返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我自己掏的路费。在1925年，我自愿退学，目的是快速加入共产党。因为我已开始认为那，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死亡，那只有外科手术如今可以拯救人类的残骸，而那共产党就是历史的外科医生。”

钱伯斯孜孜不倦地去为共产主义工作。他当了《纺织工人》(“The Textile Worker”)的共同编辑，给《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代笔，娶了一个共产党员“妻子”，还学会了工会暴力的罢工技巧。在这期间他写道，“我首次知道了共产党在某些罢工中雇佣了黑帮来打击皮草老板。。。我首次知道了共产党工会成员如何会带领他们自己的一群罢工者，闯进不罢工的商店并在顷刻之间，用他们锋利带钩的皮草刀把价值数千美元的貂皮，砍成碎片。”

他的打算是让共产党员方案成为他生命的永久模式。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共产党员“妻子”离开了他去走她自己的路，而钱伯斯则感觉他更喜欢下次结婚时(1931)是在某市政厅的正式“资产阶级婚姻”。在这一阶段，钱伯斯还绝不会猜到那，他还有着其他的感性，有一天其将带他离开共产主义，并当《时代》杂志年薪约\$30,000的高级编辑！

在1928年，钱伯斯看到了美国共产党的第一波清洗。数年来，党曾一直被称为“美国列宁”的查尔斯·鲁滕堡(Charles E Ruthenburg)所主宰。当鲁滕堡突然过世时，出现了疯狂的权利抢夺。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问鼎，但福斯特代表了一个吵闹的少数派。但很快洛夫斯通犯了一个严重政治错误。他支持了斯大林在俄罗斯最强大的对手之一。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他代表的方案比斯大林想的少点暴力。

洛夫斯通和福斯特被传唤到莫斯科。当他们返回时，洛夫斯通是个破碎的人。他被斯大林称为叛徒，并被踢出党。斯大林命名福斯特为王位继承人。下一步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党员来支持福斯特的激进方案，或被开除。大部分共产党员看懂了莫斯科来的新信号，并立即向福斯特效忠。而钱伯斯则不如此。在他看来似乎，斯大林的行为像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强迫大多数美国共产党员去追随他们已经投票反对过的领导人。钱伯斯不再活跃于党内。

两年中，出于他自己的选择，钱伯斯保持在常规队伍的圈外。他从未被开除，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也没改变，但他对斯大林深感不满/有很深怨恨。然而，整个局势被“大萧条”(1929-33年发生的经济大衰退)改变了。钱伯斯对失业者的同情，又一次拉他回到了党的方案。他还感到迫于承认那，从所有表面现象看，那早已预料到的美国资本主义坍塌已到来。

在那时代的精神下，钱伯斯写了一段故事，称为《你能听见说话声吗》(“Can You Hear the Voices?”)它是个巨大成功。被制作成了话剧，以小册子出版，并被莫斯科宣扬为精彩的革命文学。接下来，钱伯斯被美国共产党宴请招待，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钱伯斯很快就回来为革命工作了。

那是在1932年六月，钱伯斯被要求付出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代价。党提名他被“苏维埃军事情报处”(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雇佣，当针对美国的间谍。为了他妻子，钱伯斯试图摆脱这差事，但一个在纽约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告诉他，“你没有选择/你别无选择。”

钱伯斯很快发现自己处于俄罗斯间谍器械的铁律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已成为他的信仰，钱伯斯盲目地遵循指令。他成了阴谋诡计的专家，例如秘密会议，书写秘密文件，甩掉跟踪者，不相信任何人，并且日夜随时待命上级指令。

不久后，钱伯斯被调遣至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最重要俄罗斯间谍小组的主联系人。钱伯斯已描述了他和以下人员的间谍联络，他们后来都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一。希思(Alger Hiss)，钱伯斯说他们成为了亲密朋友。希思最开始在农业部，然后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军火业。有一段时间他在司法部任职，之后去了国务院。在那里他流星速升官，担任了高度重要的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他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担任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而且担任“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Assembly)的总秘书长，其后创建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

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还是《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的作者。

三。阿卜特(John J. Abt)，曾任职于农业部，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之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特别助理，负责审判。

四。柯林斯(Henry H Collins)，曾任职于美国步枪协会(NRA)，农业部，劳工部和国务院。二战期间，他成为了陆军少校，并在1948年成为了“美国俄罗斯文化关系研究所”(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总检察官曾引用该组织幕后是共产党)的执行主任。

五。克莱默(Charles Kramer)，曾就职于国家劳工关系管理办，价格管理行政办，并在1943年，作为幕僚加入了战争动员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

六。维特(Nathan Witt)，曾就职于农业部，然后成为了国家劳工关系管理办的秘书。

七。威尔(Harold Ware)，曾就职于农业部。

八。佩罗(Victor Perlo)，曾就职于价格管理行政办，战争生产办，和财务部。

九。瓦德利(Henry Julian Wadleigh)，后成为财务部的显赫官员。

钱伯斯作证说那通过他的联系人，收到了如此多的机密政府文件，以至于需要两名，甚至有时三名摄影师，将材料制作成微缩胶卷，并持续流向俄罗斯。钱伯斯说他认为希思是他的头号信息来源。他描述了希思如何会每晚带回家一整公文包的国务院材料。其中一些会被微缩胶卷。其余的则会被希思在他的打字机上做复制，或者他会手写做出总结。正是一部分这些打印的文件和备忘录上被认定是希思的笔迹，其后成为著名的“南瓜文件”(Pumpkin Papers)，其结果定希思有伪证罪(perjury)。

很多年后，当钱伯斯被请求给出他的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人，被蒙蔽愚弄而犯下对他们本国的颠覆行为，他解释道那，一旦某人被转化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会认为特务活动是有德行为 — 一种责任 — 以人类美好未来社会的名义而犯罪。

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很多美国人参与了俄罗斯指导的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这难以置信的事件直到最近才被普遍承认。如今已经完成了很多全面的书籍，其总结了联邦调查局(FBI)，法院和国会出土的证据。

惠特克·钱伯斯与共产主义决裂

在1938年，钱伯斯处于他职业生涯的非常高峰，担任俄罗斯的信使和联络员，钱伯斯发觉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坍塌。那是一天早上，当给他小女儿喂饭时，那钱伯斯突然意识到那，他看着她那柔弱却非常复杂的人类身体和性格，不可能够仅按照“小事件的累积”被解释。从那刻起，钱伯斯定下来要与共产主义决裂。

起初，他心烦意乱，并试着从脑海中投掷出这新的信念，但当他打开了他的思维，看着他身边的证据，他终于变得完全被说服那，他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瑕精彩设计的宇宙中，其从属于更高智慧的创造监督。于是，正如共产党员哲学把他带入运动，它的坍塌令他决心退出。那要很多个月之后，他才终于摆脱束缚，并逃离了“苏维埃情报局”(Soviet Intelligence Service)。

钱伯斯说那，当他最终与共产主义决裂时，他竭尽所能劝他的亲密朋友，希思，和他一起离开。然而，希思不仅拒绝了，而且据钱伯斯称被激切地谴责，因为尝试影响他。

从观察别人的命运，钱伯斯已略知一二关于试图离开共产主义的阴谋器械意味着什么。尽管这样，他走过的道路带来的身体与精神痛苦，甚至他也没预料到。

如今，再完整不过地诉说那些，敢戴前共产党员徽章人的惨痛经历，可以在钱伯斯的自传《见证》("Witness")中找到。有一度，他工作时随身带枪，因为担心俄罗斯秘密警察会取他性命，就像他们对很多人做的一样。另一度，他试图自杀，以保护他以前最亲密的朋友们不被暴露。

大部分这些细节，只能在其完整上下文才能被体味。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很充分地指出那，直到钱伯斯终于下定决心讲出整个故事那一刻，美国公众几乎毫不知情，那俄罗斯已在各个美国社会阶层，建立了庞大的间谍活动网络。而且这不幸的状况持续存在，尽管联邦调查局多年来曾一直在仔细收集事实，并警告政府官员关于共产党员活动。

最后，一乌云的证人确认了那是真的。

钱伯斯离开后 伊丽莎白·本特利接任

钱伯斯无法预知那，在他叛离俄罗斯间谍系统后，苏联人会用一个女人取代他。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

她来自一长线的美国新英格兰州祖先们。她曾就读于瓦萨学院(Vassar)，在意大利游学一年，并在1934年返回美国，发现国家深陷经济衰退中。没能找到工作，她决定她唯一的机会是去学个商务课程，所以她报名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 at Columbia University)。在那她结识了数位对她友好且同情的人。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她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共产党员。当这些朋友们向她解释了共产主义，对她似乎很有道理 — 其实，按他们解释的方式，共产主义将高度优越于美国资本主义(其在当时失业与破产停滞的像块冰山)。所以本特利成为了共产党员。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突然相信那，历史的新篇章将被打开其将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劲头，她加入了征战。

有段时间，本特利在纽约的福利部(Welfare Department)工作，这期间她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共产党员小组的财务秘书。她曾就读于共产党员工人学校，并加入了很多不同名字羊头狗肉的组织，那至少在一个场合，她前往了一个会议，然后怎么也记不起来她应该是谁！

没多久，本特利的活动受到了俄罗斯地下组织领导的器重，然后她都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谨慎地从美国共产党的日常任务，转移到了苏联间谍的地下网络。

她先给三个不同的人工作，然后被分派到一位劳累过度，老一辈的革命家，叫提米(Timmy)。伊丽莎白·本特利爱上了提米。

有一天他对她讲：“你我没有权利对彼此有这样的感受。。。只有一种出路，那就是在一起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将不得不完全信任我，却不知道我是谁，我住在哪，或我做什么谋生。”

这就是本特利如何成为了某共产党员妻子的方式。此男子后被证明是雅各布·戈洛斯(Jacob Golos)，在美国的俄罗斯秘密警察大权在握的长官之一。

在他的训练下，本特利变成了她后来称之为“钢铁布尔什维克”。

在1940年五月，她阅读到莱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暗杀未遂。企图失败了，但他的私人保镖被绑架了，并被从背后枪杀。多年来，斯大林曾一直在试图清算他的宿敌，并从戈洛斯的行为方式，本特利知道了她的共产党员情侣在这密谋中。几个月后，一个杀手竟然接近到托洛茨基，并用一根登山杖砸碎了他的头颅。

从1941年开始，本特利被俄罗斯间谍组织用来从华盛顿特区联络人收集情报。她说她最初成为“西弗马斯特”(Silvermaster 原意银主)间谍网的信使，其是在五角大楼和其他最高机密政府办事处的共产党员联络人提取的信息。在她收工之前，已捡撮了几乎所有惠特克·钱伯斯之前的联络人，和更多。

偶尔会接近灾难，正如格革里·西弗马斯特(Gregory Silvermaster)的案例，当他通过柯里(Lauchlin Currie 白宫行政助理)的影响就职于经济福利办时。她说，在他就职后，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是从陆军情报长官寄给他上司的，表明那FBI和海军情报有他和共产党员的联系的证据。该信件要求西弗马斯特被解雇。

惊慌的西弗马斯特询问本特利怎么办。她给了他和给其他被暴露共产党员一样的指令：“站稳脚跟，假装受伤的无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只是个“左倾的/进步的”人，你的履历证明你曾一直为劳工权利而战斗。召集你所有“自由开放派”朋友到身边。。。如果有必要，雇佣一个律师以你的名誉严重受损为理由，为你的案件辩护。同时，动用身边所有的人脉把这件事摆平。用柯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财务部高级官员)，任何你认识并信任的人。”

任何熟悉那些被招呼到国会调查委员会前共产党员嫌疑人的辩护格式，会立刻认出那被本特利推荐的党的招牌动作，老套假装受到虐待的无辜。当考虑它相对的天真与孩童般的简单，那几乎导致全国上下的恼怒，那它在费解数目的年份里，迷乱并欺骗了惊人量的人们。至于几乎所有其他本特利的建议，都给西弗马斯特了可观回报，而且他很快从许多有权势且意外的来源处获得了支持。

经过三个月的“反击”，战争副部长听到多个恳求后变得坚信，那西弗马斯特被冤枉了，并因而命令他的解雇被取消。西弗马斯特被允许辞职，并以清白身份返回他在农业部的老职务。本特利总结道：“那一定回荡在整个俄罗斯秘密警察器械内的如释重负后，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常规事务。”

根据本特利的宣誓证词，她曾为三个主要间谍小组工作。第一个是“威尔小组”(Ware Cell) — 曾经钱伯斯处理的那群人。此外，她还处理“西弗马斯特小组”(Silvermaster Cell)和“佩罗小组”(Perlo Cell)。她讲道这三个小组负责供给她几乎无休止的信息流，以传送到莫斯科。她在誓词下证实“西弗马斯特小组”和“佩罗小组”对成员如下(与她联系过的成员当时的工作部门也被列出)：

西弗马斯特小组

- 一。西弗马斯特(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曾担任农场安全管理局劳工部的主任；并在一段时间内在经济福利办任职。
- 二。阿德勒(Solomon Adler)担任财务部驻华代理。
- 三。伯斯勒(Norman Bursler)在司法部担任特别助理。
- 四。柯鄂(Frank Coe)曾在财务部的货币研究所担任助理主任；美国驻伦敦大使特别助理；经济福利办执行主任助理；对外经济管理局担任助理管理员。
- 五。高德(William Gold 别称Bela Gold)，曾担任农业部，农业经济局，方案调查部门的助理部长；战争动员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外经济管理局的经济方案办公室。
- 六。高德夫人(Sonia Gold)，担任州际移民房屋选择委员会的助理研究员；就业安全局的劳工市场分析师；财务部的货币研究所。
- 七。西弗曼(Abraham George Silverman)，曾担任美国铁路退休办，的研究与信息服务局主任；空军物资与服务助理参谋长的，经济顾问与计划分析师。
- 八。泰勒(William Taylor)就职于财务部。
- 九。乌尔曼(William Ludwig Ullman)曾就职于财务部的货币研究所；五角大楼空军总部，物资与服务部门。

佩罗小组

- 一。佩罗(Victor Perlo 也曾联系于威尔小组)，曾担任物价管理办公室，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就任于战争生产办，处理关于军用飞机生产的问题。
- 二。菲茨杰拉德(Edward J Fitzgerald)曾就职于战争生产办。
- 三。戈拉瑟(Harold Glasser)曾就职于财务部，借出给厄瓜多尔政府；借出给战争生产办；曾担任在北非阿尔及尔(Algiers)的，北非事务委员会顾问。
- 四。克莱默(Charles Kramer 也与威尔小组有联系)，曾就职于国家劳工关系办；价格管理办；战争动员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经济家。
- 五。莱辛斯基(Solomon Leshinsky)，曾就职于美国救援重建管理办。
- 六。马戈多夫(Harry Magdoff)，曾就职于战争生产办和应急管理办的统计部门；战争生产办的统计研究局和工具部门，和内外贸易局。
- 七。罗森伯格(Allan Rosenberg)，曾就职于对外经济管理办。
- 八。惠勒(Donald Niven Wheeler)，曾就职于战略服务办。

此外，本特利给出了以下个人的名字，他们配合从政府文件中获取信息，尽管他们没有隶属任何特定小组：

- 一。格林堡(Michael Greenburg) — 经济福利办；对外经济管理办，中华专家。
- 二。戈莱格(Joseph Gregg) — 美洲事务协调员，研究部门助理。
- 三。哈普林(Maurice Halperin) — 战略服务办；研究分析部门的拉丁美洲处处长；国务院拉丁美洲研究与分析负责人。
- 四。约瑟夫(J Julius Joseph) — 战略服务办，日本处。
- 五。李(Duncan Chaplin Lee) — 战略服务办；唐诺文将军(General William J Donovan)的法律顾问。
- 六。米勒(Robert T Miller) — 美洲事务协调员，政治研究负责人；国务院，近东事务，信息服务委员会成员；国务院，研究出版处，助理负责人。
- 七。帕克(William Z Park) — 美洲事务协调员。
- 八。雷蒙德(Bernard Redmond) — 美洲事务协调员。
- 九。滕纳(Helen Tenney) — 战略服务办，西班牙处。

给出这些名单，是为了显示那惊人的与具有毁灭性的信息管道，其本特利称是在她国家首都当俄罗斯秘密警察的金主与信使期间，苏维埃地下组织在华盛顿植入的。

本特利坚持不懈地为苏联工作到1944年。然而在1943年她受到了极大震惊，当戈洛斯(Jacob Golos)在感恩节前夕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亡。就在他临死前，戈洛斯向她揭露了他苏联上级的残酷无情，他们毫不客气地驱使他，并强迫他从事的活动，即使像他这样的强硬革命感和长茧的良知，都感到恶心作呕。

戈洛斯死后，本特利更进一步地幻灭，当她得知那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已同意将一群在华盛顿的美国共产党员，交给最无耻的一组苏联间谍特工。当她质问白劳德时，据称他这么告诉她：“别天真了。你知道当牌发出来，我必须执行他们的命令。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件事上转移他们注意，但没成功。”

“但戈莱格是你的老朋友，”本特利说道(指一组员)。“那又怎样？”白劳德回道。“他是可牺牲的。”不久之后，一位来自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官员来访问她，她惊讶地得知被授予苏联最高奖章 — 红星勋章(Order of the Red Star)。但她一点也没有被这提供的荣誉所打动，因为她对苏联官员被证实的那种人感到恶心厌恨。自那一刻起，他感觉到那俄罗斯的共产党员领导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伟大新世界的 — 无论她送给他们多少信息。

她唯心论(idealism)的最后一击来到，当苏联人试图强迫她交给他们一女友，想要她给高级政府官员做不道德的表演。

一夜，独自一人，本特利质问她自己，“我们所有人起初那么英勇地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后怎么了？”她最终能够在内心深处承认发生了什么。“我们被历史上最残忍无情的机器腐败且击碎了。”

很多个星期后，本特利终于走进了FBI，准备好竭尽全力为她的本国做出改过。

在某些方面，这同时是一个胜利与一个悲剧。对她，个人，这是个胜利。这是她需要的机会，来在她的良知和她的国家之间摆正自己。然而，在1948年，当她在国会委员会前给她的宣誓证词时，这被迫成为悲剧。共产党员报刊被很多所谓的“自由开放”派系加入，指控她是退化腐朽的，神经病骗子到精神错乱的受害者。花了很多证人的时间和相互确认的证词，才最终制止了这叫嚣。

本特利和钱伯斯都做出证词，那他们俩都是很一小部分但是极端危险美国人的典型成员，通过被误导的意识形态，在一战到二战末尾期间，膨胀了共产主义的队伍。绝大多数经历了相同的演变进化 — 最初，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换，随着采取行动的意愿；其次，暴露到共产主义在实际行动中的硬核现实；和最后，一个觉醒，随着一个动态的决心去抛弃幻想，并从外部与其抗争。

对美国幸运的是，也对从事共产党员事业的其公民，是这些往昔的党员通常会返回到美国方式的生活，比他们离开时更忠于其原则。只有极少数仍还拒绝对所有已揭示的，打开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这无人认领的群体，仍然在昼夜不停的为“事业”而奉献奋斗。

第八章

共产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共产党员的间谍管道在美国被完善时，类似的颠覆网络正被建立在遍布全世界的地点。很快斯大林收取到的所有主要国家的国务秘密如此之多，以至那他能够玩弄全世界的权利政治游戏，像一个职业赌徒坐在赌桌前，看着其他玩家手上透明的牌，仔细地计划着他的战略。

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正是从这极满意的政治全知地位，斯大林启动了一系列诡计，促成二战中有它们的份。叛逃的俄罗斯情报官员已透露那，二战被俄罗斯领袖们挑起并利用为，扩张“世界共产主义”长期战略的一重要部分。本章将回答以下问题：

如何解释斯大林在1933年试图与希特勒达成秘密合约？

斯大林为什么宣称他对发起二战有功劳？

为什么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的协议，令遍布全世界的共产党员感到惊讶？

当希特勒撕毁协议并攻击俄罗斯时，斯大林是否措手不及？

在纳粹入侵俄罗斯的前几个月，美国的态度如何？什么改变了那态度？

从这在1942年某总统顾问的声明中，你做何推论：“未出生的一代人将欠他们自由的很大一部分，于苏联人民不可被征服的力量”？盟军领袖们看起来有没有对共产党员战略的基本理解？

共产党员领导们如何利用“租借法案”(Lend-Lease)，来获取原子弹的秘密？

美国与共产主义的“共存”什么时候开始？列出其经历的四个恶化步骤。基于什么样的假设，俄罗斯成为了美国塑造战后世界的全面伙伴？

你如何解释此事实那，《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遵循1936年的俄罗斯宪法，而不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格式？你感觉该组织起草宪章的总秘书长是希思(Alger Hiss)的事实，有否任何重要意义？

当共产党领导人在二战后涌现为地球上第二大政治力量时，他们态度如何？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与德国的纳粹主义

曾被说过那，共产主义对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纳粹党的崛起负有重大责任。记得当德国皇帝(Kaiser)在1918年投降时，共产党员试图接管德国。反共政治团体立即兴起，并惊慌地联盟阻止了共产党员夺权。正是在这反共的环境气氛中，那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加入了拥有强大反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国家社会(纳粹)党”，并在1921年他成为了党魁。

希特勒组织了他臭名昭著的“纳粹突击队”(Nazi Storm Troopers 褐色军装)，来针对共产党员暴力的蔓延做出反击。他把他的“褐衫队”训练成巷战与暴动的能手，并以直接人身攻击的方式镇压政治对手。到1923年，突击队达一万人，而且希特勒感觉到足够强壮来试图接管德国巴伐利亚省(Bavaria)。但这场起义失败了。希特勒被扔进监狱，并在那里开始表达他被挫败的野心，发烧地手写关于“全面战争”，后被称为《我的奋斗》(“Mein Kampf”)。在这本书里，希特勒揭示了那，他不仅非常的反共，而且他代表了彻底地违反《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他说，他将为完全复兴德国成为世界强权而奋斗。他在计划着创建一个伟大的北欧帝国，怀抱在欧洲所有德国血统的

人，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居住。《我的奋斗》对每一个德国的邻国构成了威胁。它还包括了针对俄罗斯的威胁，因为希特勒曾宣称那德国人扩张的自然进程，将最终把纳粹征程带进乌克兰肥沃的农业地区，然后进入俄罗斯丰富的油田。

后来，当斯大林看到希特勒用棍棒推撞开路夺取权利，他认出纳粹独裁者是与同种同类的强大对手。他看到那希特勒是狡猾并残忍的。他完全没有道德。针对暴力，清洗他自己的人民，在宣传中使用骗术，或牺牲数百万人命来实现个人权利，他没有过任何内疚。唯物主义在德国制造了与在俄罗斯准确一致的产物。尽管被不同的名字称呼，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并曾在非常类似的意识形态模具中所铸就。

可能这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曾秘密地试图与希特勒交涉达成相互理解，在1933年后者刚刚掌权之后。斯大林领头的秘密特工之一，克里维斯基将军(General WG Krivitsky)，就这些努力提供了细节。当斯大林的友好姿态被希特勒拒绝后；斯大林明白了那德国元首只能被当作公开敌人来处理。

斯大林随后加快博取民主国家的同情。他曾试图将俄罗斯的政策，等同于其他国家热爱自由人民的政治与经济福利。他称此运动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在1935年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他指令每个国家的忠诚共产党员，去与任何反对反对希特勒和他盟友的政治团体结合 — 甚至共产党员们以前攻击过的右翼党派。从它的结果判断，“人民阵线”曾是共产党员战略家们采用过最成功的策略。其准许了共产党员们与资本主义国家最保守与备受尊崇的政治团体，公开地相关联。

共产党员宣称对发动二战有功劳

在1938年斯大林密切关注着，当希特勒决定占领奥地利全境，来试探西方盟国的脾气。当没有导致严重后果时，元首准备吸收德国边境沿线的其他地区。在慕尼黑，他威胁道要闪电战全欧洲，除非英国和法国让他接管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工业区域。当他们同意后，他几乎全部占领了那英勇小国。

在1939年，希特勒侵占了立陶宛的梅梅尔领地(Memelland)，并之后准备进军波兰。然而此时他犹豫了。俄罗斯也想要波兰。事实上，俄罗斯把控着欧洲权利的平衡，而希特勒并不敢采取步骤在西线展开全面战争，除非他能被保证那俄罗斯将不会插手。希特勒，因而，向斯大林做出要约，要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举世震惊地接受了！这意味着那希特勒可以开战了，并有把握俄罗斯将不会干预。

大部分的共产党员世界对此措不及防。多年来，红色宣传曾把斯大林刻画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领军对手。此时斯大林的政权已批准了与纳粹的盟约，任由他们在西线开战。

在美国，共产党员报刊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他们的宣传转过来。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说美国共产党员们极度费解，那斯大林会向他最大的敌人投降。要直到钱伯斯与斯大林在西欧间谍活动的前主任交谈后，他才听到官方的解释。克里维斯基将军(General WG Krivitsky)说这项协议展现了斯大林作为战略家的天才之处。他解释道那，斯大林明白这项协议将撒开希特勒的缰绳扑向欧洲，而他还明白那，随着战争的进展，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自己打到虚脱。那时苏联部队就可以进军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苏军将能够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占领全欧洲！

且正如斯大林所猜疑的，希特勒毫不迟疑地利用了斯大林给他的政治助攻/推动力。该协议签署于1939年八月23日。到九月1日，德国装甲车就涌入那英勇，却无助的波兰骑兵阵线，且数千吨的炸弹落入波兰的诸多城市。

此外，正如斯大林所预料的，英国和法国被立即卷入战争，由于他们对波兰的承诺。这些国家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准备好发动这一场战争。没过一年，波兰已被德国和俄国斯瓜分，且法国被占领。之后不久，英国部队在敦刻尔克(Dunkirk)被炸弹炸得逃离欧陆，而后纳粹几乎毫无阻力地扩大他们的占领区，进入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

此时假定这场战争将在德国与英国的争斗中决出胜负，斯大林感觉是时候做出他仔细算计过的下一步棋了。只剩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仍在这场冲突之外：日本和美国。

在1941年四月13日，斯大林提示日本军阀向太平洋发动进攻。这被伴随着那同样简单的装置，其撒开了希特勒扑向欧洲的缰绳 — 一项协议。

在当时的俄罗斯，甚至多于美国，曾是日本人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的最大单一阻碍。通过接受与俄罗斯的盟约，日本军阀得以毫无顾忌地在太平洋和远东发动他们的泛亚战役。他们立即为他们的进攻做准备。

斯大林遭受战略挫败

斯大林此时打算坐到后排，并等待资本主义国家忍受他们烈火的洗礼。他曾向苏联军事领导们保证那，二战将被置身其外时间最长的国家所赢得胜利。那个国家，当然，必须是俄罗斯。他所不知道的，然而，是那希特勒曾一直计划着给共产党员祖国一个灾难性的惊喜。实际上，就在斯大林促进与日本中立条约的非常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曾私下向他的总参谋长宣称：“德国武装力量必须准备好在一场快速战役中击垮苏联俄罗斯。”

这大惊喜在1941年六月22日到来。希特勒撕毁了协议，并在一条2000英里的战线上，用121个师的兵力和3000架飞机，攻击俄罗斯。他多年前就已把这一切都写在《我的奋斗》里了。

这突如其来的闪电战袭击，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它粉碎了斯大林所打算的置身战外，而让资本主义国家们互斗到筋疲力尽。其意味着那，俄罗斯将以最可怜的战备，提前进入战争。

二战向美国靠拢

对很多美国的观察者，二战的这个新进展看似合宜于“热爱和平国家”的利益。希特勒向俄罗斯的进攻，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侵略国，锁入了致命的交战，甚至军方领导们都认为这可能缓解未来世界的紧张局势。但仅六个月内，德国人已占领了58万平方英里苏联最肥沃的土地 — 起初俄罗斯三分之一人口的居住地，且尽管有俄罗斯的“焦土”政策，纳粹部队成功地从当地人和土地上榨取了补给，所以那他们能够向前冲刺，而不必等待补给线被建立。很快，德国坦克已穿透到仅距离莫斯科60英里的地点，然后希特勒华而不实地宣布那“俄罗斯已经被击垮了，且永不会再崛起。”

这一切令其余世界所震惊，考虑那该谴责的可能性，一个纳粹帝国其可能从英格兰跨越到阿拉斯加(Alaska)。美国人本能地开始为俄国人加油。那被认为是关乎自我存亡的利益，通过美国的传统倾向为弱者加油而贯彻。

然后在1941年十二月7日星期天，那个要命的清晨，日本人对珍珠港(Pearl Harbour)发动了毁灭性的袭击；美国人一半都没准备好，就发现她自己处于二战的巨焰中了。无奈之下，美国领导人们向四

面八方寻找朋友。需记住的要点是那，希特勒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前进的黑靴，已在每片大陆的人民心中，踏出了令人麻痹的恐惧。曾是纳粹主义 — 而不是共产主义 — 那曾在抹杀全世界文明的光芒。因而，由于俄罗斯已经被带入美国人同情的轨道，不难理解她是如何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的亲密盟友。出于某种原因，那似乎完全忘记了，这曾是那非常相同的俄罗斯，曾与希特勒同意了互不侵犯协议，以让他扑向欧洲；且还加入了与日本人的中立条约，以让他们扑向太平洋。

美国的共存政策进入其第三阶段

到1942年早春，不仅很明显那美国参战时军事力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还同等显然的是那，“轴心国”(Axis)已经几乎摧毁了所有美国的传统盟友。可能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美国国家政策顾问)所建议的，这可能部分解释了，当时某些美国外交战略家，在处理俄罗斯事务中的铤而走险。

外交导航员已经从与共产主义的简单共存政策，在1933年降了一步，到他们决定接受共产党员领导们的滥用与破碎的承诺。此时他们断然地甚至更进了一步。他们决定试图转化共产党员领导们到美国人的思考方式，通过赠予他们如此盈溢的慷慨，以至于没有任何痕迹能质疑美国的意图，要赢得共产党员领导们的合作性支持，来赢取战争胜利，并在之后维持和平。曾被假设那，他们将之后成为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永久的有同情心的盟友，来建立“大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如果该计划曾奏效，那就真是外交天才的画龙点睛之笔。然而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正如很多军事官员和情报机构负责人所预测的 — 其会是俄罗斯将她自己弹射到世界强权的手段，从她最渴望毁灭的非常国家获取财富与声望。

尽管如此，该方案被启动了，而且美国在二战期间与其后对俄罗斯的态度，只能从这政策的条款中被理解。

在1942年六月上旬，莫洛托夫(Molotov)秘密来到华盛顿，并驻留在白宫。在他离开后，准备向美国人民公布这美国新政策的消息。在1942年六月22日(希特勒攻击苏联的周年日)，一场援助俄罗斯集会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办。在那里一位政府高官宣布：“第二战线？是的，且如果有必要，第三和第四战线。。。我们下定决心那，没有什么将阻止我们在这场冲突中与你们分享一切所拥有的和发生的，并且我们期待与你们分享胜利与和平的果实。”接着那可伶且一厢情愿的声明：“未出生的一代人将欠他们自由的很大一部分，于苏联人民不可被征服的力量。”

美国向俄罗斯“租借”的故事

这美国的慷慨大方政策立即开始显现。数十亿美元的“租借”批准给俄罗斯。在一些美国军事部门收到的命令中，证明了甚至故意牺牲美国的利益。在一项给空军司令部日期在1943年一月1日的命令中，竟提出这个惊人要求：“俄罗斯飞机的改装器材和调度已被给予第一优先权，甚至高于美国空军的飞机。”

美国国会却不很像外交战略家们那样热情地对待俄罗斯。国会具体限制了给俄罗斯的“租借”，仅包括针对“轴心”敌人军事行动将被使用的物资。其严禁运输将被平民百姓使用的物资，或用于俄罗斯的战后重建工作。这绝不是设计于向俄罗斯人民表示不友好。而仅是那信仰的表达，即美国资源不

应该被用于促进共产党员俄罗斯成为世界强权。某一天，俄罗斯人民可能将重获他们的自由，而那将是时候来分享资源。在此期间，非军事的慷慨大方，只会加强共产党员独裁的战后地位。

尽管有这些法律限制，然而，外交官们不羁的慷慨，而不是国会或军方领导们，宰制了“租借法案”。

例如，迪恩将军(General John R Deane)，曾在莫斯科担任美国军事使团团长，拒绝了俄罗斯要求的25台200马力大型柴油船用发动机，因为已经送给俄罗斯的发动机正在露天仓库中长锈，并且从所有表象看只是在储存起来为战后使用。此外，这些发动机被在南太平洋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紧急需要。在听到迪恩将军的决定后，俄国人向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租借法案负责人)上诉，他否决了迪恩将军。在随后的两年内，总计1305台这样的引擎被送往俄罗斯，花费美国人民超过3000万美元(\$30,745,947)。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当海军军官们被赋予将被用于维修美国战舰铜线的最高可能优先权，他们发现俄国人的一个订单甚至有更高的优先权，其曾显然将被用于俄罗斯城市的战后重建。交给俄罗斯人的铜线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不得不被储存于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20英亩的一块场地上，撂在那里直到战争快要结束。停战协议前几个月，其被运往俄罗斯用于修复他们的通讯系统。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人民已逐渐了解了关于在“租借”下涌入俄罗斯物品与财富的细节。被公布的清单来自俄罗斯的记录。是由美国军官，乔丹少校(Major George Racey Jordan)获取的，他曾在蒙大拿州(Montana)的“大瀑布空军基地”(Great Falls Air Base)担任俄罗斯“租借”的美国官方协调员。分析这些清单表明那根据俄罗斯的记录，共产党员收到了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租借”。而且尽管有针对它的法律限制，外交战略家们还包括了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价值\$3,040,423,000的美国物品，其肯定不像是被“租借法案”批准的。这些清单显示了船运的大量积存的“非军火”化学品，一起的还有大量船运的香烟盒，留声机唱片，女士化妆盒，乐谱，钢琴，古董家具，价值\$388,844的“廉价概念性新玩意”，女性珠宝，家居摆设，渔具，口红，香水，洋娃娃，银行保险柜，游乐场设施，以及大量其他类型的非法，非军事商品。

俄罗斯二战历史的学者指出那，美国的“租借”是在俄国几乎被打趴下时，开始哺养入她的。她已失去了她的大部分农作物，由于那焦土运动，旨在缓慢/拖延纳粹的进军。即使有“租借”的食物，也不得不在部队中以仅维持生存的水平进行配给制，所以那如果没有“租借”有可能俄罗斯的抵抗早已崩溃了。再者，德国占领区切段了俄国人和很多他们的主要工业中心。除了美国飞机，弹药，化学品，工具，重型机械等外，了不起的美国“民主弹药库”还为俄罗斯提供了478,899辆汽车。这曾几乎是苏联前线所用机动车数量的一半。

对共产党员心理有意思的评论，是注意那美国从未收到俄罗斯的官方“感谢”，为那价值11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是由美国人民支付且几乎就是“捐给了”共产党员祖国。斯大林的借口曾是那，他的政府感觉到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停止“租借”犯了错误。他冰冷地讲明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人民并不感觉表达谢意将是适当或合理的。

俄罗斯试图获取原子弹的秘密

整个二战期间，俄罗斯间谍活动猛烈集中在将出于此战争最重要的东西 — 控制并利用原子能量。双管齐下的推动力被运用来获取随着其发展的信息：一个是通过间谍活动，而另一个是通过外交管道。有段时间外交管道曾特别有效，不仅关于原子能秘密，且关于所有的军事与工业信息。

在“大瀑布空军基地”负责“租借”的乔丹少校首先察觉到异象，当俄罗斯人每次离开美国时，开始随身携带大量廉价的黑手提箱。他们拒绝让乔丹看里面的东西，理由是这些手提箱是“外交行李”，因而有豁免权不受检查。

一天夜里，该驻地的俄罗斯指挥官坚持要求乔丹前往大瀑布城邀约赴宴。乔丹曾起疑心但还是接受了。大约在凌晨，他收到了一个情绪激动的电话，说一架飞机刚刚降落，而苏联人要起飞前往俄罗斯，不等待乔丹的放行。乔丹火速返回机场。果然，这架飞机上有鬼。里面有五十个黑色手提箱，被武装俄罗斯警卫保护着。乔丹命令一名美国大兵将警卫拒之门外，且直接射杀，如果他们强行干扰他的检查。

后来乔丹在某国会委员会前宣誓后做出证词那，他发现每个手提箱里都是信息文件，关于美国工业，港口，军队，铁路，通讯等等。在一个手提箱里，乔丹说他发现了一封在白宫信纸上由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罗斯福总统心腹商务顾问)签署的信件，且收件人是俄罗斯党政的第三号人物。随信件附上了最高机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 原子能)的地图，以及相关原子能实验的描述性数据！这手提箱里的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来自希思”。当时乔丹并不知道希思是谁。该文件夹内有若干部队文档。另一个文件夹包含了国务院的文档。其中一些是曾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信件，其中对俄罗斯局势做出了机密性评估，还有对俄罗斯官员详细的印象分析。此刻正被秘密地运回给俄罗斯人阅读。

当乔丹少校向华盛顿政府报告了这些事实后，他因扣押该飞机受到严厉批评。

1943年四月，俄罗斯联络员告诉乔丹那，一批非常特殊的实验性化学品要通关。该俄国军官打电话给霍普金斯在华盛顿，然后把话筒给乔丹。乔丹少校报告称霍普金斯曾告诉他：“我不想你跟任何人讨论此事，而且不准记录在案。不要大肆声张，就悄悄地送出去，而且要快。”

该俄国军官之后告诉乔丹，这批货曾是“炸弹药粉”，而且乔丹曾看见该军官文件夹内某条目写着“铀”。这批货在1943年六月10日通关。其曾是数批货的首批。至少1,465磅的铀盐据称被运往苏联。冶金学家们估计那，这可被提炼为6.25磅的可裂变铀-235。这比产生原子爆炸所必需的还多两磅。在1945年七月24日，波茨坦会议上(Potsdam Conference)，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向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斯大林宣布那，美国已终于研制出了某高度机密的炸弹。他告诉他们，这种炸弹具有几乎难以置信的爆炸力。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曾在观察着斯大林，并注意到那他似乎并没有特别惊讶，甚至对该声明都没什么兴趣。四年之后(1949年九月23日)，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宣布那俄罗斯已成功地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 比美国预期的早了好些年！某些官员们则纳闷，为什么他们得到了那么多帮助，俄罗斯人却没有远早于此的引爆一枚。

二战收尾的月份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防御力始终强于攻击力。在二战期间，俄罗斯人民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抵抗意志，甚至当时希特勒都认为他们被完全击败了。他们蒙受了天文数字的损失：700万死亡(包括250万俄罗斯犹太人被纳粹歼灭，和150万其他苏联平民被德国人杀害)，而大约300万人在战斗中丧生。3到400万名被俘虏，而没有给出伤残人数。战争的结果便是，那被毁灭的1,700座俄罗斯城镇，

70,000个村落，31,000家工厂，84,000所学校，40,000英里的铁路，此外还销毁了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和2,000万头猪。这大约占苏联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一。

无法得知斯大林是否曾强迫他自己去承认之，但这几乎费解数量的禽兽毁灭很可能曾被避免，如果斯大林没有犯那阴险的错误，即故意与希特勒在1939年签署协议，其触发了二战的首场战役。现在有很多主导的政治权威人士，他们说那如果希特勒曾一直被迫延迟他进入波兰的战役，由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其将会给予西方国家足够的时间来建立他们的部队，并通过恢复在欧洲的权力平衡，整个二战的惊险记都可能不会发生。

美国共存政策进入第四阶段

在二战期间，美国总统收到两个不同的对共产党员政策的诠释，和两种不同的建议来如何最好的与共产党员领导们打交道。一组顾问采用了历史的方式，接受共产党员为他们自称的革命家，并假设那他们过去的行为，是期待他们未来如何行动的最安全准则。第二组参事则呈递了对共产党员领导们更理想化的观点。他们想要人们忘记过去；看待共产党员的粗野仅为政治性的不成熟，其可通过耐心忍受与豪爽慷慨被改变。

对这第二组，不仅迅速地吸引了理论性的理想主义者，还有后来被发现的深层次参与针对美国政府彻底颠覆的男男女女。如今，历史学家们发现很难定义，在何处理想主义离开，而颠覆接管了。在任何情况下，正是这组人主导了“租借”方案，并建立了政策的舞台，其控制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约十五年。

也是这组总统参事们，以最热情激昂地赞誉那最微小的痕迹，提示那共产党员们在“改变”。例如，当“共产国际”在1943年五月22日解散时，这组人欢呼此公报为共产党员领导们已放弃了征服世界毫无争议的证据。其他人则怀疑那这仅是个宣传伎俩。后者被证明属实，正如古琴科(Igor Gouzenko)，前俄罗斯电译员曾作证：“所公报的解散“共产国际”可能曾是共产党员近些年来最大的闹剧。只有名字被清洗了，目的是要让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放心。实际上，共产国际仍存在并持续它的工作，因为苏联领导人们从未放弃过建立共产党员独裁专政的想法。”

当总统本党的许多高官看到美国政策正在前进的危险方向时，他们赶紧去警告他。在战争期间，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发生在总统，和他的好朋友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之间，他曾在1933年被总统派往俄罗斯为第一任美国大使。布里特先生刚才向总统完成概括了许多他与斯大林的个人交情，并已告诫总统在与共产党领导打交道时要提高警惕。

“比尔(首名William 可被简称Bill 或爱称Billy)，”总统回道，“我不辩驳你的事实；他们是准确的。我也不辩驳你理论的逻辑。我就是有种直觉那，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利(霍普金斯)说他不是，而他那除了他的国家安全则别无他求。并且我认为那，如果我给他们所有我能给的，而不要求任何回报。。。他将不会试图并吞任何地方，且将为了世界和平与民主同我合作。”

这声明所反映的哲学理念，是理解“三巨头”在战争结束前举办会议的基调。在那时，美国的外交战略(自1933年起的简单共存)已经进入其第四阶段 — 全面接受俄罗斯共产党员们为保护未来世界和平计划的全面伙伴。

联合国的创立

在1944年八月和九月间，来自英国，秦娜，俄罗斯和美国的代表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会晤。在这次会议上，奠定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宪法基础。其中俄罗斯不仅被任命为全面伙伴，还是有宰制权的股东。一极重大的发展曾是此事实那，当时其他国家都反对，而俄罗斯曾坚持要求行使否决的权利，即使她是纠纷的当事方。这违反了国际法理的非常奠基石，但民主国家们同意了。他们曾准备支付几乎任何代价，来使俄国参入。

到1944年十二月28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开始表达疑虑，关于美苏关系和俄罗斯在战后时期将扮演的角色：“苏联人在他们未来的对外政策中有明确目标，我们仍不能完全理解其全部。。。从苏联人迄今的行动来看，“友好”与“独立”这两个词似乎与我们自己的诠释，含意相当不同。”

当战争的潮水一被反转，苏联对待美国官员们开始渐渐的更傲慢。迪恩将军(General Deane)向华府关于“租借”写道：“甚至我们的礼物都被怀疑地看待。。。第二部分当事方(美国)要么是个应被敬仰的精明商人，要么是个该被鄙视的蠢货。。。我仍未见到过某俄罗斯人家里面。官员们不敢跟我们变得太友善，且其他人则因为这罪行而受到迫害。”

到来年四月，英国首相已对整个俄罗斯局势变得厌倦。他向罗斯福总统呼吁：“我认为其属最高的重要性，那在此关口我们两国应采取坚定且坦率的立场，旨在气氛可能被缓解，而他们(俄罗斯人)意识到那，超出某一点我们将不会容忍侮辱。”

还有些许证据那，美国总统也曾开始对现实状况所觉醒，但在撰写此消息一周之后，罗斯福总统去世了。打完战争并建立联合国的艰巨任务落入了那些，仍曾坚持那俄罗斯人被误解了且肯定能实现成功合作关系的人手中。

在1945年四月25日，1400名来自46个国家的代表们，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 别译“三藩市”)会晤，并在深思熟虑之后，商定了《联合国宪章》。

任何熟悉俄罗斯共产党员党章的人，会在《联合国宪章》中认出类似的格式。其特点是对民主原则的热切宣言，是合理的且被渴望的；然后这被附加了某宪法性的限制或程序性的制约，其完全废弃了刚宣布的原则。例如，俄罗斯宪法规定了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然后，在第126项条文中，它规定了某单独政党(共产党)，它将为选民们提供单一的候选人名册。这当然，令所有关于普选和匿名投票的华丽词语变得毫无意义。新闻自由也类似地被保证，而然后被规定那所有写作必须“符合工人利益”而抹杀。

以这完全相同的方法，《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第1条)，而后成立了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其由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俄罗斯，秦娜，法国和美国)所主宰，任何其中一位都能否决其他所有成员国表达的意愿，通过那简单的装置来行使否决权(veto power)。

《宪章》允许每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上有一票表决权。这听起来像民主，但之后它规定了那，联合国大会除了提出推荐什么都不能做，且必须向安理会提交所有其建议才能行动！(第11-14条)。这使得安理会成为联合国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法机构。为了令这一点绝对清楚明白，《宪章》在第24条规定那，加入联合国的任何国家必须，“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这意味着那，尽管联合国的那大胆声明是“基于对人民平等权利和自我决定原则的尊重”(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冰冷事实是那成员们都曾完全保证服从安理会中，一个巴掌能数过来几个国家的意愿。正如接下来十年戏剧性地所展现

的，所有联合国的成员 — 特别是小国们 — 可能被锁住咽喉，其是苏联曾给她自己规定的，通过在安理会上阻碍会员资格，并通过经常使用否决权来支配该机构。

《宪章》进一步规定那，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应被限制在“热爱和平”的国家(第4条)。这曾在旧金山被彻底地讨论过，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强调过那，联合国旨在成为一个友善国家的集体组织来维护和平，而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集合。换句话说，建立联合国的前提是，其成员将仅包括那些已曾在历史上展现过“爱好和平”的国家。在采用《联合国宪章》八年后，杜勒斯国务卿曾向“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没能维护和平：“如今我们看到某机构的不足，其有效地运作取决于某国家的合作，其被企图统治世界的国际政党所主宰。”

正如此后的些许权威人士曾指出的，联合国设立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警察委员会，而后将顶尖的国际黑帮任命为该委员会成员。就好像成立一个消防队来扑灭战争的大火，而后将世界社区最先进的萤火虫放到队里面。从小国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承诺提供一个好的牧羊者来保护那脆弱小国，而后任命一只狼和她的狼崽子们来保护羊群。

所有这一切在紧随其后的“幻灭十年”(decade of disillusionment)中变得明显。在1945年，然而，一个厌倦战争，充满希望的自由世界曾感觉那联合国曾是其标榜的一切 — 一个为集体安全的机构，旨在像一个堡垒抵御侵略国家。

二战收尾时共产党员的态度

美国在战后能从共产主义期待什么的一个明确征兆，来自于1945年五月24日，当主导的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斯(Jacques Duclos)，代表他的俄罗斯上司写了一封信，要求那在美国的共产党员立刻抛弃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友好合作政策，并返回他们历史性的世界革命任务。早在1940年，美国共产党已正式退出“第三国际”，以避免根据“沃里斯法案”(Voorhis Act)不得不注册为国外代理人。之后美国共产党被解散了，企图将共产党员隶属于美国主要政党之一。为此目的，他们自称为“共产党员政治协会”(Communist Political Association)。

所有这辗转曲折曾与苏联政策完全的和谐，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曾公报的政策复归到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合理化这全面的政策转变，美国共产党的领袖白劳德(Earl Browder)，被指控对之前政策的“错误”负有个人责任。他被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权立即被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接管，应记得，他曾在1932年写了一本令人激愤的书，称为《走向苏维埃美国》(“Toward Soviet America”)。就在二战之前，他曾在某国会委员会前做出证词：“当某共产党员负责美国政府时，而那一天将肯定到来就像太阳升起，那个政府将不是资本主义政府，而是苏维埃政府，且在这政府身后将有红军撑腰，来强制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不再难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想要福斯特这样的人，来担任其遍布世界的共产党负责人。我们如今知道那俄罗斯领导们对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在靠拢此结论，即信念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即将来临。在他们的秘密圈子里，他们有希望的臆测那，下一场战争可能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殊死决斗。

古琴科(Igor Gouzenko)表示那在停火协议之后，在加拿大渥太华俄罗斯大使馆，他和其他雇员被警告不要有自满态度/沾沾自喜。扎博汀上校(Colonel Zabotin)将雇员们召集在一起，而后提及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如下：“昨天他们曾是我们的盟友，今天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明天他们将是我们的敌人！”

从南斯拉夫党魁铁托元帅(Marshall Josip Tito)在共产党高层亲密圈子里发表的演讲中，也能获取到此时期共产党员头脑中异常深刻的洞悉：

“第二场资本主义战争，其中俄罗斯被她最危险且最强大的法西斯敌人攻击，以苏联决定性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场刚结束的战争中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绝不代表着在未来我们应延续我们的联盟。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力量构成了我们的天敌，尽管那事实他们曾帮助我们击溃他们最危险的代表。可能那我们将再次决定利用他们的援助，但始终以加速他们最终毁灭为唯一目的。。。 ”

“原子弹是个新的因素，其是资本主义力量期望的手段来摧毁苏联，和工人阶级胜利的前景。这是他们剩下唯一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仍未以理想的形式实现，因为原子弹的研制曾被加速且早在1945年就被完善。但我们离实现我们的目标也不远了。我们必须博取多一点时间，来重组我们的队伍，并完善我们军火弹药的准备。”

“我们当下的政策，因而，将遵循一条温和路线，旨在争取时间，在苏联和其他我们控制的国家，重建经济与工业。然后那一刻将到来，当我们能全力以赴地投身消灭反动派的最后一战。”

如此反映了共产党员领导们，当他们在二战中涌现为全球第二大政治力量。他们曾感觉共产主义可能有空前的可能性，当那“勇敢新世界”走进战后时期。

第九章

战后时期共产党员对自由世界的攻击

斯大林在战后扩大共产主义的计划涉及三种手法：在占领地区创建亲共的傀儡政府，通过卫星国家的军队武力征服更多土地，和进一步地通过苏联间谍活动与宣传机构来渗透自由国家。

本章中，我们将试图讲述这些方案的旷世奇功。其应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

临近二战末尾，盟军领袖有没有开始怀疑俄罗斯人的背叛？为什么在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去世前几个月，安排了特殊行程前往莫斯科？

自由世界如何在苏联战略的铁幕下，失去了1亿人？

自由世界如何因秦娜被征服，而失去了超过4.5亿人？“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揭示了什么？

你认为外交上的马虎大意有没有可能曾助长了对南韩的攻击？你认为在1949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惊人讲词带有什么重要意义：“应做的是让南韩沦陷，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推了她”？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部队首次在军事中占上风的转折点是什么？

1953年韩战停火后，美国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说了什么，来表明美国在抛弃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在“地下战场”(Battle of the Underground)中FBI(联邦调查局)的角色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没有做更多来防止“法属印度秦娜”(French Indo-China)的陨灭？

在福尔摩沙(Formosa 美丽岛 台湾)的争端中，为什么红色秦娜称美国是纸老虎？

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Z Manuilsky)关于“和平共存”的战略说了什么？

二战收尾时美苏关系的恶化

共产党员颠覆与侵略的证据在二战快结束时变得如此明显，甚至那些许曾将他们职业生涯赌在与苏联领导人友谊上的都开始感觉到焦急。这包括了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罗斯福总统过世后一个月内，霍普金斯变得对事态进展如此担忧，那他匆忙安排去亲自会见斯大林。当时霍普金斯已病入膏肓，没多少日子了，但他强迫自己做出这向莫斯科最后的朝圣，从本该是为战后和平宏大计划的废墟中，试图挽救些残骸。

然而当他抵达莫斯科时，霍普金斯遭遇了恼怒且唐突的斯大林。前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为我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曾为俄罗斯担保方案的处理 — “租借法案”，做出了惊人的带敌意的言语攻击。

该攻击的震惊可被更好地体味，当记得那霍普金斯曾认为 he 自己是苏联在美国最好的朋友。他和他的同事们才刚开销了数十亿美元，还担了原子战争的风险，来为了和平试着建立一个美苏合作伙伴关系。即使斯大林对他开始人身攻击抽他耳光，可能霍普金斯对他曾受到的待遇都不会更惊骇/错愕。

作为回应，霍普金斯大力地指出“美国是曾如何(通过他)开放地诠释法律，将食品和其他非军事物品以援助送给他们。”斯大林承认了这一切，但粗略地将其划掉，讲道苏联仍不能原谅美国，在欧洲胜利日后终止了“租借”。

此刻，似乎没有什么可安抚斯大林，除非大开全新一轮美国“租借”的慷慨大方；否则，他显然想不出任何特别原因，来甚至假装仍想要美国的友谊。他还威胁要抵制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

出于某些如今看起来很不相称的理由，霍普金斯继续恳求斯大林留在团队中，并重申那他确信共产党员通过参加联合国机构，能获取的众多好处。像个撅嘴掉脸的孩子，斯大林装出在考虑不情愿的姿态，但渐渐让步了。通过同意参加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他想要霍普金斯知道他帮了美国的大忙。

最后，霍普金斯回家了。到他去世时的1946年一月，已有了丰富证据表明那，爱好和平的国家将进入狂风骤雨的时代，正是由于将苏联纳入自由世界全翼伙伴的战略。

自由世界失去1亿人

显然，二战的一主要目的是解放所有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俄罗斯深知那，如果她想在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里扩张她的影响力 — 尤其那些与苏联接壤的 — 她将不得不用如此创造错觉的方法，那这些

国家是通过她们自己的政治决定转向共产主义的。秘密但非常积极地关注这些国家的事务成了苏联的既定政策 — 通过渗透与颠覆使她们“自愿”成为卫星国。

在某些国家，此计划立竿见影。例如，它使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卫星国，因为共产党员已在战争期间夺取了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且当这些国家一被解放共产党员就要求建立新政府的权利。之后，斯大林试图清洗铁托的政权，但发现清洗不了。铁托暂时将南斯拉夫从俄罗斯的轨道上拉开，但仍公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尽管美国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俄罗斯还发现她的计谋在这些东欧国家中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由于在二战最后阶段苏联部队执行的军事战役，红军占领了所有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如今大部分的东德。

在红军部队撤退之前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和平”征服战略，是曾鼓励创建仅包括左翼政党的联合政府。这给了此印象那这些国家曾有着代议制政府的某些表象/外衣。下一步是将共产党员部署到所有的关键政府岗位。第三且最后一步是强迫所有政党加入，那由共产党员领导们承担全面独裁权利的“整体集团”/“一块石板”/“铁板一块”(monolithic bloc)。

通过此谨慎执行的调动，所有这些国家在1949年都被全面制服。共产党员的铁幕在他们所有的西线边境咄咄落下，而自由世界发现与这些前盟友们被完全切断，那曾代表了大约1亿人民。

自由世界失去秦娜和她的4.5亿人

与此同时，自由世界大国还遇到了他们应对世界共产主义曾领教到最苦涩的教训之一 — 失去秦娜。

在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战斗了十四年之后，秦娜曾带着很高的希望靠近二战末尾。此战争曾一直在蒋介石领导的独裁专制下相对抗，但是他的国民党政府曾保证过，只要国家统一条件允许，就建立民主宪法。战争结束时，蒋介石下令恢复民权并开启新闻自由。

中华民国领导人曾晓得那，对他们和平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西北一支规模很小但训练有素的中共军队；尽管如此，他们直接开始制定宪法的计划，其将允许共产党员的全面代表权，但将要求他们解散武装部队。曾有信心那在秦娜的所有政党能协商建立代议制政府，假如武装反叛能被消灭。事实上，蒋介石曾邀请共产党员领袖，毛泽东，前来首都重庆，看二人是否能达成和平协定来化解他们的分歧。

毛来了。他曾答应合作来建立民主，但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一点都不相信他表面展现自称的诚意。蒋后来向他紧张的同事们保证那，他绝不会放弃他的独裁权利，直到他完全满意那，政府是安全的在人民殷实的多数派手中 — 而不只是某吵声很大的激进分子少数派。

雅尔塔协定对战后秦娜的影响

秦娜战后和平的希望早早就迎来当头一棒，当她得知那早在1945年二月，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领导们已经在雅尔塔(Yalta)同意了，将给俄罗斯在满洲大规模的财产权，如果苏联人加入针对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对此单方面的安排(从未与秦娜磋商过)火冒三丈，而且他从未止息将随后的大部分灾难归咎于此最初铸成的大错。

雅尔塔协定(Yalta Agreement)曾允许了俄罗斯仅在日本人投降前六天，飞速进入满洲(和北朝鲜)。在俄国人典型的野蛮占领之后，苏军令共产党员牢牢掌控了这片土地，其曾被日本人广泛工业化，且是秦娜最富裕的农业地区之一。实际上，满洲正是那国民党人曾期待利用的工作基地，来支撑秦娜千疮百孔的经济。

然而，夺取满洲之后，斯大林突然出乎意料地同意撤军，且承认秦娜的国民党政府拥有该领土的合法主权，但条件是秦娜将确认斯大林之前曾在雅尔塔要求的，俄罗斯在满洲的财产权。这包含了满洲铁路一半的拥有权，和租借亚瑟港(Port Arthur 旅顺港别称)为俄罗斯军港的权利。在美国和英国的强大压力下，秦娜与俄罗斯在1945年八月14日签署了此协议。

蒋介石几乎立刻明白了这是个严重错误。该条约不过是个俄罗斯的战略工具，其合法地规范了在雅尔塔的错误。正如蒋介石曾担心的那般，俄罗斯人运营满洲铁路就好像他们全权拥有似的。他们不仅在亚瑟港建立了海军基地，还傲慢地拒绝允许华夏人使用他们自己的大连港。并没有撤离满洲，苏联人开始劫掠整个地区的所有重工业，并运回俄罗斯为“战利品”。这意味了对秦娜未来经济复苏的一闷棍。

但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以各种借口来延迟撤军的战略，直到秦娜共产党员能从西北过来并占领满洲。当共产党员到达后，俄罗斯人将他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大量弹药和战争物资交给了他们。

结果，当国民党人抵达来接管满洲时，他们义愤填膺地发现那，秦娜共产党员早已在战壕里了。立刻，内战缓缓渗起为不可逃避的后果。

蒋介石试图在秦娜创建民主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国民党人正在试着为秦娜准备宪法形式的政府。出于他自己的主动性，蒋已设定1946年五月5日，举办第一次秦娜全国代表大会，所有党派都将参与其中。但当然，这要统一并民主化秦娜的整个方案，被在满洲爆发的战争严重妨碍。此刻，美国外交官决定来帮一把手。

他们曾计划了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平，并从最开始就坚持那，红军领导人潜在是和平的且没有领土野心的。假定这是真的，他们谴责蒋抵抗秦娜红军。他们指控他在制造新的世界紧张局势。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因而被派往秦娜来阻止内战：

马歇尔将军抵达于1946年一月。之后发生的是一长串事件，每一件都悲剧地展示了，试图将世界革命家的想法纳入代议制政府框架，的失误。

共产党员要求联合政府，但坚持要保留他们自己的私人军队。他们想在整个秦娜的政府中发声，但将不允许在共产党员占领的秦娜地区事务中有中央政府的声音。他们同意停火，然后只要一旦符合他们的利益就发动侵略性攻击。他们同意建立代表所有党派的“国务议会”(State Council)，然后在最后一刻告知他们将不参加。

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被推迟，以便共产党员能参加，他们以此为借口指责蒋介石没有适当授权就设定新日期。在第二次延期之后，共产党员仍拒绝参加，最后全国代表大会在1946年十一月15日召开，且在圣诞节(十二月25日)通过并采用了民主宪法。但共产党员将与其毫无瓜葛。

蒋介石变得完全坚信那，共产党员将永不会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而是要龙战于野地赢取秦娜的全部疆域。他还相信共产党员绝不能够代表秦娜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政策是被莫斯科创建并强加给他们的。

时间将证明此分析是正确的，但美国外交战略家们则是最后被说服的——且还是在失去秦娜大陆之后。此外，蒋不能使美国外交使团信服那，当共产党员攻击他的时候他做出反击是合理的。当他试图夺回不久前被共产党员占据的领地时，在华盛顿被形容为“不可原谅的挑衅”(inexcusable aggression)。

灾难击倒美国的老盟友

终于，在1946年夏天，当共产党员已屡次违反了停战协定时，国民党人决定大力反击，并长驱直入满洲。外交官狂暴地命令蒋住手，但他拒绝了那样做。他讲道，再次休战只会给共产党员时间重组，且甚至比以往都更凶猛地反扑。他还说道正是他的意图继续此战役，来强制解除共产党员的武装，并恢复他们平民身份，以便秦娜能继续她的宪政方案，而不用担心持续的叛乱。

这理论的线路对国务院并没有吸引力。在三个不同场次，蒋被命令发布无条件停火。为了让他带棒子，最后美国禁运了所有对秦娜的援助。只在美国援助猝然被停顿后，蒋才忍痛同意停火。马歇尔将军陈述道：“作为总参谋长，我武装了39个反共师(在秦娜)，现在轻轻一笔，我就解除他们的武装。”

这被证明是共产党员的大恩赐。当国民党人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被制服时，共产党员重整了他们的部队，且准备了全面出动的战役，其后被证明对秦娜是致命的。奇怪的是，即使蒋已放弃了他自己最明智的判断且发布了停火命令，但美国的禁运却没有解除。国民党部队闲坐干等/无所事事，消耗了他们担心再也得不到的大量补给。后来，当红潮开始席卷/翻滚向蒋时，国会才终于强行通过了“援助秦娜”法案，但货物的实际交付却没有及时处理，没能帮上任何实忙。

自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瓦解了。对中华民国的部队领导们似乎很明显那，一手上他们是共产党员侵略的受害者，另一手上则是英美外交官完全缺失洞察力的受害者。

在蒋发布了他的无条件停火后，马歇尔将军向共产党员领导呼吁重新开启磋商协定。共产党员回复了，但口气好似他们是胜利者，且提出的要求甚至马歇尔将军都标记为是完全不合理的。他们想要他们刚被赶出去的满洲所有富裕地区。他们想裁撤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拟议的联合政府中要求占据主导地位。

显然，那在如此情况下任何妥协的希望都是不存在的。马歇尔将军接受这是共产党员的正式宣告，那共产党员不再对调解感兴趣了，他因而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让杜鲁门总统召他回家。他在1947年一月返回美国，并立即成为美国新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魏德迈报告

美国政府内的许多领导人，对处理秦娜内战的方法完全不满意。因而在1947年夏，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奉总统命令被派往亚洲，以查明在秦娜出了什么问题。返国之后，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其极严厉地批评了马歇尔将军和他外交使团所曾遵循的和平方略/程式。他指出

那，不仅自由秦娜的利益曾被侵犯，而且美国及其所有盟国的自身利益，也曾屈服在共产党员的冲动下。他曾推荐迅速地提供大量援助给国民党政府，并预测那如果及时提供帮助，局势仍可被挽救。

不幸的是，此报告落入了被魏德迈将军批评的非常人物手中。结果，其被埋藏在部门档案里将近两年，等重见天日之时，要采取其推荐的行动早就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崩溃的趋势正迅速走向其势不可挡的高潮。在1947年和1948年初，蒋介石的军队表现得异常出色，但到了1948年末，补给短缺和秦娜经济的内部瓦解，伤了筋动了骨。国民党部队的垮台不是逐渐的 — 曾是突然且彻底的。数万人抛弃了他们的岗位，并毫无组织且迷乱地向南逃奔，而剩下的数万人则扔下了他们的武器，就地向秦娜共产党员投降了。

到1949年九月，共产党员领导们已经在狂欢庆祝他们的胜利了，因为他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之后，蒋介石承认他暂时失利，且抛弃秦娜大陆，旨在带着他军队的散乱残余逃往福尔摩沙。

1949年的国务院白皮书

自由秦娜的沦陷，造成了一股贯穿美国的沸腾愤慨。无论政治领袖或普通公民都感觉到那，不知何故一位老盟友被颠覆或被背叛了。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曾真正知晓秦娜溃败所牵涉的，但他们晓得那蒋介石和美国的利益已遭受了灾难性的挫败。曾弥漫着对事实的索求。

曾策划了秦娜致命政策的几个人，迅速合作了一份报告，旨在合理化他们在远东经手的美国利益。称为“美国与秦娜的关系”(“US Relations With China”), 并于1949年作为“白皮书”(White Paper)出版。对很多人来说，该报告很有说服力，但不是所有人；事实上，失去秦娜给某些曾与马歇尔将军共事，且几乎到最后还信任共产党员的，带来了触目惊心的觉醒。

其中一位便是在那临界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作为在秦娜的前传教士，和燕京大学的校长；他不禁估量秦娜的沦陷为一场浩大的人类灾难。他批评了自己曾参与其中，并谴责了他的同僚们在白皮书内试图掩盖他们的错误。

司徒雷登博士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曾在执行秦娜政策的)美国人主要看到了秦娜共产党员的优点，却没有仔细察觉到那不宽容，偏执，欺骗，草菅人命和其他邪恶，其似乎是在任何极权制度内固有的。我们保留了如此形容词的共产党员含义，如进步的，民主的，开放自由的，还有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正如他们曾打算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未能充分意识到迄今取得的成就，和秦娜民主的潜力。所以，我们不能逃避这场浩大灾难责任的一部分 — 不仅为秦娜，且还为了美国 and 自由世界 — 失去秦娜大陆。”

关于白皮书，他说道：“我曾经，其实，仅是被这部异常作品的内容所困惑，且充满疑虑的许多人之一。。。明显的是，那目的曾不是要创作“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选择在当时有效的材料并被用来制定政策。被略去的是在制定政策时曾被拒绝的材料，未曾被依仗的材料。”

这曾一直是魏德迈将军的诉状。外交战略家们既不愿意承认现实局势，也不愿反转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们的评估，尽管表里不一的证据比比皆是。

一惊人的发展

到1949年，任何警觉的美国人已几乎毫无借口，进一步地被共产党员战略所欺骗。数十名美国共产党员间谍被曝光，主导的美国共产党员已被FBI逮捕，且以“密谋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定罪，惠特克·钱伯斯，伊丽莎白·本特利和一群前共产党员特工都已敞开他们的灵魂，西方盟国已经历了“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的狠毒挤压招数，且美国已经开销了数十亿美元在对外援助上，来防止俄罗斯像她接管了秦娜一般吞噬全欧洲。但尽管这一切，在1949年十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其几乎违背了任何解释。

举办会议所宣布的目的，是决定“专家们”认为在远东应该做什么。会议由国务院的杰赛普(Philip Jessup)主持，并且那些出席的不仅包括了国务院的官员们，还有对亚洲感兴趣的众多甄选嘉宾。司徒雷登博士曾在场，且会后就整场讨论的偏颇表示深度忧虑。史塔森(Harold Stassen)也曾在场，且之后做出证词那，在场的大多数都赞成以下政策：

- 一。欧洲的援助应优先于亚洲。
- 二。对亚洲的援助不应被启动，直到一段“长时间仔细研究”之后。
- 三。俄罗斯共产党员应被认为“不像是希特勒一样具有侵略性”，且“不善于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来扩大他们的帝国”。
- 四。共产党员的秦娜应被美国承认。
- 五。应敦促英国和印度效法，承认秦娜共产党员。
- 六。秦娜共产党员应被允许接管福尔摩沙。
- 七。共产党员应被允许从英国接管香港，如果共产党员坚持。
- 八。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印度第一任总理)不应被给予援助，因为他的“反动与独断倾向”。
- 九。国民党对秦娜的封锁应被打破，且将经济援助送往共产党员大陆。
- 十。不得向蒋或在南朝鲜的反共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

在此会议中最前沿鼓吹这些政策的二人，曾是拉提莫尔(Owen Lattimore)和罗辛格(Lawrence Rosinger)。二人最终都被布登兹(Louis Budenz 《工人日报》前编辑 宣誓后做证词)指认为共产党成员。

即使未曾有过如此的指认，在此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应明白那刺眼的真理，曾是那事实，这整个清单的政策是莫斯科散布出来盛行的“党线路”抄本。几个月来，这些非常政策曾在共产党员报刊的每一期上敲定。曾是对那些接受这些荒诞建议者的判断力与职业辨别力的唯一评论 — 尤其考虑到在那非常时刻，俄罗斯曾利用挑衅与煽动性的政策，来威胁自由世界几乎每个地区的国家。

这场会议之后三个月，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宣布了若干政策，预兆了失去福尔摩沙，和秦娜国民党人被共产党员清算。首先，他否决了联合总参谋长的建议(给蒋强大的军事援助)，在1950年一月12日宣布，那上述第六点和第十点所列的原则将成为美国官方政策。他还讲道那，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并不包括福尔摩沙或南朝鲜。他表示那，如果在美国防御圈外发生袭击，“最初必须依赖被攻击的人民去抵抗”。然后他提出那，他们可以向联合国申诉。

这简直就是一唐突的声明那，美国外交官们在抛弃福尔摩沙和朝鲜。此公告令许多远东学者震惊，不仅因为该政策违背了美国的自身利益，还因为它字面地邀请了共产党员向这些自由世界的盟友发动进攻，通过给出提前通知那，这些地区可以被侵略，而美国不会插手。

只花了共产党员六个月时间来选择并准备他们的攻击地点。他们选择了几乎毫无防备的南朝鲜领土作为第一战区。

共产党员攻击南朝鲜

应记得那，雅尔塔协定曾允许了苏联人占领满洲的同时，接管北朝鲜。像其他地方一样，俄罗斯人并没有撤出他们的部队，直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员傀儡政府根深蒂固。至于南朝鲜，美国部队占领至北纬38度平行线的领土。

在1949年期间，联合国一项授权曾要求俄罗斯和美国都撤出他们的部队。俄国人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北朝鲜红军，其中包括187,000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173辆俄罗斯坦克，一定数量的俄制火炮和200架俄罗斯飞机。另一方面，南朝鲜是个新出生的共和国，有一支96,000人的军队，但装备简陋，几乎没有坦克，反坦克武器，重型火炮或战斗机。这意味着那，在1949年末，南朝鲜受到北朝鲜攻击的威胁甚至更大于福尔摩沙被中共的。而华盛顿外交官已向福尔摩沙和朝鲜都应承过那，一旦发生袭击，他们肯定不能期望任何来自美国的军事帮助。作为外交的左翼小队发言人，拉提莫尔(Owen Lattimore)解释了局势：“应做的是让南韩沦陷，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推了她。”

在1950年六月25日，星期天的清晨，北朝鲜红军的八个师跨过三八线，并往南扑向首尔城(Seoul)。李承晚(Sigmund Rhee)总统向联合国安理会，在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胡乱地发出求救信号。三方都做出了回应。安理会宣判北朝鲜犯有破坏和平罪，且命令她的部队返回三八线。(如果俄罗斯曾被代表，她无疑会否决此行动，但苏联代表在抵制安理会，因为秦娜继续由国民党代表，而不是中共。)

麦克阿瑟将军做出的回应是飞往朝鲜，并向华盛顿报告那绝望的局势。杜鲁门总统的回应是完全反转他外交参谋的政策，且命令麦克阿瑟将军调动在日本的美国地面部队以阻止红潮。由此战争开始了。

数周来，局势看起来十分惨淡。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所有联合国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起初这些部队被如此限制，那在釜山(Pusan)的浅滩曾是他们能守住的全部。然后麦克阿瑟将军制订了孤注一掷的计划。其曾是如此困难且不合逻辑的那，他很有把握其将完全出乎共产党员的意料之外。其做到了。在九月15日，上到朝鲜半岛一半，美国海军(带两艘英国航母)，空军，陆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联合在仁川发动了一场高妙的入侵 — 此处二十英尺高的海浪令登陆好似奇闻。瞬间的校时允许了登陆，而北朝鲜人接下来发现的，就是他们被困在军事钳形攻势威武的爪颚之中，其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而后迅速地包围并消灭了整个北朝鲜军队的精锐，当然曾集中在南部。真是场辉煌的胜利。

麦克阿瑟然后麾军向北。大韩民国(南朝鲜)的部队沿东海岸推进，而其他联合国部队则沿西海岸。这样操作时，麦克阿瑟将军曾被要求根据晦涩的暗示/隐射来采取行动，而没有从华盛顿或联合国的明确指示。有一阵子，看起来那他可能被禁止追击撤回北方的敌军。

到十月中旬，联合国攻势的海岸先锋，都在逼近朝鲜的最北部，且战争看似几乎结束了。立刻就有了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景。然后，在十一月，始料未及的灾难降临了。

从朝鲜北方边境跨过鸭绿江到来的第一波人潮，原来是100万人的中共军队。当这些部队涌入北朝鲜，联合国军发现他们被一股盲从的，嘶吼的且自杀性的人肉浪潮所窒息。麦克阿瑟通电至华盛顿：“我们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

联合国的阵线被切成了碎片，当他们的防御壁垒被逼退至三八线以下。麦克阿瑟将军难以置信那，秦娜共产党员竟敢犯天下之大不韪，担着美国空军原子轰炸的风险，由这不可原谅的袭击联合国部

队。然而，他所不知，但很快会发现的，曾是那滔天骇闻，秦娜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情报特工得到保证，那在华盛顿，伦敦和纽约的外交官们将不会允许麦克阿瑟用美国空军进行报复。麦克阿瑟将被束缚在“有限”战争之中。

正是在这个时刻那，麦克阿瑟将军发现在联合国的亲共势力，和在国务院的左翼同情者们，令白宫，联合参谋长，和那些朝鲜战争负责人的政策陷入沼泽。他发现那，他大量急需的补给正被挪用到欧洲，根据国务院会议的第一点。他被明确禁止跟踪秦娜战机到他们的基地，或轰炸满洲铁路，其曾倾卸山积波委的补给在鸭绿江北岸。他被严禁轰炸鸭绿江大桥，其曾源源流入部队和补给，并且他自己的补给和替换部队被缩减到的水平，令一场反攻变得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最后一击的到来，是当外交官们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热情的提议，那从福尔摩沙派送数千名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到朝鲜作战。

在四个月内，麦克阿瑟将军目睹了由这些僵局政策所导致的屠杀。最终他憋不住了。他违反了1950年十二月6日的总统封口令，且回复了来自国会议员马丁(Joseph W Martin)的书面询问，关于在朝鲜联合国势力正遭遇的费解逆转。将军在信中给出了赢得战争胜利的推荐，在国会于1951年四月5日宣读，五天之后，杜鲁门总统下令迅速撤销麦克阿瑟的所有指挥权。

麦克阿瑟将军被李奇微将军(General Matthew B Ridgeway)接替职务，而他返回美国，对他军事生涯的突然终结感到一头雾水。直到他降落在旧金山，并遇见那第一波呼喊的，欢呼的和钦佩的公民同伴时，那他才意识到在美国政体中的病态并不在其全体成员中，而仅是在其首脑中的一角落。

应记得那召回麦克阿瑟将军随后两年多的军事停滞。结果，在国会委员会前的听证会准许了克拉克将军(General Mark Clark)，斯特雷迈耶将军(General George E Stratemeyer)，范佛里特将军(General James A van Fleet)，乔伊海军上将(Admiral Charles Joy)和其他人来解释他们在朝鲜的指挥权发生了什么。每一位都佐证那事实，军队从未被准许打一场胜利的战争。外交官们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理论，称为“包围遏制共产党员”(Communist Containment)，但在实际操作中导致了联合国战斗部队被包围遏制，而不是共产党员。很快变得明朗那，曾一直管理朝鲜战争的，是那同样的团队和同样的政策，其曾导致秦娜的沦陷。

在后来某日还曾被揭露那，不仅迷乱外交官们的诡计为朝鲜的半溃败做出了贡献，而且那全职的苏联俄罗斯卧底特工曾经常辩论莫斯科路线，而掣肘于在伦敦，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的官员们。在这临界时期俄罗斯的高级间谍中曾有两名顶尖英国外交官，麦克林(Donald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麦克林曾是在伦敦的英国外交总部中美国事务的主管。伯吉斯曾是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的第二秘书。当他们即将被英国情报机构逮捕时，二人都逃往了铁幕后。

朝鲜停火协定

到1953年一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关于朝鲜曾普遍感觉到沮丧与绝望。人们迫切地渴望以某种方式来停止流血。和平的希望被三月5日横扫全球的一新刹那而突然加速。约瑟夫·斯大林死了！

第二天，一个新政府接管了俄罗斯，而领导人竟是斯大林的前秘书，和共产党员秘密文件的保管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他和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Lavrenti P Beria)联手夺权。贝利亚曾有一支由200万名特工和士兵组成的部队，还负责强迫劳动营地，且监督核电厂。

然而，当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接任为斯大林的继承者，他们立刻发现自己在遭遇一场爆炸性的经济危机。在俄罗斯(和她的卫星国)内压力正在攀升，一如曾在1922年和再次在1932年。马林科夫因而向

他的人民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让我们如今放下重工业一段时间。人民不能吃重工业。。。我们应该关心我们人民的需要。”这曾是苏联激进新政策的开端。在国内，口号曾是“更多吃的”；对外，马林科夫的口号曾是争取与所有民主国家的“和平共存”。

斯大林死后仅二十三天那，中共按他们的新信号行动了，并与联合国指挥部就停火协议开启谈判。这终于引导了在1953年七月27日签署的停战协议。其在十二天后生效。

朝鲜战争由此落幕。其曾消耗了美国200亿美元，和超过13.5万人的伤亡。其曾造成南朝鲜100万人死亡；另100万伤残，900万人无家可归，而且南朝鲜负担了400万来自北朝鲜的难民。

美国彻底抛弃其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从朝鲜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人民比他们进入时更悲伤且更明智了。权威人士已陈述过那，在朝鲜战争中曾发生的两件事，其可能被标榜为共产党员战略家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误。首先，它唤醒了美国，那只要共产党员威胁存在，就有必要大力重新武装并保持警惕。其次，它向美国人民展示了联合国本质上的弱点。正如塔夫脱(Robert A Taft)参议员所总结的：“联合国达到了作为世界开大会这很有用的目的。。。但抵抗武力侵略是一件没用的武器。”

早在1950年，当联合国呼吁其所有成员国为抵抗共产党员提供手段时，只有16个国家以武装部队这必须构件作出回应。总共，这些国家贡献了一支有3.5万战斗人员的部队。小小的南朝鲜维持着有40万人的战斗力，而美国弥补了差额，输送了35万人的军力。超过一百万美国大兵不得不在朝鲜被轮换，以维持美国军力的指标。因而在普通美国人的心目中，联合国已不再代表“集体安全”了。

曾难以忘记的是那，当美国人和南朝鲜人曾承受着战争的锋芒，俄罗斯和英国双双违反了联合国向红色秦娜输送战略物资的禁令。在联合国的地板上，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撂倒了向俄罗斯的挑战：“苏联从未掩盖过此事实，即它曾销售且将继续销售军备给它的盟友，秦娜！”

朝鲜战争的落幕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953年夏天，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发出通知那，如果共产党员打破了在朝鲜的停火协议，我们将立即发动一场针对秦娜的大规模战争。英法双方都同意支持这一立场。当时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通过此行动，美国正在判处二十年安抚共产党员政策的死刑。

联邦调查局在地下战场中的角色

对绥靖终结的欢迎，没有人能比胡佛(John Edgar Hoover)更宽慰/解脱，他曾是FBI局长和美国执法的第一号人物。自1919年以来，他一直难以向政府首脑和公众们，概括地点明关于共产主义阴谋诡计的本质。在1919年作为总检察官的助理，他曾编理了最早的法律摘要之一，反映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颠覆性面貌。

在绥靖的二十年中，当许多美国人已被“共产党员联合战线宣传的甜言蜜语”催眠入一种安全感时，胡佛握紧双拳，向正在啃噬美国生活命脉的红色威胁，出击：

“美国共产党员。。。必须被处置在像三K党(如今已不存在的德裔美国外滩)和其他极权组织的同一类别。。。正如普通罪犯寻求黑暗的掩护，共产党员，在羊头狗肉招牌背后，受保护地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方案，企图欺诈并抢劫美国人继承的自由。”

胡佛曾是共产党员巨大的失落/胡佛使共产党员十分棘手。在大多数国家，赤色领袖曾一直能够令处理警察权利的政府机构完全失信，以腐败和侵犯公民自由的指控，猛烈抨击他们。然而，FBI的主任曾花了他一生的时间来建立FBI，以使公众知道那任何如此的指控都是虚假且欺诈的。

多年来，公众得知那FBI探员检查无辜嫌疑人的时间，和他们搜查犯罪者的时间曾一样多。实际上，靠着仔细调查且人道的待遇犯罪者，FBI已在其85%的案件中获取招供认罪。

因而，共产党员对他们将FBI描绘成美国盖世太保的运动结果深感失落。共产党员领导们更进一步的愤恨，得知那FBI曾培训的人员正是自由国家里政府官员应该的样子 — 警惕，机灵，科学且勤奋。而尤甚令赤帮惊恐的，曾是局特工悄无声息有条理地追捕颠覆分子 — 凡此种种预示了某一天共产党员战略家的审判日。

这一天在1948年七月20日到来，当美国共产党的高层全都被起诉。受到审判的“十一巨头”皆被定罪。他们辩护律师中的六位被罚款或监禁，因为在审判中有蔑视法庭行为。十一位共产党员中的四名，跳了他们\$20,000的保释票，而FBI不得不开展国际调查，来把他们遣返。

此后不久，美国政府变得深信那，苏联间谍活动特工曾一直在窃取原子能的信息，而FBI被授予管辖权。几周内，FBI已翻阅了无数记录，面谈了数百名在若干核电厂的“限制级”雇员，并从缓慢的筛选过程中渐渐浮现，正义之手指向了物理学家，富克斯(Klaus Fuchs)，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 新墨西哥州小县城 曼哈顿计划一实验室曾在此)呆了相当一段时间。然而在当时，那出生在德国，归化的英国人，曾是英格兰在哈维尔(Harwell 牛津郡一村庄)原子能机构的堂堂主任。

跟着FBI的风声那，富克斯曾是颠覆自由世界对原子弹垄断的主要嫌疑人，英国情报局开始工作了。在一个月內，他们看到了一些证据显示FBI可能是对的。在过了一个月，他们已对此毫无质疑。在1949年二月3日，英国人宣布那富克斯已被逮捕，且已完全招供认罪。

富克斯的招供使FBI再次出猎。富克斯说他曾将好几包处理原子弹的信息，交给一个他只知道叫“雷蒙德”(Raymond)的人。此人必须被指认且定位，因为他明显是将原子弹秘密交给在纽约苏联领事馆的信使。尽管FBI起初无处下手，但有外观描述，一假名，和此信使是个化学家的可能性，探员们终于找对了人。曾是戈德(Harry Gold)。

戈德招供了，而这使FBI终于得以解开曾困惑了整个国家问题的答案：“俄罗斯人是如何掌握原子弹独创的触发机制，其应消耗俄罗斯人很多年来发明。”戈德说他们是偷的。FBI又一次跟踪线索，而这次引到了两位美国公民的门前，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调查揭示那Julius·罗森堡曾向他的小舅子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施压，向戈德和他交出有关触发机制的所有基本信息，没有其原子弹就不能被引爆，格林格拉斯曾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能实验室，而且对炸弹的构造以及引爆的透镜装置知之甚详。格林格拉斯最终被劝诱，画出了丢在广岛炸弹的草图，且提供了引爆透镜的详细绘制。罗森堡夫妇然后把这信息渠送入了常规的俄罗斯间谍活动器械。

当共产党员科学家们一收到这些数据，他们迅速赶上了原子竞争的差距，并爆破了一颗俄罗斯的原子弹。应记得那这一事件的到来，令西方感到震惊。红色领袖们从这暂时的优势中获利，用他们的

原子能存余做出响尾蛇嘎嘎声，并告诉在秦娜和北朝鲜的共产党员领导，可以开始为一些提前的军事征服做动员呱呱了。事实上，到罗森堡夫妇被定罪且准备行刑时，美国已经处于朝鲜冲突之中了。数千美国人的生命被牺牲了，来顶住罗森堡夫妇曾协助释放的凄惨浪潮。

考夫曼法官(Judge Irving Robert Kaufman)俯视着此男女，并说道：

“单纯存心蓄意的谋杀罪，与你们所犯下罪行的程度相比，真乃相形见绌。。。我相信你们将原子弹交给俄罗斯人的行为，比我们最优秀科学家所预测俄罗斯将完善炸弹提前了好几年，在我的观点中已经造成了，共产党员在朝鲜的侵略，结果死伤已逾5万，而且谁还知道那几百万更多的无辜人，会支付你们叛国的代价。的确，因你们的背叛，你们已无疑地改动了历史的进程。。。 ”

“我将说的对我并非易事。我已经推敲了很多个小时，白天和黑夜。。。我已搜索过记录 — 我已搜索过我的良心 — 来找一些为慈悲的理由 — 因为人性就是慈悲，且是自然的来试图挽救生命。然而，我坚信，如果我向被告人罗森堡表示宽大，那我将违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置于我手中庄严与神圣的信任。我无权原谅你们，Julius和Ethel罗森堡。只有主能为你们所做的找到怜悯。。。你们特此被判处死刑。”

格林格拉斯被判十五年徒刑。

曾是美国历史中悲剧的一章节，但其验证了胡佛先生的最初主张，那红色领袖们在“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方案，企图欺诈并抢劫美国人继承的自由。”

但胡佛晓得那，共产党员革命家绝不会在美国发动他们最后，致命的一击，只要他们曾落败于地下战场。他还感觉到那，仔细地甄选并培训的年轻美国人，能够与红色领袖的计谋一较高下，而且能赢。胡佛先生在FBI卓越任期的历史，对他的感情给了充分理由，且完全有信心美国的地下自由战士会最终胜利。

铁幕上的裂缝

到1953年，克里姆林宫(Kremlin)不仅在国外陷入了困窘，而且铁幕上裂了个大口子，揭露那共产党员帝国的国内正处于绝望困境中。共产党员力量与团结的神话被揭开了。东德爆发了骚乱，当人民用徒手和砖块面对坦克。更糟的是，拒绝向德国人群开火，不服从命令的俄罗斯官兵不得不被处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爆发了局部起义，而且在波兰，保加利亚和乌克兰也有爆发的风险。

经济学家从马林科夫(Malenkov)的讲话和官方公报中发现那，俄罗斯人每周工作38个小时所赚取的食物，那在1928年仅花费26个小时。此外，俄罗斯有着殷实的人口增长 — 但在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制度下生产的食物，少于曾在1928年“新经济方案”(New Economic Program)下所生产的。在卫星国中的骚乱是由于意识到那，俄罗斯可能永不会实现她宣传的承诺，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机器。恰恰相反，破产的苏联曾一直像个大寄生虫，附在卫星国上吸取养分。

与铁幕国土相比照，西欧民族曾享受着四十年来最繁荣的时期。美国人民曾捐献了500亿美元给这些国家战后复苏，且他们正快速到达可自力更生的水平。对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信念熙然再起，当美国到达其繁荣的巅峰，并展现出其能力不仅比任何国家都能生产出更多财富，而且在其人民中分布地更公平。

在英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教授(Professor W Arthur Lewis)，公开认答那社会主义在英格兰是一巨大失落：“所做的。。。并不是将财产转移给了工人，而是给了政府。工人们还是雇员，在大型工程的命令下工作，服从一切不满与挫败。。。那些期望国有化以提高工资的人。。。都失望了。。。它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它减少了私有财富。。。它提出了控制权这个未解决问题；且它提出了此议题，即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有多少权利。”

共产党员征服印度支那

在朝鲜停火后，中共并没有让俄罗斯的内务问题妨碍他们下一步侵略的胃口。他们进军去完成赤帮对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 法属印度支那 19世纪后期起 现东南亚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曾为法国属地)的征服。起初，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曾一直是当地人民试图从法国属地主义中解放自己。然而，中共的红色渗透终于将冲突改变，从一场为了自由的战争，到一场法国人和秦娜赤帮间的战争。法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力(法国最大的单一政党)令战争的致命结果，仅取决于时间的流逝。法国人的败局在1954年七月21日到来。在日内瓦(Geneva)，秦娜赤帮兴高采烈地同意停止战斗，以换取1200万人口和6.1万平方英里的印度支那。

毛泽东此时正沉醉于这双重成功之中。甚至俄罗斯也感觉到有必要向毛和他的秦娜共产党员作出让步，旨在保证他们向共产党员母国的持续忠心。在1954年十月，俄罗斯官员跋涉到北平，并以如下的保证来奉承毛：

- 一。俄罗斯将从在雅尔塔授权可租借的亚瑟港，撤离。
- 二。卖给秦娜(优惠条件)，自战争起俄罗斯作为“伙伴”，曾一直运营的铁路和其他工业。
- 三。向秦娜贷款1.3亿美元。
- 四。帮助修建两条横穿秦娜的铁路。
- 五。帮助秦娜建设15个新的重工业项目。
- 六。征战夺取福尔摩沙。
- 七。争取将日本纳入共产党员轨道。

曾很显然那，尽管俄罗斯在谈论“和平共存”，自由世界从红色秦娜的战争计划中则几乎毫无慰藉。

孤立世界侵略者的任务

从美国的观点，印度支那的惨败曾是一暗淡的政治悲剧。法国议会的100名共产党员(他们甚至拒绝站立以向战死的法国人致敬)曾策划了那七年战争的崩溃。正如美国国务卿在日内瓦停火会议上的致词，他猛烈抨击那怯懦与颠覆，其已牺牲超过1200万人给了红色侵略：“和平，”他说道，“总是很容易实现的 — 只要投降。统一也很容易做到 — 只要投降。困难的任务，在挑战我们的任务，是将和平与统一还有自由，结合起来！”

国务卿杜勒斯(Dulles)离开日内瓦，去进行一场狂热的环球运动，以令所有自由国家对曾给共产党员帝国主义做出的荒谬让步，进行“惨痛的重新评估”。在20个月内，他奔波了超过15.2万英里，且当他收工时，美国已成为(或巩固了其地位)一连串地区性合约的一分子，其特定设计于加强对共产党员的包围遏制。令苏联战略家沮丧的是，《联合国宪章》第52条含有一漏洞，其准许此规程。因而，美国开始公开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东约)和其他地区性机

构，作为相互保卫的集体办事处。很大程度上来说，那麻痹锁喉失效了，即苏联人以前曾对西方施加的，通过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滥用。

美国还宣布那，她无意坐视俄罗斯建造其远程轰炸机飞队，共产党员媒体发布描述其有能力在美国城市上丢氢弹。美国对此的回应曾是，在铁幕边缘迅速建造一圈美国的防御基地。立刻，一头伤熊的咆哮从俄罗斯轰鸣而来：“我们将有灭顶之灾！”

国务卿杜勒斯(Dulles)严肃地重申那真相，他亦十分晓得共产党员早已明白的——即，除了侵略者没有国家需要担心/害怕这些基地。然后，他用清晰实锤的术语，阐述了新的“大规模反击”主义，他警告道其将被瞬间触发，万一苏联帝国敢于履行它屡次重复的，对自由世界突然袭击的威胁。

有一阵子，莫斯科曾是不祥的寂静。

俄罗斯试探美国新的“强硬”政策

快到1954年末，已变得明朗那，重大的政治调整正发生在俄罗斯内部。一位好斗的子弹头人物名叫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和一位酸腐拘泥的党政客名叫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的，开始在新闻中更频繁出现。一位前苏联官员(科赫洛夫 Nikolai E Khokhlov)宣称这将是個不好的信号。他描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推动者，对照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想先改善俄罗斯人的生活条件。

在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带领使团前往北平。在那里秦娜人得到指令，准备对福尔摩沙发动袭击。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权利的新界线已被完全重新划分。最终被证实那，马林科夫已叛离了他的伙伴贝利亚，且加入了新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势力。在十二月下旬，贝利亚和他的三名助手被枪杀。马林科夫被迅速降职，但他及时转换阵营救了自己性命。布尔加宁接替了他的位置，而赫鲁晓夫则盘踞幕后，制定政策并宣布新口号，“返回重工业——军备”和“根据法令种植粮食”。

与此同时，中共也被卷入这新领导的精神，并开始为莫斯科摇旗呐喊，以此骇人公报逗弄民主国家，那他们在朝鲜战争结束时违反战俘交换协定，曾故意扣留了美国官兵。

在板门店(Panmunjom)的停火协定已明确规定那，所有希望遣返的联合国战俘将被返还，即使其中某些人可能被指控某些罪行。然而此时，秦娜共产党员在挑衅地宣告那，他们曾秘密地扣留了若干美国战俘，因为他们被指控犯有间谍罪，或其他某类别罪行。美国的愤慨已白热化，当众多美国人首次开始意识到，信赖共产党员的承诺是多么的完全不可能。

尽管公众的愤恨，然而，美国人的感情在此特定时刻略有几分妥协了，由于众多公民迅速攀高的愿望来忘记整场国外的“乱局”，而着手于家乡发展，其保证过要提供/超越美国自由企业繁荣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准确地诊断此国民感情为反战情绪，且他因而加速了他遍布亚洲的宣传征讨，将美国比为“纸老虎”。他披露额外非法关押的美国战俘来嘲讽美国，并自夸地公开蔑视美国政府，弦外之音是你能怎么办。

他对此征战变得如此亢奋那，他终于决定去证明美国对全世界影响力的阳痿，通过按赫鲁晓夫的战斗命令行动，攻击福尔摩沙。仅数周后，国民党人手中的离岸岛屿(金门县)开始被秦娜大陆炮轰。这是对蒋介石的最后一个前哨站全面攻击的预热期/初步阶段。

这对美国是个高度关键的时刻，因为她已承诺自己将防守福尔摩沙。如果她动摇了，在东南亚的自由之光会很容易熄灭。5亿“中立”的亚洲人也密切关注着，当美国领袖们衡量风险，并捉摸他们自己道德信念的深浅。

在1955年二月早期，秦娜赤帮和其他世界共产党员得到了他们的答案。就是美国国会两党派(美国两大党 Republican 共和党-北 Democrat 民主党-南)都支持的决议案，其确认了美国总统的授权，将美国第七舰队部署在福尔摩沙海峡，且给出命令如果遭到攻击，即发动全面战争。这将明显包括核武器的使用。

东南亚的“小国们”站起来欢呼雀跃。显然那美国不仅有意志讨论“大规模反击”，且还有意志去发动之。在万隆(Bandung)的亚非会议，几个小国大胆地给她们自己的颜色。他们以“共产党员属地主义”和“共产党员侵略”戏弄中共代表团。这严重打击了毛泽东和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员后台的威望与宣传。

仅数周后，美国和她的太平洋盟友们的”强硬“政策，开始结出奇迹般的果实。从莫斯科传出指令那，共存再次成为此刻的甜蜜议题。秦娜人开始释放他们曾非法关押的美国战俘。福尔摩沙的问题被允许悄悄谢幕。赫鲁晓夫向美国伸出邀请，来相互交流访问 — 编辑，国会议员，农民 — 他甚至讲他自己可能在某时前来。全世界各地，战后十年的硬指节紧张局势开始消退。似乎对这遍布世界新发生且未曾预料的事件转折，有着普遍的满意度，且民主国家们再次安顿下来，以追求他们自己的正常国内事务。

但在这一切之中，军事情报部门传来了凶险警告。报告表明那，当苏联对民主国家强调的“软”政策正在国外被推动时，在国内的部队则灌输了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苏军被教导那，“当代战争中出其不意的重要性已大幅增加”，还有“共产党要求那，我们陆军和海军的全体人员，应被灌输最高警惕的精神，且持续保持高度军事戒备状态，只要能拧掉敌人手中的先发制人权，然后，对他发动毁灭性打击啊，最终全面击败他。”

这一切有种熟悉的味道。它提醒了警惕的美国人，曾在1949年联合国代表苏联主持安理会的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Z Manuilsky)，做出的一重要声明。在莫斯科的“列宁政治战争学院”(Lenin School of Political Warfare)，他曾教过：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白刃战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当然，我们不够强大去进攻。。。要赢，我们将需要惊喜的元素。资本家们将被置入沉睡。那样我们才能开始，通过发动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和平运动。将会有激动人心的序曲，和闻所未闻的让步。资本主义国家，愚蠢且腐朽的，会为他们自己的毁灭而欣喜合作。他们会雀跃于再次当朋友的机会。只要他们的警惕放下了，我们将用我们握紧的拳头砸碎他们！”